

蘇俄的婦女問題

著 斯 密 斯
譯 琴 漫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929

漫斯
琴斯
譯著

蘇
俄
的
婦
女
問
題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譯者的聲明

譯者在本書譯完之後，有幾句話應向讀者聲明：第一，我們讀完本書之後，至少可以懂得婦女問題裏面究竟包括了些甚麼問題。婦女問題簡直是社會問題上最大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凡是人類的衣食住行，凡是人類的生養育病，沒有一項對於婦女是例外的。這本書會為這些問題分章敘述，我們可從這裏面探考一個究竟。第二我們讀完本書之後，至少可以懂得蘇俄婦女的地位利用一些甚麼方法，經過一些甚麼程序，已增進到了甚麼程度，在社會發展上有甚麼實在的影響，並在最近的將來有甚麼新的計劃。第三，這本書在現在總算是敘述蘇俄婦女的第一本書，蘇俄婦女運動的經驗，未嘗不可供我們的參考。我們讀完這本書之後，自然對於國內急待解決的婦女問題可以提出更多具體的意見。

不過譯者更要請求讀者們留心以下幾點：第一我們讀這本書時，不要過分着

在這裏面吸取多量關於婦女問題的一般理論，因為著者的目的全在介紹事實，理論方面不僅說及的地方很少，而且間有前後相違的語句。我們若是誤認牠為一本婦女問題的討論集，那便徒然自陷於迷惑，得不到任何結論。第二，我們讀這本書時，不要當牠的材料是綜合俄國婦女運動最完全的敘述，她所徵引的事實至少有一半是出於個人的口頭報告，很少是取材於書籍報紙雜誌上更豐富更可靠的材料，因此我們只能從這裏窺探俄國婦女問題的一個最小限度。第三我們讀這本書時須要明白著者是一個女藝術家，所以在文字的結構上多少帶有幾分這樣的氣味：每於一個人，一塊地方，或一所房屋等等，莫不添上許多無關重要的描寫。譯者雖也跟着原文譯了出來，但是讀者們儘可以不必注意。

然而我之所以介紹這本書的原因，還是基於前面的三個理由，希望讀者們也專從那幾點去讀這本書。

曼 一九二九·五·七日·於上海。

蘇俄婦女問題

目次

譯者的聲明·····	一
第一章 舊日的生活概況·····	一
第二章 女工·····	一四
第三章 鄉村婦女·····	三八
第四章 婦女之參加公共生活·····	五九
第五章 婦女和教育·····	八三
第六章 新家庭的演進·····	一一一
第七章 婚姻法的製定·····	一二八

第八章	革命道德·····	一四九
第九章	房屋供給·····	一七六
第十章	母親和嬰兒·····	一九九
第十一章	民食·····	二三一
第十二章	來未社會的建設·····	二〇二

蘇俄的婦女問題

斯密斯著
漫琴譯

第一章 舊日的生活概況

凡能掃除婦女從家庭至國家各種關係上的差別的一切文告和法律現已在蘇俄完成了。第一編法令便確定婚姻爲自由投契和自由離異的一種結合，國家在這種結合上的惟一職責是求保證兒童適當的保護和贍養，承認母性爲由政府保護和資助的社會功能，除去私生兒非法的凌虐，創立給予同等工作以同等報酬的原則，並給予婦女以完全的公民權利和義務。

然而立法不能在這十年裏掃除數世紀的成見，經驗和教育纔是唯一的背景，牠可以發展思想和行爲的新習慣。

一位著名的共產黨員雅洛斯拉夫斯基 (Yaroslavsky) 說：「編寫好的法律是



一件事，創造一些實際條件使那些法律應用於生活上是另一件事。現在我們更該明白地說，除非我們整個的生活方法有了根本的改造，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1。

因為現時根本的改造正在進行，很難恰切指出俄國今日家庭生活的詳細情形，且如不注意正在改變的家庭關係，我們便不能明瞭婦女的新境地。但是不待新青年已受教育，不待舊的成見舊的穢物已經清除，不待新房屋新社會已經建築；這個新家庭無論其形式為何都是不能興盛的。不過我們所希望的這些都是些可能，趨勢和開端而已。

關於家庭生活的革命上一切勝利的首要便是給予婦女在妻子、母親、和公民上的完全平等，採用種種方法教育她以平等的意義和從前束縛她在家庭中的操作的社會作用，使她能享受這種平等。

過去大多數家庭共同重視的兩件要事即是，妻子和兒童對於丈夫和父親的經

倚賴與家庭中其他份子供給食物、衣服、和維持生存的其他瑣事上對於婦女的倚賴。現在這些支柱已經除去，丈夫和妻子彼此經濟獨立，共同担负兒童的贍養，而且公共住宅、育兒室、公共食堂和洗衣店正在漸次替代婦女的地位而處理日常生活的瑣事。

在西方各國中婦女政治權利的獲得僅僅給予她們一種武器，她們利用這種武器能夠更有效地爭取她們社會的和經濟的解放。經濟權利得到最遲，沒有經濟權利，其他都不能計算。而蘇俄的這種進行適得其反，首先就取得經濟權利。公認革命所給予的甚麼必是同樣給予男子和婦女。憲法無疑地決定不分性別、信仰、和民族，凡滿十八歲並參加社會的有益勞動而不為個人利益剝削別人的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蘇維埃代表的權利。這裏包括主婦在裏，承認她們的勞動能夠成就男子生產的勞動。但是一般的重視是在婦女解放的經濟方面而甯非政治方面；因為她們不識字和貧窮的普遍遺傳，很顯明地她們只能由經濟解放和教育才可達得充

分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獨立以認識她們的政治平等。

舊時統治底下受壓迫的男女羣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毫無差異的，但在社會上婦女的確是最惡劣的，在社會和家庭的關係上整個的婦女對於男子是和工農對於上層階級一樣的關係，因此俄國革命給予婦女的利益比給予男子的爲多。克倫斯基政府似乎沒有注意到這層事實的重要，且不曾試想將關於家庭關係的舊法律改變。但在布爾塞維克政府掌握政權之後一個月裏，即在當政府尙爲自己的存在而鬥爭的時候，便積極改革婚姻和家庭整個的基礎。

爲欲十分瞭解今日俄國婦女的地位，首先須認識她們達到今日的淵源，這就足易改造那種情形。舊俄是到處靜止的：農婦戴着木材、番芋或稻類等殘忍的負擔，腳踫於沿村的道路上；在低陋的茅舍裏農民對他的妻子主要的愛稱爲「老苦蘿蔔」或「白菜頭」，而他平常的敬禮就是咒罵；在鄉村會議裏富農形成一個一致的態度，反對婦女參加蘇維埃。爲了參加會議工人常時毆擊他的妻子，即在比較

開通的團體裏的老俄國人也仍然墨守不會爲新的急流所排除的舊習慣。我曾聽說共產黨裏的少數男子仍然願意他們的妻子管理公共廚房的一隅，而不願她們坐在會議席上的週圍。

舊的寓言也曾報告這個故事說：「鷄子不是鳥——妻子也不是人類。」『賣打你的妻子去備早餐和午膳！』『我想我見過兩人，但這僅是一位男子和他的妻子。』『婦女的路徑是從大門到廚房。』其他大多數故事都是一樣的氣味。這個不僅和全世界婦女的生活情形異常不同，並且因爲民族的落後而更下劣低賤；深入俄國人的生活東方風氣遂使男性對婦女的概念不過爲一種佔有物而已。

俄國婦女從小就時常屈服於男子的權威；她是她的父親的女兒和她的丈夫的妻子，她的母親可以不算。她在結婚以後便把肉體和靈魂轉交她的丈夫了。祇許教堂結婚，並由教堂宣告結婚生活的條件：「妻子畏敬她的丈夫」便是牧師在維繫婚禮的神聖結合上可怕的警告。於是青年的新婦就不得不畏敬這個男子——往

往不是她自己選舉的男子，將來她就遵守俄羅斯帝國的神聖法律屈服於他，『供信他為一家之主，用愛情、誠實和無限的服從共同生活，費盡一切快樂和努力完成家庭的夫人。』

丈夫任到何處妻子都應隨着去，假如她離開了他，他得叫警察追她回家，而且不貞的妻子他能將她下獄。妻子未得丈夫的同意，既不能取得旅行券，又不能操有職業。離婚由教堂的法庭決定，而且只能由限定的理由可以允許，主要的一條便是經證人證明她是不貞潔的。律師和証人要求極高的報酬，因之祇有最富者纔當得起離婚的用費。法律十分擁護男子，因之婦女幾乎不可能得許離婚，但是這已成爲一種常事：一個純粹的婦女竟被法庭無端判爲不貞而向她取去她的兒女。遺產僅有十四分之一給予女兒，其餘十三份盡給男童，且在結婚以後婦女的一切財產和金錢都歸她的丈夫管理。

農婦在工作 and 凌辱的雙層壓迫之下長得衰老醜惡，且又性情乖僻。她們的兄

弟雖已上學，而小姊妹却關在家裏看護更小的姊妹。你看她們還是八九歲的女孩，爲了她們的母親的兒童的負擔，自己的兒童面貌便已淒然衰老。在最早能用氣力的時候她們就同家庭在田間工作。當她們行將結婚，父親時常爲她們選擇丈夫，將他的女兒賣給出價最高的買主。在農民的婚姻上毫無含有生趣或同情。十六歲的活潑女子的婚姻不僅是對她自己的一種便利，而且也是對其丈夫的家庭的一種便利。她是丈夫家中一個新的做手，且應辛苦工作供給她所消費的食物。兒童便一個復一個開始生育了。

高的生殖率不可避免地和高的死亡率相併；在第一歲時死亡的兒童平均有百分之三十七，並且有些地方多至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五。產母的死亡率也很高。鄉村的醫藥接濟極端缺乏，工作過多的中年婦女又祇能照顧每年誕生成千的嬰孩的一小部份。常時雇請毫無接生經驗的農婦接生，產母臥在骯髒的火炕上，用生癩和惡濁的手接收她的胎兒，再將胎兒裹在一包爛布巾裏。農婦在產母和胎兒的身

上洒下許多聖水以驅除魔鬼，却不用那種小心去防預不潔。教堂教諭婦女在臨產時是不潔淨的；因此許多家庭中的產母歷來就是而且仍舊是放在牛欄裏惡濁的羊皮上生產。

因為墮胎須受重罰，農婦的勸告便也受決意停止兒童生存的產母所信服，於是農婦使用手指、紐扣鉤、或人參的手術，或治以少許致命的酒類將胎兒殘殺。節制生育自然在鄉村中全不知道，城市中知道的也是絕無僅有。

農民婦女便這樣的度過一生：在田間和男子一樣的痛苦工作，生育並殘殺嬰孩，烹飪並挑水，臨河洗衣，生火，冬季紡織，取牛乳等；爲這一切，除了她的丈夫的咒罵毆擊以外，別無所得。冬季是大多數農婦特別恐怖的時期，因爲那時農民很少出外工作，往往長時間關在家裏，酒和性是他們整個的生活。不許婦女逃逸，絕少有反抗的婦女，凡是反抗的終被他們獵取追逐以致不勝其擾。

城市中比較貧苦的階級的生活不得比農婦的生活較好，萬一丈夫從田野回到

工廠之後，他便成爲更野性的。他的家庭生存於更人多和更不幸的情形之下。婦女和兒童也在工廠中工作，婦女須服從甚至比男子更大的剝削，她們因恐失掉自己的職業，便爲長時間工作而取得少的報酬，提舉重的負擔，臨產前的最後一分鐘還要勞動，臨產後又須直接回去工作。直到一九一二年當受種種限制所規定竟致毫無用處的少數社會保險法已經通過之後，俄國工業上甚至還沒有保護婦女的初步的法律。

許多婦女被迫而爲娼妓，這是各屋實行的一種合法制度，這制度的開創曾受牧師禱祝。許多不要的嬰兒都拋棄在井裏河裏，棄兒院充滿不識字的兒童，法律對於他們不會給以保護。父親不能在法律上承認他自己的兒童，甚至且不願意承認，而兒童也不能希望微薄的贍養，除非他自己能夠證明他的父子。父親死亡以後，兒童便與他的家庭失去一切連繫，因爲不會認定他是與家中其餘的任何人有關係的。

中等階級的生活雖然是一件比較優閑和快樂的事情，但對於婦女，精神上仍然是非常鄙賤的。小資產階級的製造家和商人的青年女子關禁在她的房裏，不到結婚日期往往看不見她的丈夫，專制是一樣的嚴重。因為受十分極端的特許權保護的結果，青年男子便隨處添引女子，每個城市中都有小的夜間俱樂部，青年男子便在其中蹈襲他們的前輩公開遙逸，並冒犯書不勝書的風騷，甚麼不會懂得的，甚至不會看過的他們都毫無顧忌地妄作敢爲。

但是不幸被誘惑的女子，或則從家中逐去，或則強與其人結婚，不管他是怎樣著稱的一個惡少。凡是這些道德的外飾所蒙蔽的內部腐壞本用不着計較，這是禁止離婚的法律文告的表面的嚴切的自然結果。女子卽在同性中說及離婚這個名詞便斥爲是醜行，而青年男子則送他在外這樣作爲。

上層階級的女子給予以藝術音樂和詩歌上比較完全的基礎，受畢業學校最高知識的淘養，學校中所教她的東西都是於俄國於沙皇——一位降福於人民的仁慈

父親——有益的。即設她已懂得許多書本，然於生活完全沒有關係，任何對於根本思想的可能都被止息，真實的教育祇有對父親或丈夫的幫助是可能的。有些女子僅因進專門學校而結婚，這是因為丈夫的志願勝過父親的志願。她們不得和男子進同一大學，僅有少數特別的女子專門學校，頂有天才和強健的女子得在那裏受一點高等教育。但是關於進專門學校有一種非禮的習氣，即是取得文憑的婦女須在文憑上黏貼她的照相並寫上些奇異的事情。至於比較貧苦的階級的女子那便完全沒有機會。在革命以前已經開辦一所女建築家女工程師和女工藝家的學校，但是總而言之，俄國取得高等職業生活的婦女都曾經過一種艱苦的爭鬥。大多數婦女都是從事醫學或齒科，還有少數合格的女律師和一位偶時的女建築家。這位女建築家為狂風襲擊中的普利奧布拉捷漢斯卡瓦（Прображенская）城建築一個車站，當屋頂傾壞以後會引起大家的嘲笑。凡是參加公共生活或完成高等職業生活的婦女都是著名的模範，因為她們會用非常多的勇敢、氣力和智力打破包圍她們的隔膜。

智識份子自然排除在上述的團體之外。因為她們僅在自己的圈子裏纔有充分的自由和同情，所以在她們的行動未變成政治的行動以前，她們是能隨着自己的志願而生存的。

人民忘記戰爭是第一個破裂的要素，這些要素動搖了騷動的過去的俄國。他們忘記俄國的損失超過任何其他聯盟國的損失。從戰爭開始直到建立了和平之後，俄國死於戰爭、饑荒、時疫的計有男子一千四百三十萬，婦女四百萬。開始打破俄國家庭的也是戰爭：凡是殺人不多的人多年不會歸家，後來革命和國內戰爭發生，更釀成分裂，更破碎了家庭的束縛。於是婦女擠進工廠裏以取得男子的職業，男子回到工廠以後再將婦女推出去。從此男子當着工廠停閉和城市沒有麵包的時候則混入鄉村，當着土地出產的食物缺乏的時候則又大批回到城市。饑荒比其他一切原因打碎了更多的家庭，成羣的荒民廣集在火車上，飢餓、犯病、死於凍餒，成千離家的人民到處覓食。父親在夜間逃開再無方法贍養的家庭為自己

取得麵包去了，母親則以她自己的飢餓和再不能救濟的那五個離懷的兒童的面貌而感受苦惱，許多母親將自己的兒童交換用以供食，人類彼此殘殺以作食物，一年復一年的沒有麵包。

他們集中一切力量於恢復上的最大努力，因為新的功用固然正在建設，然而舊的功用還需要保持。第一個任務便是修築橋梁和道路並使停頓的機器動作。舊的機器存在以前，舊的生產仍應製造。在將來的形式剛開始形成之前，必須製造新的機器，必須創作新的生活資料。新家庭和新的個人與社會的人類關係祇能當人類關係在新環境裏得有機會去伸張並發揚他自己的時候纔可以發展。現在那種新的環境正已很覺悟地計劃並樹立了，且有佔着社會大場合的一部份的少數家庭的婦女生活正已很覺悟地廢除舊時的隔關和成見。俄國革命不能立刻使一切都平均發展，首先須注意其物質方面。現時家庭革命仍在進行，破壞的歷程仍在繼續，建設的歷程還不很明顯。

第二章 女工

陽光滿照的大樓房：高樓上的梭子拋來拋去正在紡織顏色鮮明的布；空中的婦女聲和歌唱湊合機器合節的迴旋和音響在織一梭梭鮮明清亮的線；織機中的婦女安適地自由地動作，這裏接上一根斷線，那裏又理清一個絲卷。以前是衰老憔悴的面貌，彎曲的姿式和多癯的手，於今却是青春玫瑰花的面貌，直立的身材，和清秀的手指。……我將忘不了莫斯科「赤色羅廠」(Red Rose)絲廠的情景，這廠雇用頂多的女工，是我前一九二三年在俄國考察的第一個工廠。從前那位向我指示一切的老女織工已在這廠裏工作了許多年，於今是一個女工頭，能用技師的驕傲向我說明機器的複雜構造。

我問她說：「工人在革命以後已得到些甚麼？」『我們自己的』(Свой)便是她首先出口的一語。她接着又說：「你不會看見機器旁邊工作的婦女嗎？她們是怎

機活潑的留心那斷了的一根根的線啊！以前工作是不齊整的，生產較高，這也許是我們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原因。現在我們祇要工作八小時，但是各個人正在做較好的工作，爲甚麼呢？因爲工廠和生產都是我們的。工廠指導員每月報告我們一次，他也是「我們的一個」。每個工人都知道原料修理和工資須費多少金錢和有若干已使用的成本。我們知道當我們增加生產時，我們的工資應該增加。你聽到婦女們歌唱麼？他們再不至於那樣動輒就毆打我們，我們現在已自由了。」

接近工廠的第二個門是一座大的白屋，這是以前在廠中工作的人叫他爲總經理的那個胖漢常在住的，於今一部份是育兒室，一部份是幼稚園。在另一個大建築裏，從前是他的游獵紀念品常在陳列的，於今是那設有觀覽室圖書館和教室的俱樂部。至於保存所則已改爲設備完全的體育館。工廠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個女同志，女工的優秀份子塔拉索發 (Tarasova) 和斐力普發 (Philipova) 正在該會辦公

室中計劃補救工廠中每個不識字的女工。

『赤色羅撤』絲廠或許是最好的一個工廠，我們不能到處都可發現那樣自由和愉快的空氣。然而在莫斯科那個雇用工人八千的大三山毛織廠 (Three Hills textile factory) 中，關於其幼稚園和育兒室的附設，醫院和產兒院，兒童保養方法的展覽和俱樂部生活的豐富活動更是值得記憶的。不過我也在這裏見到另一方面的情景；住在擁擠的工人宿舍裏的工人妻子還和不能收容在育兒室的兒童同居，因為工廠尚沒有足為在廠中工作的一切婦女自己的兒童收容的地方。女工在工廠八小時工作以後便回家去為大家庭洗滌和烹飪。

我在伊凡諾夫——福茲來聖斯克 (Ivanovo-Voznesensk) 大毛織物中心裏發現新舊同樣的矛盾，那裏的工廠是舊的和不衛生的，生產已達到戰前的水平線，但是舊機器已使用到了極限，除非建造新房屋並安設新機器不能達到更遠的進步。當我問及女工是否待遇比從前較好，語氣常常是一樣的：『現在當我們有嬰兒

的時候，產前我們有兩個月的休息，產後我們有兩個月的全薪和加薪，我們得有時間離廠去看護嬰兒，此外並有平常的假期。」這個產母保險法似乎在婦女方面比革命以來的任何其他改革有更大的影響。安全的方法、兒童吸吮乳粉的器具和好的通風機隨處均已設備了。在下層有毒氣的染工場裏婦女僅工作六小時，並領取特別多的牛乳和牛油。

從前工人常有高度生活費和工廠經理居心避免法律的申訴，因此恢復生產於常態的事業、和在這改造期間工廠經理所遇着的嚴重的經濟問題，便已由上述的管理工人的需要而轉向注意於生產情形了。零工和集團生產的採用已經加連工作，所以在少數工廠中空氣比幾年前定當些，但是工人仍然很明顯地沒有其他工廠時常作興的過餘勞動。

我在羅斯托夫 (Rostov) 大烟草廠中發現採用同樣的保護方法，該廠特別感動我的是夜間療養院 (Night Sanitarium) 這種制度正已普遍採用，並已供給非因

病得必須臥床而僅需要特別診治和規定食物的工人。

她們繼續其職務，夜間則去療養院而不回她們自己的家裏，因之許多肺癆和其他毒病的症候都可以避去。這個特別療養院曾診治過二十五個工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她們可以按照病症的需要住上一月至七月。女工在日間工作以後，剛好出了盥水浴，從惹人目的精潔的房裏向我們表示她已被送到療養院裏，快活享樂她的好運。

至於俄國婦女大批願用於工業裏這是新近的事情。近十年以來婦女都在毛織物工業裏工作，自從二十世紀的開端以後，她們才漸次增加願用於其他工業裏技巧較少的職業。因為她們的工資比較低廉，所以雇主往往認她們比男子更沉着而可靠。然而她們的範圍有限，男工本人不承認女工在同等的基礎之上。可是在大戰開始以後，沒有那一項工業不會多少利用婦女的勞動，這遂在女工本身上發生一種革命的影響，並且排除了許多舊時的成見。因此在大戰告終，婦女到處失掉了她們

的職業；在一九一七年印刷工業決定開除全體女工；在彼得格勒和斯科洛哈德（*Konohad*）工廠中的六百個已婚的女工均被解雇而代以退伍兵士；造紙工業也採取同一的行動。但是不久便認識了這種策略與蘇維埃政府的原則完全矛盾，於是彼得格勒同業組合會議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向着全體工人和工廠委員提出以下的告誡。

「怎樣去戰勝失業問題已尖銳地來到同業組合的面前，在許多工廠和工場裏這個問題却已很單簡地解決了，即是辭退女工而代以男工。現在政權移轉於蘇維埃，這個新的基礎已給予工人階級改組國家經濟的機會。……防止失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全國生產力的恢復和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工廠和工場的工人既經在工業危機的時代削減，我們必須以最大的注意解決這個解雇的問題，我們必須將每個問題都去單獨地解決，不能有工人是否男子或婦女的問題，僅祇有需要的程度的問題。……我們祇能有這樣的一種態度：保持婦女在我們的組織裏並防止工人隊伍裏的分裂。」

這種態度得了其他同業組合和政府機關的後援，婦女大批的解雇從此制止。當一九二一年實行工業的集中，又有大批工人解雇，同業組合再又提出男女工人平等權利的問題。那時發表關於女工辭退的條件的法令規定在同等技能的情形底下婦女應根據和男子同樣的條例方得解雇，且有兒童不滿一歲的婦女更應給以特別權利，如遇這種婦女須被辭退，她們不能居於工人宿舍之外，兒童也仍保留育兒室幼稚園或學校的位置。孕婦或乳兒絕不能成爲辭退的理由，婦女在因生產而缺工的時期亦不能被解雇。這些法規現尙保留於勞動法典之內。

在最近幾年裏工業中婦女的數目已經逐漸增加，增加的數目約相當於男子三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共有雇用於工業的婦女七十萬零五千，一九二五年一年中增加的數目爲一十七萬三千，相當於產業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七、四。婦女佔同業組合會員的四分之一，這個組合會員的數目至少包括全體在業的女工百分之九十九且約佔產業女工百分之百。雖在最近幾年以來婦女在同業組合裏的百分比仍是一

樣，但是絕對的數目已從一四六五四〇〇增至二二一七二〇〇了。同業組合在實際上包括工業生活和高等職業生活裏的全體婦女。現在大多數婦女都在毛織物、布業和食物工人、醫藥和衛生工人以至教育的同業組合之內。雇用於工業的過半數婦女都是毛織物工人，雇用於金屬工業的婦女超過六萬人，其中少數已經改進到了十分技巧的職業。大多數還沒有組織的唯一女工即是農業勞動者和僕役，然而現在這種情形都正在迅速地改變。

在一九二六年有組織的僕役的數目已從四萬七千增至一十三萬三千，她們和其他工人受同一勞動法典的支配，此外更有一種特別勞動法典嚴格規定應得給予她們的服務和時間的限制。僕役約有兩類：即在旅館菜館和學校工作的僕役與爲私人家庭工作的僕役。前一種差不多都不出同業組合的會員，關於她們的保護的法律已經詳細地規定，並由同業組合特別努力將她們的會議、教育和休息時間排列於適當的時間，這樣，她們的工作時間的排列可以不致妨碍她們取得其他工人

的一切利益。這種工人通常是活潑的並教育很好的，即如旅館的女使能像她所服務的客人一般常在晨報上取得深切的智識的趣味。這些女子大多在革命裏佔有活動的地位。

私人家庭正是比較落後的，她們的待遇自然依靠她們爲他而工作的那人的身分而決定。這種僕役——平常是一家一個——多半是由新資本家 (Newmen)、高等職業和官僚階級、智識份子和舊的資產階級與貴族份子所雇用，總而言之，即是由利用職業從事於最少的生產勞動而獲利最多以贍養優閑婦女的那部份人，和由其婦女有一定職業但對於看護兒童、膳食和其他家政尙沒有發展公共設備的那部份人所雇用。在開通的家庭裏僕役是一個助手和家庭的一份子。剝削到處依然存在，但比以前少多了，女子且漸懂得不應屈服於虐待。自然對付僕役的整個的態度已經改變，而且她們是和社會上其他工人一樣的自尊和受人尊敬。一個在舊時統治底下作過長期奴役的婦女已受卑賤的情操顛仆地壓制，對於她現在怎樣生

活的問題不免聳肩駭異；因此斷定這種改革說：

「啊！我們現在能夠更好地安宿了，因為他們必須給我們相當的床位，他們再不能對我們強暴了。」

參加同業組合活動工作的婦女的數目不能和組合會員的數目相稱；在最高行政機關裏婦女僅佔工人百分之六、四，在支薪的同業組合職員裏婦女僅佔百分之二、六，在同業組合中央委員會裏婦女僅佔百分之十五。但是婦女在下級機關裏則較為活動，工廠委員會委員婦女佔百分之二十，而勞動保護委員婦女佔百分之二十以上。

替康泰洛發 (Tichomirova) 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七次的同業組合會議上報告婦女運動說，工人俱樂部會員一百零二萬婦女佔百分之三三，比一年前的百分之二九、八為多。約有一百萬婦女的四分之一已參加附屬工人俱樂部的各種團體的活動。下面便是婦女參加各種活動的一個表：

團體名稱	婦女的百分比
刺繡縫紉等	九四、八
音樂隊	五七、三
圖書館	五〇
文學	四二、九
戲劇	三八、七
平民教育	三五、八
自然科學	三三、四
體育	三一、四
生產問題	三〇、六
勞動的科學團體	三〇、四
政治研究團體	二九、五

馬克斯主義者 二八、三

列寧主義者 二八、二

同業組合運動 二七

非宗教運動 二三、二

象棋 七、二

這些團體的會員是在代表會(參考第四章)的工作以外的，專從這些統計難於估量這個工作在婦女方面的影響，但是這些統計可以指出婦女在同業組合已經實行的普遍文化工作上所達到的程度的大概。每個工廠或學校中的壁報都有特別一部份專供婦女問題的討論。在普通的俱樂部之外，同業組合更組織有赤色俱樂部 (Red Coners)，室裏設有報紙書籍和傳單以供不在大俱樂部的工人的觀覽。不在平常活動中互相接近的女工和工人妻子全靠旅行或游覽來偶時相會，已經組織特別的「家庭夜會」以招徠婦女，男子們都帶他們的妻子和兒童來赴會，夜會

的程序單上排有許多特色，並吩咐負責的保姆在一間特別室裏看護那些兒童，這個特別室往往發展為通常的夜間育兒室。

因為同業組合的活動，工廠不再僅是工作的場所，一切新社會的組織如俱樂部、課堂、游藝室、醫院、劇場和圖書館都集聚在工廠的周圍。工人不須爭佔別個工友的先和取得更多的報酬以利用較苦的工友所不能得到的娛樂來供給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當着工廠生產增加，休息和教育的機會也就增加，工人在休息期間不須帶他的妻子和十三個兒童去康來(Coney)島避暑，相反地他駛着同業組合賜給的船順流到莫斯科、德尼帕(Dnieper)或頓(Don)去了。兒童去作破天荒的野遊，妻子整天自由。大多數婦女本來都很困倦或很冷淡去利用這一切，但是她們正學習成熟，在一九二七年已派遣成萬的工人去進休息所或療養院。

直到一九二四年，婦女的失業增加至六十萬人，約佔註冊的失業者全數二分之一，男子和婦女的失業約到一九二六年還在確實地增高。工廠倒閉時工人通常

退回鄉村，而在工業復活以後不獨舊時的工人源源而來，並有聽到改良的工資和待遇的新工人也源源而來，於是工業不能迅速地發展足以完全雇用他們。現在失業的增高已經制止，而且目前工業的發展可以無疑地減少失業者至最小限度。男子和婦女大多數的失業者都是沒有技能的份子，因為有技能的工人差不多有無限制的需要。

共產黨、同業組合和勞工部現在已用制止解雇或不雇婦女的理由和增加她們的訓練機會的法令實行經常的運動以減少婦女的失業。失業保險約佔失業者百分之五，可是因為這種保險多半給予有技能的工人，故此男子所得的保險金比婦女為多。保險金本身平常僅有五盧布至十五盧布，但有給予一切失業者的特權，如免租宿舍、免費公共服務、免稅、低利貸等，而失業女工在生育時得與失業的男工一般領取同樣的加薪和免費醫治。其他解除失業的特別方法便是公共服務和小規模的勞動組合(Labour ateliers)，失業者四分之一得到這種保護的便是婦女。

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勞動立法是對婦女極端重要的，——八小時勞動、社會保險、療養所的診治、休息所、年假、特別的工作衣服、保護計劃和衛生方法，禁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允許十四歲至十六歲兒童相等於讀書時間的四小時工作，和十六歲至十八歲兒童的六小時工作。在這些法規上似乎婦女所得的利益比男子爲多，因爲過去不衛生和危險的情形在婦女方面比在男子方面甚至感受更有害的影響。除去這些和男子共同的獲得之外，更有關劑婦女工作的特別法律，建築在母權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和婦女的生理差異之上。關於產業工人四個月的生育假期已應用於其工作需要特別技能的非產業工人了，並給予職員工人 (Office Worker) 生育假期三個月，流產以後亦給予假期三星期。假如婦女在四個月之後患病，未滿兩個月期限不能將她開除。又如如雙生子，則嬰兒的分配物加倍。尋找職業的產母不得視爲三個月的分娩假期的例外。

關於允許婦女攜舉的重量勞動法典上已有詳盡的指示：十八歲以下的女子不

得任需要舉重的工作。雇用女挑夫的地方她們的標準等於男子的標準一半。凡在車輪機器或需要特別技能的職業上工作的婦女都許每月曠工兩天。在印刷業化學工業和其他職業等部份工人和鉛屑毒氣或其他危險情形接觸，均禁止雇用婦女，且如她們願用於不衛生的環境裏，應給予她們以多量的牛乳和脂肪。原來除去少數的例外不允許婦女的夜工，並反對加入長期的危險職業。結果這個遂釀成一種差別，增加失業，婦女自身亦受保護。於是這又釀成法律暫時的廢弛，因此現在允許婦女在特別情形底下夜間工作，並允許從前被禁止的某些職業，不過這種廢弛不適用於青年女子或產母而已。有些工作如車掌，抹油和搬運之類對於孕婦或產母則完全禁止，而且勞動監督可以常常使婦女離開似乎於其健康有害的工作。

有些地方更有促進婦女加入各種工作的趨勢以反對這種差別，不管她們是否適宜於那種方式的工作，因此礦工組合想出一個計劃以提高礦業學校中的婦女的百分比為百分之一十，而且在某些地方已廢除保護婦女的一切特別法，並冀圖能

經常廢除這些差別。

雷亞沙洛發 (Bazanova) 在其定名為婦女勞動 (Women's Labour) 一九二一
六年莫斯科工人社會出版) 一書上反對這個意見，這本書可說是俄國所已研究的
這問題最完全的研究。她說：

「但是婦女能夠在礦山裏需要技能的職業上有效地工作嗎？同業組合應該爲
這個而追求嗎？依我的意見，婦女沒有理由去到礦山裏工作，因為她們在生理上
不適宜於那種勞動，尤其對於孕婦是十分不可能的。這並不是達到婦女平權的道
路。」

此外雷亞沙洛發更指出他種勞動如木工和建築工業於婦女尤爲困難。她反對
煽動婦女加入新職業的趨勢，這些職業不僅可以妨害她們自己，並且當她們不能
收效時，更可以使整個的運動退化。她接着說：

「既然工人不能在工業本身的進行中實行根本的改變，既然職業的選擇依靠

偶然情形而沒有根據志願和能力的特別的新青年教育，那麼從特別危險的職業除去最孱弱的份子正是當前的第一步。……在專力注意於兩性兒童的生理教育的社會上自然難說男工和女工當中的關係究竟是甚麼，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既不許參加高等職業的活動，而集團飲食和集團起居的組織既使婦女脫離她自己的家庭且甚至處於理想的勞動狀況和最衛生的生活狀況底下，那麼母性功能的成就應置婦女於一種特別情形之內並需要特別的保護法。」

因為全體女工僅有百分之十六是有技能的階級，百分之三九、九是半具技能的，其餘都是沒有技能的，所以俄國現在沒有一種工作會疑其為婦女作的。然而多數人看待他們的戰勝的驛馬却好比看待電車的司機一般，因此俄國現在已有女鉛工、女錠匠、女圖工、女電氣學者、女海員女兵士、女建築師、女工程師、女紅軍軍官和女船主。

現時婦女經濟獨立是在外國很難聽到的一個名詞，革命以前最重要的便是整

個工人階級的經濟獨立，革命以後從沒有人問及婦女應取得她自己生存的權利。就理論言，每個身體健全的男子和婦女不僅有工作的權利，而且有工作的義務，但就事實言，俄國已婚的大多數婦女仍然在經濟上倚賴她的丈夫，除非婦女們習得充分的技能以參加高等報酬的工業並供給家庭預算比現在更多的物質資料，這是不能別樣的。雖然給予同等工作以同等報酬的法律已經創製，但在一九二六年終一切產業女工每月平均的報酬僅爲四一、七四盧布，而男工的報酬則爲六十盧布。這個不僅由於婦女大都沒有技能的原故，且也由於非藉口婦女祇能作和置於低級的男子所作的同樣工作，即藉口於多數男子反對爲婦女同樣的工資而工作的原故。在農業工人中比在產業工人中更容易發生這種情形。

在我寄寓的國家農場 (Zoo Farm) 上婦女只在那些專作「婦女工作」如烹飪洗衣等的職業裏被雇爲定期的用人，但在農忙時節多數婦女便從事於耕耘、刈草、清除、採摘和收穫的日工。她們都是鄉村中最貧苦的農婦 (Bartackis)——多數是

寡婦——她們沒有工具耕種自己的土地，而靠出佃生活。這些婦女的三分之一已組織在土地山林工人的同業組合之內。在一切農業的經營上這是一個公認的原則：即是婦女勞動者每日祇給八十五可比，男子則付一、一盧布。這些婦女是俄國任何工人團體中最落後的；我會再三問過她們爲甚麼不取得和男子同樣的工資，她們只垂着肩說：「以前我們每日僅得十五枚或二十枚可比，現在我們多得五倍，爲甚麼我們還要多得呢？人人都曉得婦女是比男子低廉的。」

很奇怪地末了勉力於這一個計劃，規定應根據工作種類而非工人性別以報酬日間勞動的是那位美國人的指導員。新章程發生效力以後，三個男子和三個婦女同被雇在清除果樹園，而男子聽到新的處置時便拋棄了他們的工具。「爲農婦同樣的工資而工作嗎？世界上從沒有過！我們對此害羞，人人都會笑弄我們。人人都曉得男子更強壯而且能作更好的工作。……」

婦女們大聲叫喝：「那麼好啊！假如你們能比我們作得更好的工作，權就實

驗罷！我們將果樹園分開，你們取得那一端，我們就取得這一端。……」

結果不僅婦女們首先完成牠們的那一端，而且作得更好，不是男子所應爭長的。這個同樣的事情更發現在其他職務裏，仍舊是婦女佔先。於是男子對於新的處置再也不致有所憤恨，並且平心靜氣承認他的「農婦的工資」。然而關於農場的工作我須秉公地補說一句：即是儘最簡單的形式的工作是這樣。婦女除非有技能，儘是很壞地打粗工作，因此就易明白爲甚麼婦女的勞動看得比男子的勞動更低廉的原故。不過有時一個婦女的工作相當於幾個男子的工作，但這樣情形是絕少的。

婦女既然一步一步取得加入男子所認爲是他們自己的世界，於是對於各項工業裏應用婦女勞動的系統的研究遂十分注意。在勞工部 (Zakomtrud) 底下的婦女勞動中央委員會與其全國各分會和莫斯科科學的勞動學院正從事於婦女的職業病和花柳病的特別研究；如攜舉重量在母性功能上的影響，以及各種身體勞動地

下工作震動和夜工在婦女平常的身體發育上的影響。

這些委員會的發現可以決定將來關於新工業的婦女教育的策略。加入需要特別體格的職業的女子必須有特別的體格檢查，在依照工廠女工的百分比而分配的工廠職工學校之內正努力於爭取體格檢查的所在。

這些工廠職工學校在教育制度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學生通通是學徒，每個工廠中學徒必佔一定數目的百分比，他們從十四歲或十五歲得受兩年至四年不等的訓練。這些學生每日在廠中工作四小時，在學校讀書四小時，給予他們以高等技能的職業所必需的理論知識，具有普通教育的同等程度。初級教育一定的標準是加入工廠必需的。我曾在我所參觀的許多工廠學校裏發現女子的數目和她們所習得的程度至為差異，這個比例大約總比工廠女工的數目為小，不過幾乎無論甚麼地方我都發現女子的數目正在確實地增加，在那些毛織物工廠學校中的女生便是一個好的例子。但在羅斯多夫 (Rothov) 烟草工廠學校中原有學生十二人

，現在只剩兩人，其餘都不得已而被開除了，即其餘兩人的工作據教員告訴我也是很薄弱的。在金屬工業中原來就沒有婦女送入工廠學校，但是現在她們正漸次進升。因為女子的百分比較男子的百分比為低而且她得表示較少的專門知識和技能，所以她們認定自己最適宜於篋工和圖工，只有少數適宜於高等技能的機械工作。在一切工廠學校中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女子僅佔百分之一六、五，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女子佔百分之二二，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女子佔百分之二七，由前面的統計推算，證明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女子的數目應增加為百分之四十。

現在正開始應用團體的個人的學徒制以教授婦女更大的技能，從事有技能的工人利用這個方法担任沒有技能的工人的教師。在一九二六年有婦女九千人已由採用這個制度而進入有技能的階級，還有婦女八萬人進入半技能的階級。有些區域因受婦女勞動地方委員會的鼓勵已實行改進婦女達到高等技能的職業的合法運

動。

並有改進婦女達到高等行政地位的運動。雖然僅有比較的少數加入工業上的高等地位，可是佔有高等地位的那些婦女已經將她們的家務傳統的轉變為好的利益，堅決地強行經濟制度，並時常增加生產。

舊有的風俗固然仍在羣衆中根深柢固，但已有發生革命的婦女的新萌芽。她們是剛強的、堅決的和勇敢的，發展一種獨立性，這獨立在其意義上比投票權和維持她們自己的生存權更加深入。戰爭和革命不只教會了她們能作男子的工作，並也教會了她們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無論是在行政地位上或是從事職業的工人，她們再不是過去屈服的被蹂躪的人類；她們正爲工作本身而滿意於她們的工作；她們已取得高尚自尊和對知識技能不知足的嗜好；她們仍然是少數，但她們是別人的酵母。

第三章 鄉村婦女

一個考察俄國婦女真相的公正視察員可以隨意選擇伽馬列雅夫卡 (Gamale - yuka) 格拉科夫卡 (Grachovka) 烏茲列聖斯克 (Voznesensk) 或馬斯羅夫喀特 (Maslovut) 等鄉村並進入房屋裏視察。房屋都是土磚或木材構成的，圍築一處。房屋的內部是一樣的：一個房間至多兩個房子；大的火炕佔地最多；多半是地板；一張粗陋的棹子和幾把長凳；一廳上面蓋着惡濁羊皮的木牀；牆角裏一些編着褪色紙花的飾金的神像 (Icons) 和一條光彩奪目的手巾；一個吊在天花板下的搖籃。至少有目見的三個兒童。到處都有那種忘不了的局悶氣味。

婦女們不是在田間勞動或在河裏洗衣，便是在織布或烘麵包，或在發狂般的將嬰兒搖來搖去以靜止他的啼哭，或在呆板地毫無神色地坐着那裏全不動作。她們回付視察員的答覆便像是這樣的說：

「啊！這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假如舊時你有一個好的丈夫，你已經很好，現在你仍舊很好，假如不是這樣，從前是打罵，而現在還是打罵。」

「是的，要求離婚是很對的，但是我怎能撫養我的兒童呢？假如遇到那樣，還是兩個人的比一個人的好些。贍養費嗎？是的，我也知道，但是當我知道我的丈夫的錢袋裏沒有甚麼的時候，那對於我有甚麼好處呢？而且假如我的丈夫已死，或是在甚麼地方得有土地，我怎麼能獨自去耕作呢？然而無論怎樣，我們却能共同處理。」

「學習怎樣去讀書寫字嗎？當你以為我有時間去幹那些事情的時候，我就得去取牛乳，去喂豬，去挑水；嬰兒正在喊叫；或是另一個又害病了。還是讓兒童去學習罷。」

「是的，讓兒童去進學校，但是他們在那裏學習甚麼呢？他們是在跑他們的！原來兒童應照父母所吩咐他們的去作，於今他們回到家裏却要告訴我們去作甚

麼了，這是甚麼一回怪事啊！假如你不打他們；你怎能盼望兒童去學習甚麼呢？

我在一個冬天的日子擇定馬斯羅夫喀特的一條街道並走進各戶考察，這些就是覺悟的農民羣衆對我說的談話。

於是我又走進市場地方開了三個纏着頭巾很美的農婦，她們正在一塊閒談如何在那多年被殘踏之後感到有這多的權利。

一位回答我說：「啊！朋友！那完全是騙局，(Urenda) 毫沒有差別！假如上帝給你終年充分的糧食，那便很好，假如不然，你所談的那些婦女權利怎麼會幫助我們呢？」

我再次走進在國家農場工作的最貧苦的農婦團體裏，並對她們說：「自然這廠對於你們比以前更好。」

「怎麼會使你以爲這是更好的呢？我們以前從天明到天黑工作，可是不須常

時是這樣，我們甚至停止工作歌唱，當我們想睡的時候，便躺在太陽底下安睡，工頭不以為意，他自己也是這樣的。然而現在他們要我們固守我們的工作，午後三時回家，回家以後多半須去工作，以前我們回家很遲，來不及作任何更多的工作。」別人都發笑同意。她們承認這或者對於家中有馬和用馬工作的男子的好些，可是對於她們——寡婦或獨身女子，土地就等於烏有，因為她們沒有方法去耕種。

婦女挑重担，婦女耕種、收穫、烘烤、參加各種拼命的活動，同着男子在田間工作，幫助男子割刈並把東俄國命脈所關的那黃金色的禾把。婦女在一年復一年懷着自己的果實的苦痛時候，常被日灼風吹幫助收穫地上的果實。無愛的荒涼的人生造成了她們的多數無愛的荒涼的人類。她們雖感受長期的苦痛，但是她們不曾覺悟男女是同一株樹的分枝，是同一過去的產物，他們和她們並有許多共同的性質。她們說謊偷竊，因為這是唯一的方法，她們能從這種方法取得超過她們的日常勞動所給予她們的粗陋醜惡的最少數以外一切。當她們的生活依據這樣

，她們就像魔鬼般工作，但是在她們自己的地帶以外的工作上她們是懶惰和不精的。她們能夠十分文雅的對待動物，非常殘忍的對待人類，但是她們也剛好相反。用不着將她們概括，因為她們有各種各樣。我曾看見一位年老殘廢的父親同着牲畜住在一間通風的茅棚裏，因為他的女兒不許他住在屋裏。但是我又聽到青年農民在饑荒時代應該親自出外逃荒的時候却投票通過發給老年農民的糧食。打罵人的不僅是男子，婦女也能說出使你血冷的話，假如你和她們熟悉。我曾一次聽到一個農婦毆打她的丈夫。有時她們並告訴我，男子常因受他們的妻子的虐待而到婦女部(Gendel)請願。更有這樣的傳說：男子常在假日將烏得卡酒(Vodka)和家釀飲過乾淨。但是我在復活祭的禮拜日看見一對老年情侶正在街上行走，和任何貧農一般充滿着凶惡，骨子裏他們藏着頑固的思想，除非三十年不能絕滅這幾世紀來養成的迷信和畏懼的痕跡。現在婦女仍然比男子更守舊更崇拜教堂，並更相信教師告訴她們的神鬼。

馬斯羅夫喀特的婦女沿街上下行走，閒談她們的困難和隣居的閑事。她們在他們的屋前坐到幾小時，坐在一面剝香瓜子，一面怨恨這樣那樣，總是這樣怨恨。

但是當請她們到會去幫助將事情作得更好的時候，她們便輕侮地揚着手。鄉村婦女部的組織員拉薩列亞(*Natalia Grudova*)是一位英勇可愛的婦女，不能在婦女部有一點成就，已經離去而進入一所黨立學校，但她不會失意。她告訴我：

「我們將盡力為中年婦女工作，但是要使她們明瞭一切，畢竟是一件難事，現在我打算的是關於青年婦女的工作。」但在這裏也有少數事情已經完成。去年她們選舉初次參加蘇維埃的婦女三人，戰勝了專對有益於婦女的事情而非難侮蔑的代表反對，然而這三位婦女不幸選舉不當，不會作一點工作，蘇維埃裏的富農也不會給她們一點鼓勵。本年馬斯羅夫喀特地方已經決定在蘇維埃裏不僅增加各地所待增加的婦女的數目，並另有能靠而勝任愉快的婦女三人。曾召集代表會議，教員會議，和母親會議討論誰最適宜於這種任務。我曾在鄉村閱報室中參

加過一次代表會議，蘇維埃主席樓述區蘇維埃的意義和功用，注意鄉村中一切有被選舉資格的婦女的名字，並將每個名字提出坦白地討論。

有一位代表討論瑪利亞 (Maria Davidova) 的名字說：「她只知道一票。」但是另一位代表大聲說：「是的，她只知道一票；因為她只享得過一票，——我們不希望她這樣的人加入蘇維埃。」

他們又討論別一個名字說：「她甚至不能照顧她自己的丈夫，可有能力足夠管理全鄉嗎？」

當拉斯替亞 (Nastia Stepanova) 的名字提出之後，大家有一種不平的承認：「她是一個善於活動的農婦——我們就選舉她罷，她也是一個有能的鬥爭者，並不畏怕當着男子發表她的意見。」

坐在牆角上的拉斯替亞通面發紅，便用流利的說話開始吐出她的短處。她拒絕說：「可是我不識字，我不懂得一點甚麼。」

「不碍，你可以學習，你能夠說話，是嗎？這就是這些蘇維埃會議中的主要事務。會中另有別人寫作。」於是她的名字通過了。

這受吉利亞 (Genia Jukova) 強烈地反對，因為她的父親是一個富農，今年富農不能參加蘇維埃的選舉或被選舉。

「是的，假如她的父親是一個富農，她怎麼辦呢？她自己是一個教員，是一個好的工人，而且她能擁護貧苦農民的利益。

於是她也通過了。然後輪到婦女都組織員拉薩列亞 (Natalia Grudova) 的名字。

「自然我們的拉薩列亞必須加入，她比我們其餘的人共同知道的都多，誰能使男子有這樣注意的呢？

婦女會事先就選她們的代表使她們得參加一切鄉村組織，在上屆蘇維埃代表的一個特別會議上，所有在會的男子——包括共產黨員主席在內都謙遜地對待她

女，並好比他們用一塊糖贈給兒童般允許爲她們後援。遇有男子因嬉笑戲謔使婦女斥責的時候，主席便回答說：「是的，你不能希望我們嚴刻地對付婦女，是嗎？」但是選舉婦女參加蘇維埃這是政府的政策，而且當選舉期到來，主席自己就堅強地要求選舉婦女三人，並流利地陳述婦女參加政務的重要。因爲富農沒有參政權，婦女使無人反對而被選出，並且本年她們在蘇維埃的工作上佔有精明的有益的地位。

雖然馬斯羅夫克特的會議難得有婦女到會，但在另一個鄉村亞爾干日爾（*Angelskoye*）地方的會場上却容納不了到會的婦女。她們在三月八日婦女節從全縣起來，會場載得沒有空地，整天有從兩里多遠地方的婦女來參加，有的步行，有的乘馬，婦女整天耐心地等候，直到下午六時開會。晚上會場擁擠，場外有幾百個婦女立在路上。每個鄉村都有代表去參加紀念，報告過去一年中婦女在其鄉村工作的經過，多少人已經學習讀書寫字，明年她們怎樣計劃。少數善於人用清切嘹亮的聲音講演，大多數則不善講演而須別人幫說。其中一人講演尙未完結

就中斷了，忽然從台上流淚起來。目見這種事情忽然發生，目見光亮薄暗的禮堂裏這幾百個婦女放射的目光開始認識生命對於她們竟有超越過去的厄運的意義，這確是一件神祕。

次日我得到一個消息，即是有三十個婦女剛從普列坎斯克 (Prilimsk) 來此參觀農場，她們的代表向我報告其包有婦女二百以上的代表會已捐款贈送不能出外旅行的婦女。普列坎斯克是一個州郡的位置，就那裏的社會規模而論，有比馬斯羅夫克特地方更多的特色，這個代表團便完全包括這些特色，從藥店店東——一個披捲髮和長金耳環、裝束漂亮的紅衣和頭巾，穿着白麻紗外套的大漢起，到一個很老的黑黝農婦扶杖跛行，像似一個得意的小魔鬼止。這位老婦人一定有七十歲以上的年紀，並從她那落齒的牙齦吐出俄國不可思議的潮流，而她的清秀的目光則到處注視。

參觀以後，他們全體進裏飲茶，並答覆我的一些問題。

我請求她們報告近十年來在她們的城市中的婦女生活上所發生的改革情形。

這個代表團的首領是一個熱誠的青年女子，具有豐富的特色，很顯明她是智識份子出身的特色，起來回答我的問題說：

「你應認識直到一九二〇年以後，蘇維埃政權纔臨到我們，那時以前這個地區惟有國內戰爭而已，現在蘇維埃政府已給予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充分權利，政府正實現……。」一個農婦將她的話打斷。

「讓我告訴她能！」於是她就開始向我報告。

「同志！首先你想這許多婦女能夠在實際上團聚一塊並出外旅行，像這樣的事情在以前是從沒有的！這裏巴柏希加 (Babushka) 從來不曾乘過火車，然而現在我們整天都是上課開會。你看我已學習了讀書寫字，當我看見傳單的時候，我自己能夠瞭解，而且當我那遠在西伯利亞的兒子的信寄回來時，我也不像蠢呆一般要跑出請求我的隣人。此外還有其他事情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再不畏怕，主

主要地就是我們再不怕我們的丈夫，我們去作甚麼不須請求他們的允許。自我充任代表以來，我再不信仰宗教，我明白這種教會的勾當是怎樣的無意義和他們歷來怎樣地欺騙我們。我不相信這裏還有那一個再去教堂禱告。」

假如別人不想也起來發言，他將無限制地繼續下去。當開始討論節育問題，他們簡直沒有停止。鄉村婦女對於這個問題正和我平常的經驗相反，她們似乎都是很瞭解的。當我們正在討論新道德的時候，那位藥店的夫人靠近我的身旁說道：

「同志！現在請你告訴我！假如我奪取你的丈夫離開了你，你對我的態度怎樣？」

在我能夠說完我的問題以前，她們便開始討論關於美國的問題。她們想要知道美國革命到來時我們是否有一個婦女部，她們特別盼望我們明瞭俄國的婦女運動完全不是女權主義。

那個領袖解釋說：「我們正想使婦女和男子平權，我們並不僅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就想選舉她去參政，和你們在美國所用的方法一樣。例如我們反對選舉富農

婦女正如反對選舉富農男子一樣的實在。」

鄉村在開始覺悟的時候，往往沒有健全的組織，單就婦女部、戲場、圖書館、離婚法和較好的農業而論，像煞都是一種顏料脂粉。當比較重要的事情尙付缺如的時候，凡是不能生產合作社所供給的化裝品的人們，都要用發生驚異效力的甜菜汁和麵粉。在星期日和例假日高底皮鞋在村鎮路上的灰塵中走過。這些正在建立俄國新秩序的人類十分類似一切其他的人類，沒有甚麼特別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就是全俄每個鄉村盛極一時的婦女，她們担负新秩序所應供獻的最好辦法，學習讀書寫字，組織育兒室開辦戲劇團或者給予男子一些較好的農業方法的例子，至於他們數目的多少這倒沒有甚麼重要。

鄉村婦女有和男子同等的土地權利，並在她們從前很少出席和很少說話的會議上有代表家庭的同等權利。全俄現有婦女二百萬耕作自己的土地，變成爲她們自己的家庭的首領。雖然羣衆還是羞怯的和退化的，可是大多數已得自由發表意見

見，即是從前定爲不應干與於她們無關的事情的青年亦能受人敬重地注意。去年計有一百個婦女被選參加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СССР)和烏克蘭兩地的鄉蘇維埃，且在一九二七年甚至更多，因有一六九婦女參與莫斯科的全國蘇維埃聯合會議。婦女在選舉上佔有的範圍已經由被選舉資格的人數之百分之五變爲百分之九十，並且這個數目還在逐年增加。單是西伯利亞的鄉蘇維埃中就有女代表八千人，並有四十五個西伯利亞鄉村都是婦女任蘇維埃主席。

她們不是時常覺得參加政務是容易的，例如安娜(Anna Salamova)被選爲烏茲來寧斯開(Узнесенск)鄉蘇維埃主席，鄉民不能十分贊揚她的工作。某鄉士農婦——一個有大家庭的寡婦——以爲消費一切管家的精力於鄉村中是一件恥辱，並願自己成爲她所承諾的婚姻的一種禮物。她以爲希望男子甘心妻子拋棄她的家務這是何等的怪事！鄉村中其他婦女也都作這種想。

她們說：「還是從馬車上下來罷！現在你已結婚，你再不是獨身女子，你的

主人需要吃飯，那麼你怎膽跑到鄉村去呢？但是安那堅持她自己的意見，且在末了設法避免她的家務和她的丈夫。

其次任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白羅發(Feodosia Assipovna Shurova)。我曾在報紙上看見她的照片至少十多次，並在莫斯科某次婦女部會議上和她接談過。她經常穿着同樣的樸實的農民服裝，頭上圍着一條白色頭巾，從未改換過這個模樣。他現已滿五十歲，是從西伯利亞亞爾泰(Alta)省來的。當我請她將她的生活告訴我時，她說沒有甚麼可以報告。

「我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我的父親去世很早，並留下一個大家庭。當我十四歲時，母親送我在一所僧院裏作工，那些教徒令我赤着足甚至裸着上身去牧養他們的牲畜，我因為不認忍耐，於是便跑開了。以後我又被雇於別的農民家裏。當我十七歲時，母親命我和一個四十歲的農奴(Moujik)結婚。他在飲酒過後變得像瘋狗般的醜惡，幾乎將我打得要命。我想和他離婚，但我的母親說這是一

惡。

『及至一九一七年，我們鄉村的管理權改變了多少次。當一九一九年科耳察開(Kolchak)的軍隊到來，我隱匿在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員的貧農家裏，被那位牧師偷見了，然後軍隊到來將我毆打。從此以後，我遂不爲宗教所利用，開始爲貧苦農民去工作。他們選舉我爲參加縣區(Volosk)會議的代表，我却通宵啼哭：他們送我到那裏去呢？但是當我到達那裏以後，我便熟悉了許多事情，我的眼界已開展一點。以後他們又選舉我去參加郡區(Olyok)會議省區(Gubernia)會議，這是我離開家庭第一次的遠足旅行。當我再又回家以後，我遂開始讀書，每晚學寫三兩封信。後來又派我參加莫斯科蘇維埃會議。那些農婦說：「她和我一樣是一個農婦(Dala)，但她現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工作啊！」現在我已識字，再不是盲目。我將終身爲我們的農婦工作。』

『男子對你們的工作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這樣地問她：

「那是很好的，讓我告訴你罷！他們正開始尊重我們的主權，因為婦女在蘇維埃中工作往往比男子爲好，並很懂得怎樣經濟化。起初男子像雄雞般對我們誇叫，無論一個女子怎樣能夠懂得，他們總說你們所懂得的無非是些油鹽醬醋，現在可就不同了。」

「然則甚麼是你們的主要問題呢？」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教育是一件事；我們的預算案還不充足。其次我們還有無賴漢和馬賊，我們的法庭都不十分嚴厲。另一件事就是我們的農婦在生產兒童的時候得與女工般應有四個月的假期。可是現在她們在生育的次日就去田間工作啊！我們的貧農比他們的妻子更善於看管他們的牲畜。」

農婦的活，的不僅表現在蘇維埃中，即在資助貧農寡婦等的鄉村互助委員會上他們也大都活動。消費合作社的社員有農婦五十萬以上，手工業（*Handicraft*）合作社的社員有農婦二十八萬，更有大多數加入農業合作社。但是這個比例和這

些合作社的男社員相比仍舊是少數，因為以丈夫和男子代表人的風氣仍然堅持。少數農婦已成爲法官，從前我們曾在路上遇着過一位。她告訴我，她爲預備計曾在羅斯托夫(Rostov)習過一年的學業，那裏聽講的有男子九十六人和婦女十六人。入習這種學業祇需受過初等教育，但必完全瞭解蘇維埃政府的政綱。習完這種課程的僅有四個婦女。他說試驗是基於運用常識的能力而不是書本知識。他的鄉村中的大多數案件都不與贖養費有關。

她告訴我說：『去作一個法官不是容易的事，必須注意估量案件的各方面，不能蹈蘇維埃法律上的陳列，每宗案件應該根據其特別情形而判決，這並不是一件單簡的事，要找出真相何在。——你的意識告訴你的往往和事實將要證明的不同。因此社會的利益往往就須首先注意。』

她聲明她自己是一個道德的說服而不是壓迫的方法的信仰者。假如一個妻子常時埋怨她的丈夫，他應對她小心，等她瞭解他以後，或則實行調解，或則和他

同意於合理的判斷，不用向法院起訴。

在研究俄國婦女新地位的上而必須注意一切達到鄉村的改革比達到城市的改革遲緩遲慢和多數農婦的生活這只從革命得到少許改革的事實。但是一切不信是這這些笨性羣衆的可能的懷疑派祇要注意布利安斯開省(Briansk)威太伊夫卡鄉(Urtyvska)通訊所報告的現代立夕斯特塔(Iytsikrata)和加拉塞尼(Akainya Krasnaya)的消息，便不得不重新振作。

亞克信雅(Aksinya)開始出席各種會議並參加威太伊夫卡的政務。她的家庭是專橫的，尤其是她的丈夫西明安(Simion)，在她未得申訴以前，他總是這樣的居心壓迫。因此他在酒醉時便將她毆打，叫他不要多管男子的事。她略微啼哭，然後拭乾她的眼淚而跑入婦女部。半小時之內全村中全體婦女都集聚在校舍裏，舉行婦女大會。

天漸變黑，太陽落了山，但是男子們還沒有休息：兒童啼哭，又得去取母牛

牛乳，豬也忍不住地叫號要喂晚食，甚麼困苦到臨到了。那裏去找農婦呢？隣人昏亂地跑來跑去。「你的妻子在那裏呢？」——「出去了罷！」——「那麼你的呢？」——「死掉了罷」，「恐怕有人偷了他們去罷！」——「奇怪！我在青天白日底下生活了四十年，從沒有遇到發生像這樣的事情！」

天已昏黑。後來男子們曉得威太伊夫卡鄉的婦女都在校舍裏，他們就像規火般撞進學校，並將學校圍住，舉行一個淒烈的集會，一面請求，一面又恐嚇。

農婦頓時肅靜，於是亞克信雅持着一張紙向前，並告訴男子剛是叫喊決不能使她們回去，他們必須聽信紙上所寫的甚麼。會場靜止時，亞克信雅遂開始宣讀：

「威太伊夫卡鄉已婚的全體女性國民特向威太伊夫卡鄉已婚的全體男性國民提出哀的美敦：我們已婚的全體婦女是威太伊夫卡鄉的國民，生活於艱苦的情形底下。我們的丈夫毆打我們，從未聽到他們一句合禮的話。他們以牲畜般看待我們，以後我們再不忍受這樣的侮辱，因此我們要寫這個哀的美敦。我們同意在家

裏工作並爲我們的丈夫的助手，但是我們應反轉來請求，我們不可完全屈服於丈夫的意志，他們不可閉着手那樣地自由，稱我們爲「老惡婆」，「母狗」，「狼婆」和其他不堪出口的名詞。並且還須補說，我們不可以分散，除非他們都在這張紙上簽下他們的名字，我們不能跟他們回去。」

有些男子忍不住地嘲笑，而婦女們則嚴重肅靜。然後男子知道這不是可以嘲笑的事，又開始咒罵婦女。

亞克信雅要求男子們有禮地行動，並且反復說明除非將這條約簽名，婦女們決不會離開學校。

男子們在地上頓足，肆口辱罵。儘量地啼哭，然後含羞地一個個走近亞克信雅的面前用戰慄的手簽了名，那些不識字的男子也簽上一個交叉。

散會以後西明安深夜奔回家裏，暗自怨語：「於今每日裏總有幾番新樣，任你回到那裏，都有些翻新有些不同了。但是不打你的妻子怎樣去生存啊！……」

第四章 婦女之參與公共生活

當多數派開始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們以為沒有單獨的婦女運動的必要；憲法担保婦女的充分平等，無產階級獨裁可以強行這種平等，普及教育也可以訓練婦女運用這種平等，但是幾世紀來的習染太深，而有領袖資格的婦女太少。整個的婦女從來不是在政治上活動的，而且臨時優秀的鬥爭者俱因革命的動亂和罷工而犧牲了，有階級意識的份子十分有限，婦女羣衆則和新政府隔離尙遠。就大體言，農民婦女反對革命，勞動婦女雖有較多的幫助，但要她們表現很多的材能，大部份是太沒有訓練和落後的。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舉行的第一次勞動婦女大會上決定特別委員會的組織以訓練婦女運用她們的權利，然而這個方法終於不能生效，而在一九一九年雖有少數人根據這是女權主義的理由反對這種辦法，可是共產黨的工農婦女部終於成立。從此婦女的活動遂直接增加，成千的緊急紅色看護

隊加入戰線，許多婦女完成了軍事上的職務：掘壕溝，裝電線，担任沿戰線的政
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紅軍中約有兩千婦女遭了傷殺，並有二十八個婦女受有紅軍
徽章的勳位。在饑荒時期，婦女部大部份担負救濟工作。許多人奇怪大多數婦女
在革命以後還未置身於特別傑出的事業，但是假如祇有一位女委員科郎泰 (Ka-
o Tai) —— 後來成爲全世界第一個女公使，那麼羣衆中就有許多婦女可作女英雄
的事業。自從一九一九年婦女部組織以來，共產黨裏婦女黨員的數目已從六萬四
千九百九十增至一十四萬，現在女黨員的數目佔黨員百分之一三·一，與一九一
九年的百分之七·八相差遠甚。然而婦女部還不曾首先注意於提拔會員加入共產
黨。她們的任務是一種教育的任務：教育婦女如何使用她們的權利，增高她的政
治認識，並準備她們參加建築社會主義的國家。用來完成這個任務的主要方法便
是婦女代表團的組織，每年由儘大多數能參加選舉的婦女選舉每工人十人中的一
人每家婦或農民百人中的一人組織婦女代表團。這樣被選舉的婦女在一個有練的

黨員工人的領導底下每月開會兩次，並教以關於政府的組織和問題、婦女的地位和權利以及教育、合作事業、生活條件等問題的功課。關於勞動婦女的功課則集中注意於產業組合和同業組合的問題，關於農民的功課則集中注意於農業和鄉村問題。

爲各特別問題更深的研究計，每個代表團又分爲若干組，各組的組員附屬於各組正與學生實習員 (Praktisan) 附屬於區蘇維埃合作社或同業組合的組織一般。這些學校的首領已受職務上的訓練，使她們有充分熟悉其組織的可能，並給予她們一些實際工作。在一九二六年秋季，全國有被選舉的女代表五十萬，百分之六十爲農民，百分之二十爲工人，其餘則爲家婦、職員工人和僕役。代表團的新組織每年選舉一次，且又介紹畢業生充任教員，並取得剛在那裏受過訓練的學校裏的適當地位。每次開會，各代表在會上向她們的選舉者報告。此外婦女又實行羣衆運動，她們想以羣衆運動利用集會、會議和個別談話來提起那些非代表的勞

動婦女和農民婦女的興趣。

婦女部的領袖每年從俄國各地集合於莫斯科一次。阿替奧吉拉 (Artiokins) 是一個舊時的毛織物工人，係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少數女委員之一和婦女部主席，她曾在我前年十一月參加的會議上充當主席，聰明而有法度，得一位穿紅色深胸衣的農婦加里吉拉 (Kalishina) 有力地幫助。這約計一百五十個婦女的大半都超過三十歲，並且大半都參加過革命以前的黨裏工作，雖有多少勞動婦女和農民婦女僅在一九一七年以來纔開始活動。就大體言，她們都裝着簡單甚至惡劣；她們似乎都是過分的能幹的，並能用有條理有秩序的方法進行她們的討論。她們的少數具有高等政治家的模樣，但就多數而論，她們都是帶有母親神氣的人，除出莫斯科一位因初次出席而害羞的農婦以外，全體都是優秀的演說家。她們的講演就我看來，似乎比我所參加的許多會議上的男子所常說的更少浪費的話語。

自從這個會議繼着共產黨第十五次年會舉行之後，她們的主要任務便是在婦

女運動上運用政黨的策略，現時共產黨的重要企圖即是工業化和全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她們所謂工業化這個名詞的意義即是，恢復時期已經過去，而復興時期亦已到來。工業和農業已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線，並達到舊方法的限制中的最高限度，因此舊機器已不合用的，她們必注轉變其注意於生產工具的製造，而非消費的貨物的製造，舊的不經濟的工具必須換成新的機器和技術。至於農業也不可排除在工業化綱領之外，農民不僅應為增多的工人隊伍儲蓄更多的糧食，不僅應交換城市中取得的製造品，不僅應用更多的剩餘出口貨以儲備經費取得俄國尚屬不能製造的機器；並須為工廠生產更多的原料。為要完成這個，農民也須有新的工具和機器，農業本身必須工業化。

集中注意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是共產黨裏一部份人的勝利的結果，他們相信一個不願世界其他各國的革命運動的國家裏能夠達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即是說在國有工業的長足發展之外，應比以前更注意於集產組織的問題，這就是滅

低製造品的價格並嚴厲實行經濟的統治 (Therapie of economy)。他們認為除非婦女有完全的和理解的合作，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可能的。共產黨大會通過許多堅強的決議案，廢除固執對於婦女的保守態度，並主張加倍努力增進她們的活動。

整個會議的總結便是如何去使她們的工作更生動和更實際，因為多數婦女都贊成偏重研究理論問題的傾向，例如據說在某次大會中，發言人已描述捷克斯拉夫的合作運動，但沒有一句說及橫在十字街頭的合作社，今年的議事綱領要求日程上的每個問題都應關連地方的實際問題。

一個代表向我說：「我們沒有時間等待烏托邦，我們正在用我們所有的材料來儘可能地作最後的打算。當我們已經成就可算是一個非常大的勝利的時候，甚至還不會指導我們的人民去洗面漱口。」

烏茲來摩斯開縣婦女部部長委拉 (Vera Alexeyeva) 的低聲用幽默的起落和謹

嚴的暗示煽動全場。當我向她問及關於縣內女織物工人的情形時，她教我親自出外考察。

◎幾星期以後我在微雨中乘坐一輛馬車經過那大毛織物中心的泥濘到了一所小的工人宿舍，委拉的大身材就住在那裏。那時天氣很早，委拉滿身穿着與我在門旁相值，帶我進入一間房裏，這似乎對她的床舖她的棹子和她自己過於壓榨，一盞燈光黑暗地點在桌上一本展開的法文文法的前面。

她解釋說：「現在是必須讀書的唯一時間。這裏有一封去年從法國寄來的信，我現在學習法文，原想能和將法國女工情形寫給我的那個同志通信。」

她的母親多癩且又硬直，好比一根老樅樹，趕快把湯點弄好了。於是委拉的兒童困乏地來吃早餐，那三個兒童中最大的一個便是她的母親較可愛的和較美麗的產物。她新近從烏克蘭師範學校畢業回來，現在正開始在一個工廠育兒室裏工作。那位年老的母親怨憤地對我說：「委拉今天要進醫院去實習，她在幾星期之

前就好去的，然而起先是這一回事，後來又是那一回事把她攔了。」

委拉連忙插口說：「那裏！那裏！母親！這位同志只有今天在這裏，明天我就可以去。」

我們剛在早餐之後就離開了，在俄國以外無論甚麼地方，委拉的奇異身材總可以使人凝視發笑。當我們在泥濘中擇路走的時候，她戴着一頂粗陋的男孩的帽子罩在比男孩的假髮更多的頭上，擊着一條形容不出的粗澀的黑皮帶，兩端橫結在她的寬博的胸前，她的短裙子露出深黑皮鞋上一雙六寸長的白襪，皮鞋外面透着一對男子的木靴，樣子要比皮鞋大過兩倍。

委拉工作過忙，不能向我盡量告訴她的出身，但我已知道她當十歲時就在烏克蘭一個香煙廠裏工作，每月僅收入七盧布。她曾參加過許多次的罷工，並坐過比她能記憶的更多次的牢獄，是當地第一個社會革命家，曾在十一月革命的時候加入多數黨，曾派到戰區在士兵中作過宣傳工作並指揮過國內戰爭。當着彼得盧

拉 (Pelura) 的土匪橫行烏克蘭時，她是三個騎兵游擊隊當中的一個隊長——其餘兩個是男子，有幾星期日夜在馬上偵察土匪，陸續和他們交戰。

『時局漸達和平以後，他們又要求我去作婦女運動，人人迎笑，完全不想我是一個農婦。初起我自己並未十分想到這個觀念，我已像一個男子般被這樣用着去周旋追擊，並裝束男子的衣服。以後我比較消瘦，還是時常認作一個男子。但是我須服從黨紀，因此，以後我就變為不是那樣地不適宜於工作。』

我問她自從她初次開始去作婦女運動以來，在婦女的態度上有甚麼主要的差別。

她回答說：『世界上一切都有差別！我回想我召集的第一次婦女大會，我怎樣設法去吸引婦女出來討論我們當前的問題，於是人人一人來到討論她自己的困難，每人都要報告她在革命和饑荒的時期中所感受的一切：怎樣她能取得麵包和衣服？怎樣她能得到工作？爲甚麼有這多的不幸臨在她的身上？現在她們正在討

論婦女的本身的問題：怎樣我們能組織育兒室去養育我們的兒童？怎樣能改良我們的待遇？因此能使婦女得去集體地思想和行動這便是一個大的進步。自然她們不完全是這樣，她們的少數還是和她們平時生活般地生活。……」

我們到了一座大的白屋裏，該省一切共產黨的組織都設在這房屋的各大理石禮堂裏，而不是住的一個男子和他的妻子及十五個僕役了。委拉與我離開，去到婦女部與她的助手談話，她說須到準備年會的同業組合執行委員會去報告，短時間裏就可以回來。這個助手曾在當地最大的比門(BIRM)毛織物廠工作不久，報告全區織物工人一十二萬六千婦女佔三分之二，其中農婦佔二萬六千，她們都在最近兩年以來初來工廠工作。

「要使這些婦女在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上感覺興趣或是甚至學習怎樣去讀書寫字，你能想像這是怎樣的困難！她們的大多數每早都在五里至十里之外從她們的鄉村走來並在晚上回去。你能看見她們乘早沿着各方的路走來，好像一羣黑的

矮人，你怎能希望她們來到會呢？這是我所知道的實情，這三年以來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無論困難怎樣，這些婦女却有三萬人已在去年用各種方法加入婦女部，並有八百以上的婦女充任代表。全省已組織幼稚園五十處，成千的婦女正在政治團體裏學習，並有三千婦女是研究家政和於婦女有直接興趣的其他問題的團體裏的會員。她說自從委拉抵此兩年以來，這種活動大多已經發展。從此以後選舉參加蘇維埃的婦女的數目已從百分之十九增至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裏女社員的數目已從四萬八千增至七萬，共產黨裏的女黨員已從百分之十八增至百分之二三·四。

在委拉搖著頭表示女同志的頑強回來以前，約略過了兩小時。

她說：「省同業組合執行委員會裏僅有婦女兩人，現經全體決定，新委員會名單上應再添婦女兩人，但在最後一分鐘尚有少數男子攻詰。他們說在婦女不能取得這種負責的職務以前，我們應去選舉較有教育的人。我就說十年的實際經

驗比五年的研究更有教育的效果。並且除非男子給予她們以機會，使她擔負更多的責任，婦女是從不得受教育的。末了他們允許了，因此現在我們在新委員會名單上有四個婦女。無疑地她們可以當選。

比門廠參觀以後，我便在合作社的食堂裏用午餐，並看見委拉的女兒在一間差目的育兒室裏和一個曾經送到莫斯科學習看護的勞動婦女工作。我們再去工人俱樂部，委拉在路上指點一個音樂專門學校（Musical Technicum）。許多較有天材的工人都由同業組合送去那裏學習。我向婦女和同業組合的文化工作有甚麼連繫。

她回答說：「那在最近幾年中有一種銳利的成績。就根本言，一切工廠中的婦女運動都落在置身於婦女部的女組織員的肩上，結果工廠委員往往不能在婦女運動上着手，並拒絕在他們的議程上提出對婦女有特別利益的問題。婦女既不會參加他們所召集的會議——『讓我們聽那些農婦要去說些甚麼』——，並怕表示她們自己的意見，於是就有組織特別的婦女會議的必要。雖然這於引起婦女的興趣

有些好的效果，可是同時就釀成「我們」和「他們」的態度，所以我們決定將方法改變。上次同業組合大會主張以婦女運動的責任完全附屬工廠委員會，並指示同業組合在他們的議程上包括對婦女有特別利益的問題。這個方法發生一種非常健全的影響。從此以後同業組合在吸取婦女參加他們的工作上越發十分活動。於今工廠裏雖算還有婦女部的組織員，但她們專注意於代表會議和黨的工作，而同業組合則專管一切經常工作和文化工作。然而為同業組合運動計劃的則仍是婦女部。」

早班工人已從工廠裏來到這個大的俱樂部，於是各房都填滿了，一羣青年婦女和女子正在學習剪裁縫紉，同時還有一遍關於婦女參加將來的蘇維埃選舉的重要演說。

委拉說：「我們如果不能用這一個方法使她們到會，那便試用別一個方法。本來有許多婦女我們都不能得她們到會，然而假如我們給她們一些實用的東西，你看她們便怎樣來了！當她們縫紉時，我們能給她們一些關於政治、合作社、和

衛生的演說，我們常從兒童的保護着手，她們就會不知不覺地發生興趣。我們的主要觀念是在使她們實在地願意來參加，不可僅用段片的乾燥的議程去強迫她們。

1。

有一間特別室專為討論性的問題，設有說明花柳病的影響、禁止早期性交、雜交、和飲酒的圖表和照片。工廠醫生正在向着一羣婦女和女子講授關於衛生的演說。體育場上正充滿着婦女。觀覽室裏男工和女工正在觀劇。

委拉不僅在這一切運動上是婦女方面背後的指導力量，並也關心鄉村的婦女，經常地派她的組織員去鞏固農婦中正在實行的運動，計劃夏季運動場的開設，召集會議，自己並在農婦中巡視。她在晚上要去開班，上課，參加會議，準備報告，正和白天一樣地忙碌。她是一架有力的發電機，她是正在等待過激的變動或破壞以找到她們的道路，並漸漸用政治力量不斷地掃除幾世紀來加於女性上的愚昧和偏見的黑幕之成千的婦女中惟一的一個。

婦女部的主要工作雖在產業工人和農民當中，但她並不忽視職員工人、家婦和僕役，這些婦女也經加入她們的同業組合、代表會議或家庭合作社。僕役往往是新從鄉村而來不識字的農民女子，毫不懂得蘇維埃法律。然而她們漸漸從婦女部聽到同業組合的存在，同業組合正和保障任何產業工人一樣保障她們關於八小時勞動、每週一日休息、特別假日、假期和社會保險的權利。住近工廠俱樂部並參加工廠的文化活動的家婦和住於工人鄉村(Polajoloko)或公共家庭的婦女都在她們居住的地方組織特別代表團。

婦女部利用合作社以實行特別的婦女運動，因此合作社時常提倡補助育兒室的組織的經費，多數合作社並有特別的母親和嬰兒的處所用以供給嬰兒所需要的物品。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蘇俄共有消費合作社社員一五八六九〇人。婦女中的生產合作運動也值得稱獎。寡婦和單身婦女並在許多鄉村裏已專為牛油和乾酪的生產或實行某些手工業而組織單式的合作社。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往往是這年計劃上的一個焦點，在這一天全俄舉行婦女的特別集會和會議。這天成開辦新的育兒室和會場、新的食堂和洗濯室，並促進婦女團體達到更有技能的職業的機會。婦女什誌發行專號，全俄一切報紙都討論這一天的婦女運動，準備更遠的進步。婦女停工半日去開會，夜間劇場停業以供婦女會場之用。最高婦女部出版四種月刊。全蘇維埃聯邦共有婦女雜誌約十五種，銷行三三七四〇〇份，然而這不是代表讀者的數目，因為預約都係團體機關、俱樂部，圖書館鄉村閱報室等處所訂購。這些雜誌均用淺近的語言編輯，解釋又極詳盡。假如某大工廠的檢察證明該廠大多數女工都在讀流行的什誌，婦女部便迅速地在其出版物上加添流行的篇幅和註脚，從此以後出版物遂越變流行。對於這些計誌特別努力發展婦女的工廠通訊(Dachbars)和鄉村通訊(Sel Posts)，由工廠婦女和鄉村婦女擔任通訊員，且有成千的婦女是定期投稿人。此外並鼓勵婦女擔任定期報紙的通訊員，全俄二十四萬工廠通訊員當中婦女佔三萬人。這是一種非

常重要的制度，人民能利用這種制度時常對於一般政治、工廠經理或鄉村官吏的行政發表不滿的意見，並得時常發生行動，因為這種通訊受人注意，有時甚至沒有地方將牠完全發表。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已由較有材識的女工通訊員組織無產階級婦女著作家聯合會，她們每星期從各工廠來集會一次以考察並批評彼此的通訊。

婦女部的工作發展到了蘇俄的每個區域，爲要充分地認識其意義何在，則有一查地圖的必要。散居大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中亞細亞和遠東共和國的人民有三千多萬屬於一百多種族的非俄羅斯人。在替委蘭（Timurlane）和其他已死的女英雄的墳墓，優美的尖塔，甜杏的樹林，鮮美的果實以及華麗的顏色當中，婦女的生活仍舊是惡劣的。這些邊陲的人民無疑地生活於原始情形之下。他們的主要職業便是粗陋的農業棉花生產和畜牧，而在城市中則是手工業和商業。中亞細亞人口的百分之十爲俄羅斯人，其餘大半爲回教徒，蘇維埃政府對於

回教徒雖有完全的政治制裁力，然而回教法律(Daria)依然在社會風俗上堅持着。男子可以有四個妻子，他們竟至將這四個妻子都關在房屋的內庭裏以奴隸看待，而且假如丈夫身死，這些寡婦便和其餘的財產都遺交最近的親屬。買賣婚姻仍舊普遍，妻子的價格自羊二十頭至駱駝七十頭因各地而不同，但因駱駝一頭可值一百盧布，所以貧苦的土耳其人(Turkmen)農民痛恨他們甚至不得有一個妻子，而富人則有兩個或三個。祇要付有高價在後，女子的誘騙可以得父母深切的承認。在家庭和田間婦女的勞動被其父親或丈夫無情地剝削。假如她要完全出門，必將她嚴密地遮蓋，而且多半不許她在市場上露面以購買她自己的食物和衣服。在這許多人民當中婦女確實比男子能作更生產的工作，男子差不多僅置身於商業。

凡想反抗的婦女都殘忍地感受苦痛。阿茲柏吉斯敦(Dzobkistan)地方的一個女子因為不滿意她的丈夫想法去解除她的面衣，曾經鎖禁五年。回教法律允許「丈夫剝奪其妻子的自由，並在警告以後處以輕快的體刑」。允許十二歲時結婚，

但過往在春情發動的初期就已實行，衛生的情形不堪言說，並流行種種疾病。

婦女自己是非常不識字和不覺悟的，以致沒有機會明瞭蘇維埃法律已經廢除這一切野蠻的風俗並改變婦女整個的地位。在一九二四年全土耳其人中僅有識字的婦女二十五人，城市中的阿茲柏人僅有百分之一。五是識字的，若在鄉村中僅有萬分之一是識字的。直到一九二三年，這些鄉村中婦女的地位還毫無有改革。共產黨員在他的家裏到處都給予婦女以自由，但在土民共產黨員當中仍然墨守舊的風俗。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婦女都纔在他們的當中工作，現在他們的宣傳已經普遍。假如可能，土民婦女得送入莫斯科訓練，準備在他們自己的人民當中工作，否則便由俄羅斯人在她們當中工作。至於這些地方包括些甚麼工作，可從這個事實判定：即是好似土民婦女被父親和丈夫加怒一樣已發生俄羅斯女組織員的暗殺事件。東方工作的整個方法必須適應當地的情形，運用選舉權是對於禁錮在

一個單別的房裏而由窗門逃去參加會議的婦女所常時必要的。在其他地方，他們的集會必是完全單獨的。然而今年已有成千的婦女出來參加選舉，東方全境選舉參加蘇維埃的婦女超過一萬七千，而且現時已有婦女參加這些鄉村的最高政府機關。在三八節日全中亞細亞都有羣衆大會和婦女會議，成千的婦女騎着駱駝，少數騎着馬從中國邊境四五百里之外去開會。在那一天有六千婦女已解除她們的面衣，從那天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已有八萬七千阿茲柏人的婦女解除面衣了。

然而還未想到提拔東方婦女得與男子加入共同的文明生活，並且那些工作大都限於婦女俱樂部的組織。第一個入門即是教授仍爲她們所不知道的衛生的基本原則和肥皂的用處以及母親和兒童的保護。在塔什壘 (Tashkent) 和巴庫 (Baku) 都有婦女部組織的模範俱樂部，每個俱樂部都有將近兩千的會員，都有療養院、會場、育兒室、產科醫院、讀書寫字的課程、初級政治學、印字機、使用法、販賣部、戲劇，音樂和藝術等團體。無數的小俱樂部、婦女宿舍和小的赤色俱樂部

撒布於各小城市和鄉村，根據當地情形所適合的標準實施同樣的工作。游牧民族中在婦女被引取到會的地方均有赤色俱樂部，並漸漸發展更有組織的活動。經常到會和上課的女代表計有七百多萬，並且傳單、電影和民衆大會已普及於成千的其他婦女。東方民族中共有女黨員一八〇七五，佔全數百分之十八，但僅佔土民婦女百分之二十。

婦女部幫助婦女爭取特別的學校，因為革命以來所開辦的新學校往往以男子爲限。現時有超過一萬五千的婦女正在學習讀書寫字，並有一千以上的婦女正在塔什鑾各高等學校中研究。已爲土民的女醫生和女教員開辦課程，這種女醫生女教員過去完全沒有。婦女部到處都有其經濟的和法律的協助局，婦女們開始來局學習她們不應服從她們的丈夫，育兒室和幼稚園以及母親和兒童的機關均已開辦。合作運動已從公開的特別婦女商店起始而盛行了，婦女在商店裏有生以來開始爲自己購買貨物的機會。

全東方婦女的主要要求便是開辦學校，祇有利用教育，她們的真正解放纔能達到。同時正在解放她們的有兩個力量：第一是經濟發展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正在給予人民以這個機會，提出家庭以外的婦女運動的新要求；第二便是婦女部準備婦女參加更廣泛範圍的活動工作。

雖然共產黨裏婦女的百分比依然微小，而且僅有少數佔有黨中的高等地位，但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預備學校裏女子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五十，並在少年先鋒隊裏的兒童共產主義團體約有一半是女子。莫斯科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奇異地注視我，當我問她關於女子部情形的時候。他告訴我說：她們不需要特別的一部，因為她們的一切工作都在男子和女子兩者之間。他說婦女部是現在的婦女所需要的，因為以前這些婦女在教育上比較男子僅有最少的機會。可是現在的教育機會既已平等，特別的婦女運動不應是將來的婦女所需要的。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其他機關裏僅有少數婦女佔着高等地位，固然有多數青年已加入地方團體。女

子們告訴我，男子在先反對她們的運動，並想將團體完全握在他們的手裏，但是現在這種態度已經改正，女子們已表示她們能夠作些甚麼。我曾問過一個真實的女共產黨員甚麼是女子在青年團主要的興趣。

她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去養成熟練某些類的工作！要求結婚的問題完全不能使我們感到與美國女子一樣的興趣。我們感到興趣的是在找着真實同志，並且是有技能的工人，我們才能和他們建築長久基礎上的生活。我們在家裏希望甚麼呢？……希望我們舒服，希望我們有教育的利益，希望我們有公共的廚房等等。這樣，我們可以不必爲那些瑣事苦惱。」

女共產主義團員和婦女部裏的婦女一樣地活動，無論她們在那裏——同業組合，專門學校，鄉村——，青年人民都希望她們成爲領袖而且常是領袖。雖然她們所處的種種地位大不相同，然而總是實行對於團體或社會有實際價值的工作。莫斯科共產主義青年團已在全省實施優美的工作，她們已在鄉村中組織六百個農

業團體，由成年人和青年共同加入。第一年他們一同在晚上讀書寫字，第二年實習一些實際工作。固然這種團體的會員僅有七分之八三九是婦女，但這仍是大大的進步。其中十二個團體都有女主席，而且多數團體有關於家事科學的特別組。青年團已經解決提高鄉村裏農業水平線的一定問題，並集中注意於使農民由兩季收穫制度恢復三季收穫制度，採用選擇的種子和改良他們的畜牧的問題。她們已在莫斯科省十七個鄉村裏採用兩季收穫制度得到了成效，並多已組織集團的畜牧，開始指示農民在牲畜待遇上有甚麼不同的良好的營養和保護。甚至小的少年先鋒隊也能常常在鄉村生活中發生重要的影響，指示他們的家庭以關於她們在學校中所學習的較好的農業方法，組織模範村，並由衛生視察部派遣委員擴大清潔的宣傳。

第五章 婦女和教育

不僅舊俄的教育機會男子比婦女較為接近，婦女中不識字的百分比大於男子三倍，而且舊制度的殘餘在婦女方面有更致命的影響，因為她們的生活向未注意去反對這個。男子因教育和生活隔離太遠，只能為環境逼迫找出他們所學習的最少一部份的應用。因此舊方法不合理的影響多少被男子須出外解決生活問題的事實所改變了。但是那些受過教育的比較少數的婦女當她們重理小家庭義務上無窮的和重複的慣例時並不見得鼓勵她們達到更遠的發展。教育既不能養成婦女為一個較好的主婦和母親，也不能使她們取得更廣泛的社會利益。

俄國的新學校已經廢除大多數的舊方法，新教育問題到處都是根據這個系統來充分地研究。但是因為祇須利用教育，婦女解放的甚麼方法都能生效，所以與婦女特別重要的那些教育方面無關的婦女新地位儘可以不必注意。蘇維埃政府正

在仿用美國根據獨自的經驗所已試施的現代方法而改組俄國全部教育制度。新教育最大的的供獻為後代的男子和婦女同樣享受。新教育給予男女兩性以同樣的新想像，不僅給予各個人以生活的認識和欣賞，並也準備生命過程上通達的參加。俄國今日所認定的教育功用是再不以不能消化的事實灌入兒童的腦袋，而俱供給兒童以刺激，使用創造的經驗去造成他自己的知識，即是培養豐富的好奇本能。這種本能有時雖有力量可以越過大多數教育所閉塞這本能的牆壁，但是這也容易變笨拙的方法止住牠的來源。這種教育是在準備男女兒童令其最合理性和他們的一切本能的充分運用，並改造他們的環境使和他們更加接近。

直接環境和其生命與勞動的一切過程是兒童課程上首要的教材。受過這些級材以後，兒童便在漸次擴大的團體裏研究鄉村、城市、地方、國家和國際問題與國際關係。教材集聚於自然和人，勞動和社會這些中心材料的周圍，這些相關的教材的混合名為複式教材。教員和學生選定一些特別的設計或團體作業，例如他

他們可以取得倭爾加 (Volsa) 河爲一個設計，研究其歷史、地理和沿流的經濟；他們的讀本取材於特別的研究工作，數學取材於面積，出產和人口的數字問題，作文取材於各組所應選定報告關於特殊方面的報告。應用很多的模型和圖畫、地圖和圖解。我曾參觀過這種顯著的精巧工作的展覽。

低年級裏很少採用課本。兒童在最初幾年中在一個教員的指導下從事他們的一切工作。以後由實驗室的方法代替複式教授法，兒童在實驗室裏應用這種方法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有特殊的教師指導他們。可是在鄉村學校中這個方法常不可能，因爲那裏在首先七年間往往僅有一個教員管理一級的活動。舊時的演講制度和試驗制度已經完全絕滅，教員成爲那組的一份子。自治亦已廣泛地發展，且在其本身上是一個有深刻意義的教育要素。雖然男子大多比女子活動，而且常佔較高的地位，但可看見有許多女子參加學生執行委員會和各種特別委員會。

新教授法對於婦女特別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便是自動的重視，這個同等地適用

於男子和女子，而整理床舖、縫紉布靴、和洗濯衣服等什役將來可以和洗浴服飾一般視為每個人本身職務的一部，除非這種職務能夠在某些社會基礎上更好地處置。因為兒童訓練上包有這類事物，所以學校確實佔有家庭的某些功用。

假如新教育綱領已在俄國全境完全發展，得有訓練優美和精明的教員去實行，那便不必特別準備將來的婦女去練習她們的權利。固然新學校最多的價值在於這是實驗的事實，但這仍然是未定的未成熟的和缺乏材料的，正如海內老人一般試想採用過去的成見。雖然舊的教員已經重新教育，新的教員亦已訓練，但是他們的多數完全不懂得甚麼是新綱領。新教學法正在採用的範圍大不相同，在莫斯科和各大中心區域中新教學法已充分地採用，收效的程度固然不同，但常有滿意的結果。並且我在近郊各鄉裏發現這個方法亦已有效地應用。但在某些鄉村如馬斯羅夫克特則沒有這種模樣，那裏的兒童還是用老法子常時齊聲誦讀並要單讀他們的算術。可是常有旅行團從其鄰近的鄉村到來注意機器的工作，考察製酪場並

參觀田間的機器以求明瞭美國人怎樣地生活。她們的熱切的眼光到處注視，發出無窮的問題，並作了許多記錄。「你們在美國甚麼時候才可以有革命呢？」畢克浮德(Mary Pickford)真地死了嗎？「你們的燕麥怎麼由農民種植進步了呢？」你們怎麼能將豬養在那樣一個清潔的地方呢？「美國人在他們的田野裏有電光嗎？」

免費普及教育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要理想之一，精美的傳單傳播廣遠，上面繪着可以按字母的秩序而發生的新鄉村和城市。宣傳車在鄉村中駛來駛去散發宣傳品，在美國主歌歌派的大本營索羅欽斯可益(Sorochni skoye)地方革命以前已有學校五所，現在除這五校之外，他們更以深切的狂熱開辦了新學校十七所，擴充設備，起用粗通文字的人担任教員。專門學校則擔負兩三倍學生的負擔。但是不斷的時疫已強迫政府轉變注意於其他事務了。學校經費已在一九二一年由中央政府預算改為地方預算。饑荒更阻礙學校迅速的發展，於是在恐怖時期各大區域的學校遂完全停辦。狂亂的人民既已為食物而變換能夠着手的一切，學校設備便

已食盡，校舍的門戶和梁木亦已保許多人免於凍死。

恢復的努力是燦爛的。饑荒以後的第一年我曾在鄉村中旅行四五百的地面，到處參加農民大會議討論重開和重修學校的計劃。那時教員的報酬每月所得的數量僅夠維持自己的生計。這種報酬係由農民自己徵收，在每月開始按照他自己的供給帶着分量不一的糧食袋送他們的兒童去上學。不管在根本的教育計劃上組織的缺陷和教材的可憐地浪費怎樣，可是教育總有其積極的影響。許多農民向我告訴，父母怎樣鞭策他們的兒童去進學校，牧師怎樣警告他們反對一切教會學校以外的非基運動的學校。現在老年愚民說：「我們是無知和盲目的人民，我們都是蠢物，但是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兒童也是蠢物。」不過徒然造成一種要求教育的普遍飢渴，這於教育本身事實上實無成功的可言。

然而設備的缺陷仍有其積極的效果。在新教育學說的影響達到俄國邊陲的鄉村中的教員以前；他們便已被環境強迫而採用現代最進步的方法，他們的教材無

非是環繞他們周圍的生活。他們觀察並採集動物飛禽和花卉，不用課本研究他們生存的理由，轉變學校爲一所小的博物院，耕種他們自己的花園和田地以維持學校的存在。教員時常在農民茅屋裏就火爐旁教授，兒童用木炭枝在舊木板上寫字，他們利用舊的政府公報上的空白以替代紙張，使用的鉛筆無非是繫在木棍上的鉛墨。學校得充其可能使用，每日常時有三班兒童上課。

以後中央政府既能再又轉向注意於教育，於是辦理非常地節省。現在的問題僅在提高他們所能節省的經濟基礎，這基礎可以保障適當的教學和長足的進步。他們甚至感到小心減少中學校學生數目的必要，這樣，他們更能招收失學的兒童並更注意於初級學校。爲要從事這種計劃，他們便慎重地給予以前從未受過教育的工農階級和其子弟以優先權。舉行競爭的考試以選擇留校的學生，而且這些考試可以使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學生更加窮屈，所以僅有他們當中最有材能的纔可以留校。他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態度發生一種明顯的改變，關於這個改變有兩件事是顯

負責的：第一便是共產主義真正的實現受了各國革命運動的挫折所延宕，第二便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封鎖和阻碍使得俄國不能惟一地集中注意於其建設計劃。雖然蘇維埃政府堅決地要求和平衡發展的機會，但是我們相信政府的非常進步是對付和平的威脅，而且要等世界資本主義發生衝突，這和平日子纔可以達到。因此教育問題不僅成爲教育兒童在共產社會裏生存的問題，而且也是教育兒童去實現共產社會的問題。這即是假乞他們的敵人的書籍從小教育兒童可以成爲他們的福音的概念和喊吶。盧那察斯基 (Lunacharsky) 說：「教育是內部發展的武器，由這發展成熱共產主義。」但是他們正也轉變注意於更多的軍事訓練。

俄國新教育顯然是共產黨的黨化教育而不是自由教育，這不是說他們已僱殘了他們原有的觀念，而是他們覺得在仇視的世界像一珠鐵鍊般包圍以前，他們的主要任務不能是較好的個人的發展，而是較好的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的發展。假如教員很有方法，這兩者都可以用來訓練，但如有一方面應該犧牲，那便犧牲

前一方面。凡是撥負這種訓練的人，必須記得這種訓練對於創造力的發展伴有比世界各處已經給予兒童羣衆的機會的更大機會，而且不論他們的某些方法可以取得的政治形式怎樣狹隘，他們向前訓練兒童的材料無非是改造社會。他們雖然要求對於蘇維埃國家忠順，但他們並不要求對蘇維埃國家現狀忠順，而是對於現狀後面活動的理想忠順。兒童在這些材料上發生一種濃厚的趣興，因為他們自己正在幫助去樹立這個國家並親眼見着國家前進。就婦女觀點言，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希望她取得和男子同樣多的責任，而且自從這種傾向離開了個人家庭的單位以來，公認婦女除看管家庭以外應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功用。這便是供給男子和女子同等機會的策略。

俄國教育促進至於初生幾個月的嬰兒，因此現時在嬰兒學校裏的職員都須有教育和醫學的知識。對於這個目的正在特別注意，儘可能以色彩、變化、和運動引進兒童的環境以減弱任何嬰兒學校中所不能免的慣例生活的相反影響。雖有少

數侮斷的和不識字的農民曾說兒童應該廢除資產階級遺留的玩具，但那不是一般的策略，玩具對於兒童的發展正視為和空氣光線一樣的重要。然而必須明白，即對於很年幼的兒童，那些玩具也該是原本的形式而非現成的形式，這樣才可以啓發創造的活動，最適宜的玩具即是由這一事物能作成其他事物的事物。教員須儘少干涉兒童的活動以充分發展兒童自己的智力。社會義務也儘早以遊戲的型式引進，兒童輪流幫助去安置桌子遞送器皿並洗濯。他們的小的前掛已經縫好，所以他們能夠穿上；他們的小屋建築很低，所以他們能夠爬進；手巾和牙刷都有記號，所以他們能夠辨識那個是他自己的；浴盆也置在他們能夠達到的地方。醫學正着手他們所稱爲的兒童心理生理學(Psych-Physiology)的特別研究。會合衛生和教育工作爲一個混合綱領可以準備兒童以後的訓練，實行不至使兒童過於疲倦的工作和遊戲的標準。教員應與兒童的母親合作，至少且要設法改變家庭環境符合衛生的方法。按照婦孺部(Mothers' and Babies Department)比柏羅登(Biban

o. A.) 的意見，一切兒教育的基本工作便是引起兒童方面的活動，發展集產主義，給予他們以世界的真正表現，養成健全的衛生習慣和工作習慣並訓練他們扶助自己。同時又十分重視對於生命的快樂態度的發展和得兒童真正親愛並熟悉的人與兒童工作的必要。

育兒室以後的第二步便是幼稚園和運動場，或包括三歲至八歲兒童的「前期學校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革命以後，幼稚園已如蕈菌般發生，有時則有幼稚園八千，兒童三十萬，而有時則幾乎完全絕滅。最近幾年裏幼稚園又正在復興。雖然牠們的供給多半倚靠地方預算，但在莫斯科則有幼稚園一〇九處，兒童一千人，且在其他中心也有相當的數目。實際上一切工廠都已開辦幼稚園，兒童養出育兒室之後便進園去。沒有組織幼稚園的地方往往有由受過訓練的工人負責管理的兒童室附屬於俱樂部，婦女能夠在那裏暫時寄託她們的兒童。

最近幾年中特別注意於鄉村中三歲以上的兒童的夏季運動場的發展，幫助在

田間工作的母親，並使從育兒室至學校的連系互相銜接，因此兒童可以容易和學校課程同化。教育部在一九二五年曾派送實習員兩百名下鄉組織夏季運動場。他們因為祇有自己應得的薪金，不得不為學校設備和食物設法，領取時常被仇視的當地人民的供給。末了各學生均得當地學校和較有智識的農民的幫助，並徵收在忙月中開設運動場的充分經費。原來僅有五萬一千盧布的投資已由政府募集達到超過五十萬盧布的投資。以後每年夏季派送逐漸增多的學生，且因他們在某些地方的工作與當地教員、醫生、及婦女部組織員的盡力，蘇聯全境已組織夏季運動場三千處，收容農民兒童十五萬。現時估計每五十個初級學校學童有一人在幼稚園。計劃在一九三〇年可減低這個比例為二十分之一。

前期學校的訓練包括正式學校課程的一切成份，首先的需要便是應該組織兒童的生活使與他們的環境密相接合。他們必須在建築他們自己的集體生活上佔有活動地位，並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以裏參加學校勞動，使這種勞動成為每個兒童所喜

歡操作的遊戲。教育課程上說：「在行將實現的通常情形底下，不獨成年人的勞動應該愉快和自由，兒童的勞動也應愉快和自由。」兒童有許多集會討論他們的問題並作成種種決議。很小的兒童不能像現代學校中實施的一般彼此施以紀律的權威，但已給予整理事物和執行某項基本任務的責任而發生大的成效。在啓發兒童的觀察力和引起研究的一切兒童教育上重視自然的學習。在圖畫、手工、和各種遊戲上獎勵自我表現。音樂⁶認定爲創造兒童與其環境的和諧所重要的，各兒童學校中已發展歌舞隊和音樂會。新鮮空氣和運動差不多成了一種崇拜物。教員要求學生在平常例假日共同享樂，領帶學生去工廠和社會機關旅行參觀，並使他們和其他兒童接近，使學生生活成爲社會的一部。在一切公共的例假日兒童有講演、歌唱和遊戲運動，他們都顯明地肅清了自我的意識。

獎勵兒童的文學是一種非常有實體性的文學，教授他們以苔蘚園如何變換成了衣服的神奇事而不是公主如何變成天鵝的神奇事。教育訓令上說：「我們的文學內

容必須根據實在生活和與兒童接近且能理會的事實，文學必須充滿鼓勵的和感動的動力。：必須以自然世界和人的創造力替代神話，那些神話祇能發展不健全的恐怖和病態的空想。」有些十分著名的俄國藝術家正在編纂兒童書籍，雖然少數藝術家是粗俗的，可是我知道他們的大多數都充滿着美和幽默以及實在的教學。育兒童中的運動場既是父母教育兒童的中心，或則利用兒童帶回家裏實行的習慣，或則由母親輪次幫助兒童工作。

假如你能記得六歲的農民兒童通常就成爲看護婦，就要掃地，洗衣，洗番芋，學習紡織，挑水灌田，甚至參加耕種，你便不能過份估量這種前期學校運動在兒童特別是在女子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發展上的影響。

「社會教育」是適用於一般初級訓練的名詞，這種訓練從八歲開始，統歸「聯合勞動學校」(United Labour School)辦理。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學校法令發表之後，政府公佈蘇維埃憲法所規定的普及教育和強迫教育。考察俄國施行

普及教育的情形的第一個委員會對於普及教育的直接採用具有堅強的計劃。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少數新委員會更實在地計劃從一九三三年起施行八歲至十一歲兒童的普遍的強迫教育，準備關於逐年增加學校、教員、和學生的數目的法規。這個已在一九二五年佈告批准了，規定凡是適合施行強迫教育的地方即可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公佈教育是強迫的這種強迫教育已開辦於雅洛斯拉夫斯基 (Yaroslavl) 和其他經濟恢復比整個的俄國達到較快的一二個都市。烏克蘭亦在一九二六年通過一條強迫教育法。但是這種教育在俄國其他地方尙認為太早，因為他們還沒有應付一切學齡兒童的設備，雖然那裏的在校兒童的百分比比較之蘇聯平均的百分比為大。教育部親自決定的綱領固然延長時間這樣地長久，但是盧拉察斯基和其他教育領袖尙在懷疑是否從一九三三年起就能創辦強迫教育。盧拉察斯基在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大會上指出教育部當前的主要困難，他們的綱領感受經費的困難，校舍和教材的不充足，以及教員待遇的薄劣。待遇薄劣遂發生教員確實的希罕，

因爲青年自然正在選擇待遇較好的職業。雖然教員的待遇已從戰前一九二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四至一九二七年增加爲百分之四十七，但這仍然比平均的工人工資爲低。鄉村中大多數工廠有許多禁止兒童入學的原因，並有運送兒童的問題，他們住居遠處，又沒有合適的靴鞋衣服以便於狂風暴雨中在崩壞的道路上行走。事實上大多數兒童因爲調養欠缺，又常易犯病，不能安心讀書，特別是女子常在寒裏擔負過份的職務。教員也常時過份地工作。他們的班秩太大（他們常時一日有七班），同時每個教員須要擔負多量的社會工作，在晚上教授成年人，並參加各種鄉村委員會。教員——多半是婦女——對於鄉村生活的供獻是不勝計算的。父母在秋季有工作的時候既需要兒童的幫助，春季剛來又要叫他們到田間去，因此要得兒童能全季進學校往往是困難的。

○盧拉察斯在一九二七年蘇聯蘇維埃大會上報告學齡兒童的百分之六十一已入學校，超過革命以前的百分之五十一。學校兒童的總數有百分之三五·六是女子

，她們的比例在城市中佔百分之四十八，在鄉村中佔百分之三三、六。在鄉村中男童留校的時期比女子略長，而在城市中則女子留校的時期較長。這個數目較之革命以前入校的女子的比例略為增加，那時的比例少於百分之三十。各民族共和國的教育在比較上已有極大的進步。這些國家裏從前有許多民族會一字不識，兒童時常入本地的教會學校，但是女子則幾乎未聞有進學校的。過去的殘餘甚至現在還使父母送女子入學感受困難，並且這些民族國家是俄國以男女同學為例外而允許單獨的女學校的惟一地方。

教育部的根本策略便是在最初九年學業未經完成以前，不應有固定的職業目的的傾向，以求儘可能達到充分的平均發展，因為高等教育差不多都是完全專門的。但是勞工部 (Narkompros) 目擊有高等技能的工人十分缺乏，現已允許在十七歲以後的專門訓練。

一九二三年中已經採用專門學校 (Technicum)，預定招收完成七年學業的

學生，並使他們適合於比較高等技能的職務和高等職業裏略具技能的職務。這些學校中婦女的數目逐年增加，因之專門學校學生婦女平均佔百分之四四·八。即以訓練看護婦和主婦爲主的醫學專門學校女學生佔最大多數——即百分之九三·六，教育的專門學校婦女佔百分之六四·五，藝術專門學校婦女佔百分之五七·七，商業專門學校婦女佔百分之四四·六，農業專門學校婦女佔百分之十九，工業專門學校婦女佔百分之八·七。

鄉村中有與相當於工廠學校的學校的要求，且已組織「青年農民學校」(Schools for peasant youth)以應付這個需要。這些學校招收十四五歲的男子和女子，繼續他們的普通教育，並教授農業上的現代科學方法，目的在使這些學校成爲模範農業的中心，這些中心畢竟可以影響鄰近的農民。三年前所組織的第一個學校女子僅佔百分之十四，現時正在入學的有六萬學生女子佔百分之二十六或一萬六千。課程包有關於家政、縫紉、看護兒童，和性的衛生的特別功課。女子無

法限制自己加入這方面的工作，並有多數正在準備去變爲羽毛豐滿的農業指導員，在農民中宣傳現代方法的福音。逐漸增加的女子正在進入各種農業學校，且在農事試驗場裏婦女佔科學探討的工人的百分之三十。

要爲在初級學校中的每個人開辦自由教育已是不可能的事，因之視爲一種臨時辦法的學費城市中經已允許，個人擔負的數目規定爲組合會員的薪金百分之五，但對於失業工人的兒童則不能收費。鄉村中對於富農的兒童仍徵收少數。沒有充分的地方可以容納一切學齡兒童，惟有城市工人的兒童和鄉村貧苦農民的兒童往往得有優先權。有時富農和新資本家因爲在正式學校中沒有他們的地位，已爲他們的兒童創辦私立學校。

在組織爲一種臨時辦法以爲那些未曾受過初級訓練的工人農民準備高等學校的勞動大學 (Labor College) 當中，婦女的百分比已從百分之十四增加爲百分之十七或三二八一六，而且他們希望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達到百分之二十。大學及

專門學校中婦女僅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一，但在醫學和教育的專門學校中她們則佔最大多數。在革命第七週年以後事實上現在尚沒有高等普通教育這種東西，繼續升學的女子或則入專門學校去研究醫學、教育、社會科學、工業或某種藝術，或則假如她入大學，她即進入研究專門的專科大學。高等學校的專門化是決定婦女活動的範圍和效率最重要的要素，雖然這須實施十分普遍以應付曾經訓練的人的熱切需要。這種高等學校的專門化已在美國救濟了非常多的女子不致成爲無用的青年婦女，美國教育已使女子認識她們正生存於偉大的世界上，她們好似要去參加這個世界，但她們不能在任何專門方面，訓練自己去有效地活動。高等學校的專門化並又給予工農羣衆以優先機會，她們根據自己的興趣以發展而非承受她們已經生來的生命。

高等教育上正在實行和初等教育上同樣的新方法。各學校的教室都變成爲圖書館，到處都有一種力求連繫理論和實際的努力，而且學生常以實習員的名義去

在夏季工作，在商業或專門職業上練習她們正在研究的職業。發給文憑不是根據嚴厲的乾燥的考試，而是根據她們在完成其學業以後應用她們所學的甚麼以解決某些一定的實際問題的功效。

除非略一敘述現時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裏有兒童二十五萬——其中孤兒佔百分之九十五的孤兒院（Childrens Homes），教育制度上最急切的考察便不完全。這些孤兒院在教育部的指導之下，就表面言，這是那些想像蘇維埃政府正在計劃容納一切兒童離開父母的家庭的組織，就事實言，有些孤兒院原來是組織為兒童將來應怎樣由國家訓練的模範。當時疫盛行時，許多沒有永久住址的父母都歡喜他們的兒童有一個安全的所在。然而總之，孤兒院是為孤兒組織的，而且多半是饑荒的結果。那時許多父母知道兒童可以在孤兒院裏有較好的機會生存，便故意地離棄他們的兒童。其他多數父母則已脫離他們的家庭，成羣地逃去饑荒區域。後來有很多假託死亡的父母回來領取他們的兒童，這些兒童堅

認自己是父母雙亡的孤兒，並以悲慘的細說敘述過他們的父母的死亡。於是孤兒院遂決定一種採用拒絕非孤兒的兒童的策略，因之在最近幾年中孤兒院的數目已減少至一半以上。採用這種策略不是因為反對孤兒院的本意，而是在另一方面因為費用太多和方法缺乏使大多數孤兒院成爲淒涼的所在，兒童在那裏學不到甚麼。我所參觀的孤兒院的現象正好與平常的孤兒養育院以及孤兒很儂倖地得有大材教員教養的那些孤兒院媲美。例如莫斯科附近普式金（Pushkin）地方的音樂學校凡有音樂或其他特長的兒童得由其他孤兒院派去。這個學校由狄欽（Tatkin）主持，他曾寫著過幾齣歌劇並在布爾索（Bolshoy）戲院的音樂台上表演過一次歌笛，而他的夫人是一位歌手和教員，一位很有趣的婦人，她以全部生命致命於這個學校。我從沒有到過比這更快樂的地方。至若教育對於仍然衣服襤褸流離於俄國的那大多數貧苦兒童也已定有一個計劃，希望根據這個計劃在三年裏解決這個問題。這一羣無家可歸的兒童差不多完全是男童，他們在饑荒時期年紀就很大了

，常因討乞、偷竊、和藏在火車下面周游全國的生活而受人嫌厭。這種生活的動盪便使他們不適合於慣例生活，當他們送回家裏時，他們就趕快地跑了去來助成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甚麼。處理這些兒童的一個方法即是利用「勞動集團」(Labs and collectives)，在勞動集團裏給予兒童以宿舍食物和工作。兒童在親自幫助組織這些集團並用自己的勞動購取衣服時往往覺得有趣，因此便能漸漸地組織定期的課程，並教他們一種職業。另一個方法即是將他出賃於政府給予報酬和某項優先權的農民或工匠，他們可以教授兒童耕種或一種技藝。但因農民慣於剝削兒童，根據這個方法的第一個實體已經失敗。在這種情形底下，兒童只可以在冬季中停留在農場上，而在春季方到，他們便動身走了。然而現在至少在較大的中心裏，他們已預先建築起家庭的嚴密考察和選擇的制度，並順應兒童的本性。許多兒童在十六歲時脫離孤兒院以後，都沒有地方可去，這種現象勞動組合正在用法糾正，即是每個工廠或企業必須保持學徒的若干位置應由孤兒院分派。雖然當這許多

兒童在外遊蕩時容易陷於犯罪的行爲，但是除去最少的一部份以外，都在常態情形底下立刻轉爲完全常態的兒童，因為他們不不甘心保持從前那種生活所磨利的智慧。這策略即是不當他們是罪犯，而是在常態情形底下給予他們一個合於常態生活的機會，不問他們的成績怎樣。至若對於那些真正殘廢或在社會上有危險的兒童，更有一種特別學校，現時那種兒童的數目正在漸漸地減少。

勞工部的通俗政治教育組 (Gla Vpolitproset) 刻正集中注意於成年教育，並由列甯夫人克盧伯斯卡雅 (Natalia Krupskaya) 領導。列甯夫人穿着鐵黑色的衣服，是一位頭髮顏白的婦人，雖然十分謙讓，但又是俄國最著名的一個婦女。她不斷地從事其推廣教育的事業，當列甯死時，人人都在討論紀念，她却要求與其將金錢用於列甯的紀念碑和銅像上，不如用於教育用於俄國貧苦兒童的幫助上。

根據克盧伯斯卡雅的意見，勞工部通俗政治教育組的主要任務是在教授工人

農民以革命的意義和目的，但是這個只有首先使他們識字方能做到。

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谷得齊(Gatse)教授穿着粗羊毛大衣和舊羊毛靴，坐在莫斯科一間滿具熱氣的房裏，起草強迫蘇維埃共和國自八歲至十五歲的兒童都應受教育的法令。這法令規定任何識字的工人都能升為教員，工人得照發全薪在每星期的某幾日早上曠工兩小時去學習。有人以為這種使每個人都能識字的任務在兩年以內便能完成，六百萬的初學教本已經出版，一十五萬應急的教員已授予短期學業。在以後兩年當中納有五百萬成年人已學會了讀書寫字。自從這個運動的經費提出政府預算之外以後，進行較為遲慢，但是並未中止，而已換成各種組織。因為識字運動在軍隊和同業組合中最容易達到，所以首先就從他們開始，於是每個加入紅軍來訓練的青年農民和工人都漸漸識字。這些紅軍農民回到鄉村以後往往用他教授其他農民。我在幾年前曾見着一位在那德金卡(Nadzhinka)小鄉村裏教授一班婦女，他親自在他自己的小屋裏開班上課。他的最熱心的學生便是

他的夫人。我問當地學會了怎樣讀書寫字的時候她可以作些甚麼。

「怎麼！那麼我能在委員會裏像男子般佔有地位。現在請看我的丈夫，他不會比我更有能幹。不過他會有機會到軍隊中去，而且就令他已打傷了他的脚，他還可以回來教育，因此他們已將他位置在鄉村委員會裏，現在他並且是蘇維埃的書記，爲何我不可以也參加委員會呢？」

雖然婦女中識字的效率比男子大這樣，但是很少在課堂上看見婦女佔着多數，因在這些課堂上受課的成年人每年約有一百萬，婦女僅佔三分之一略多。除去完全不識字的班級以外，尙有成萬的工人農民在半識字的課堂上受課，以引他們前進使他不致再落於不識字的階級。本年成年人滿五十歲者已均受教育，然而即滿二十五歲的人去學習已覺得非常困難，因此已減低年限至三十五歲。

勞工部通俗政治教育組主要方面的工作即是貧民讀書室(Ispokhetalnia)，全俄已有這種讀書室二萬六千所。貧民讀書室有時附設於舉行會議或展覽會的平民

宿舍 (Peoples Houses) 之稱，有時則是單獨的，有房一間至四間如圖書館閱報室和俱樂部。貧民 (Isbachek) 往往是領津貼的黨員工人，在其許多職務之外兼理有看管閱報室的職務，而且這個工作完全依靠他們的能力和指導。在最近的蘇維埃大會上已經投票決定貧民應和教員同一標準地看待。各種團體已由貧民的指導而組織了：計有不可免的戲劇和農業團體，平常的合作社，鄉村通訊，音樂的和母親嬰兒的團體，並有由婦女與男子同樣參加的縫紉團體。他們並在少數地方開設婦女的特別團體，婦女在這些團體裏學習怎樣去管理她們的家庭使更清潔更衛生並更善於飼養牲畜，這些事情在俄國鄉村中完全是婦女的責任。貧民在進行組織這些團體的時候，即在鄉村農場上召集其巡行區域裏的醫生教員和地方法官會議，實際上即是利用鄉村應得給予機會以發揮其一得之長的每個專家。

城市中的成年教育運動大半利用同業組合所組織和供給的俱樂部工作而實行。實際上除去青年工人的工廠學校之外，一切同業組合和工廠都有關於成年工人

的特別夜課和夜學校，而年紀較大的工人概由同業組合選進勞動大學以爲升入高等專門學校的預備。戲院、電影、博物館、歷史建築物 and 紀念物、與乎公園以及美麗或有歷史意味的地方等處都在勞工部的指導之下，因此勞工部不僅對於正式教育負責，而且也對培養智識飢渴的工人農民負責，過去這方面的生活是對工人農民的男女一律禁絕的。

第六章 新家庭的演進

婦女地位上所完成的一切改革之最普遍和深入的便是涉及結婚離婚和家庭，初次形成新生命的革命態度，並規定舊法律上所缺乏的母親和兒童的保護等法律。列甯在革命以後兩年的女工會議上說：

「立法上一種影響婦女的完全革命已由工人政府在其成立的開始幾個月當中實行了。蘇維埃政府已不遺餘力對付那些認定婦女應完全服從的法律，特別是那些利用婦女的較弱地位，讓婦女處在一種不平等甚至常是低賤地位的法律，即是關於離婚、生育、與婦女要求父親供給兒童的權利的法律。……現在我可以驕傲而毫不誇大地說，世界上除去蘇俄以外沒有那一個國家曾經給予婦女以充分的平等權利，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婦女不是處於可恥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上感到這種地位。這個便是我們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自然單靠法律是不夠的，我們剛靠一些法律，一分鐘也不能滿足。但在立法的範圍裏我們已經完成爲處置婦女與男子在平等基礎上所需要的一切事物，我們現在正有權利驕傲。雖然蘇俄婦女的立法地位在許多先進的國家看來是過於理想的，但是我們要坦白地告訴我們自己，這僅僅是牠的開始。……」

關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婚姻和離婚的法令已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編纂成爲法律。此後數年又引起了古典學者所不能預見的改革，而根據最近九年當中生活 and 風俗的發展的修正法典已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發生效力。自從婚姻法一天一天有力地激動了人民的生活並引起了可驚的改革以後，同時有些難於實行的方面也已改正和變通了。我在未說明婚姻法的修正法以前，我可以略述原始的婚姻法的主要條規一下。

首先或許有重視這事的必要：無論蘇維埃政府的委員個人對於男女間將來可以取得的形式關係的意見如何不同，但是政府已一致主張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

形成的家庭爲基本的社會單元，並認定在特別情形以外母親對於兒童的看護比國家還更適合。

因此司法部 (Narkomyust) 布捷丹堡斯幾 (Brandenburgski) 委員陳述其任務說：「凡已在夫妻親子間形成了權利和義務的家庭可以無疑地立即絕滅，而代以社會教育和社會公安的國家組織，但是因爲這個還不曾實現，蘇維埃政府應以相互的義務加於家庭的各份子身上。」

但是在這題目上撰述講演很多的教育委員盧拉察斯基說：「我們痛恨資產階級的家庭，可是必然不可演出這樣的結論：即是參加革命運動的男子不應有家庭，婦女也不應生育兒童。……家庭是社會的主要核心，必須在我們的中心注意之內。……至於是否可以有不要家主的自由家庭，或者家庭可以打破，我們不能事先判斷。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個人的差異既不可以消滅，我們也不必爲此努力；多半將有形式不同的家庭。」

蘇俄首先的婚姻法僅僅承認文明結婚，不會設法廢除宗教的儀式，這簡直是剝奪一切立法的意義。就事實言，大多數農民和許多市民仍舊在教堂中結婚，不過若沒有婚姻註冊局(Зарг.)的執照，牧師已拒絕舉行這種婚禮，因為這慣須請求註冊局簽字。

俄國結婚或離婚除去爲註冊用去幾枚可比之外，再不花費甚麼。在城市中常有一長列結合奇異的伴侶在註冊書記的寫字棹旁邊等待，總計包括考查他們的合婚書、審問新郎新娘是否自願地達到結婚情形和登寫姓名於婚姻簿上的儀式僅需二十分鐘。我的一位俄國朋友告訴我，當她在列甯城結婚的時候，書記對於她的面前那位第七次註冊的青年女子表示非常的不滿，男子和她議論了一會，從他的眼鏡掉落底到用一根繩子繫在他的頸上纔止。末了這位女子取得她的第七個丈夫。大家以爲註冊的手續比費時的和鋪張的教會結婚更好更有效，假如這不是十分那樣偶然的事情。有些地方爲了這個目的另設一個特別房間，並由部長指令一

個以上的書記處理註冊事務。赤色婚禮(Red Weddings)更能充分滿足地替代舊儀式的需要，並已在許多工廠中發展了替代這類婚禮的正式儀式。新郎新娘坐在覆着紅布的月台上，有同廠的同業組合委員和婦女團體的代表參加，工廠委員會委員長便是婚禮的主席，新郎新娘親自宣誓相互工作以提高社會的生產，並有恰切的演說，接着便是宴會和餘興。其次接着這個儀式之後又於適當時期舉行十月兒的儀式(Octoberina) 以替代舊時將可憐的嬰兒浴冰三次，牧師則揚舞十字架以驅除魔鬼的洗禮。在十月兒儀式中工廠委員會再又註冊。兒童交給蘇維埃國家，命名為列托齊拉(Lentrouina)以紀念列甯，托羅斯幾，和齊洛衛(Zinoviev) 而不以神命名。一個神，假如是女子，則名為尼刺(Ника)，假如是男子，則名為「革電莫」(Биле) 以紀念革命電氣化和莫斯科，和「十月二十一」或其他相當名字。

俄國人最富於儀式，一個最簡單的會議除去主席和紀錄之外更有上次推舉的主席團，講演問題和討論必須根據一定的陳例而結論為決議案和議定書，一切會

議錄必須附有精密的決議。蘇維埃領袖除去在他們自己的集會上有些這樣的規定以外，並已看出這儀式在幫助新社會形式深入人民上的利益，且又鼓勵這個趨勢成爲革命的儀式。

現在再又說到婚姻法。這個原來要求採用共同的婚姻名字，這名字可以是新郎或新婦的名字或是一個混合名字，但爲防免兩性的混淆計，最近的法令規定他們或選用一個公共名字，或保持他們結婚以前的名字。

假如發現夫妻俱未滿結婚年齡——女子十六歲男子十八歲，或出於壓迫下的同意，或在結婚時雙方都有不負責任的情形，這種婚姻是無效的。禁止一夫多妻制，且如隱瞞一件婚姻的事情而與第二人定婚，這是一種犯罪行爲。祇有智力薄弱者或心靈不全者和父母兒輩間兄弟姊妹間禁止結婚。

離婚完全自由，如果夫妻彼此願意，祇須註冊局簽字就成功了。但是假如祇有一人願意，須得由法庭批准裁判，因爲這往往包有兒童的贍養和保護的問題。

然而無論如何總沒有證明任何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問題，並且也無需解釋。

因爲大多數尤其是農民都不懂得這些法律，於是全國設有指導局和法律顧問的普遍制度，勞工部且已訓令其鄉村分部特別注意於農婦的利益，因爲鄉村情形通常讓她們處於沒有保障的地位。解除婚約時必須承理給養的問題，並在當日即行決定，而且即在未決定以前，法庭得有權利令交若干數目以供給養。

在革命的婚姻法上更有可以視爲多餘的某些否定之點。這是由與舊法典比較而被重視的。因此這已特別地說明假如丈夫遷移他的住址，妻子不須跟隨他的丈夫，男女的公民資格不致受婚姻的影響。在原來的法典上不能由婚姻創造財產的共有，現在則祇要合同不致侵犯雙方的權利，立法上便承認夫妻間關於財產的任何契約。夫妻是對彼此的給養相互負責的，如一方面需要，一方面便應給予給養。這個適用於離婚以後，直到環境的改變即是重新結婚或有新職業爲止。

私生兒的凌辱已經廢除，並且實在地給予未婚父母的兒童和已婚所生的兒童

以同樣的權利。未婚的母親能在臨產以前三個月將其父親的姓名住址報告婚姻註冊局，假如後者在兩星期裏不提出否認或沒有證據去反對，即斷定他已經承認父親關係。且應對兒童的給養負責。這個也適用於已結經婚而其丈夫不是那兒童的父親的婦女。如遇男子否認加在他身上的父親關係，法典上曾規定以下的訴訟手續。

「假如法庭證明兒童的母親所指定的男子的關係是這樣：即是在私生事件上他應成爲這兒童的父親，那麼法庭即肯定地成立他的父親關係的事實，同時確定他關於兒童的懷胎生育和日後給養等經費的責任。

在這種情形底下婦女領取的維持費所稱的名目爲贍養費 (*alimonia*)，而對應付贍養費的男子所稱的名號，他們則鈔錄那句舊的說話：「他欲滑走，必須攜穩上山」法庭的實施實行取得男子月薪的三分之一。母親的地位常被注意，男子確能供給的標準仍須爲他自己的生存保持一個最小限度，假如他更有其他家庭，他們的需要也該注意。

所有在城市法庭上起訴的案件大部份與贍養費有關，而所有在鄉村中起訴的案件約有三分之一與贍養費有關。城市中比鄉村中所以有更大部份人口受影響的原因，就是因為農民女子非常地害羞，不慣要求贍養費所致。

這個法律已經完全改變對付未婚母親的一般態度。以前青年女子在結婚以前破壞了她的貞操便是身壞名裂，有時她甯殺死自己而不願承認這種關係，有時則殺死私生兒，假如她已被家庭驅逐或是她的名譽被暫時的婚姻破壞。然而無論怎樣，整個的事實那些專制的家庭竟秘而不宣。可是現在她能勇敢地向法院起訴並要求贍養費，法庭問她許多私生的問題，她都坦白地承認，而且供詞在報紙上發表，人人都可以看見。不過這不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密告或是破除婚約的奇談，因為俄國報紙不認這些事情是一些新聞，而僅在報紙的背面題名為「法庭佈告」的一個欄裏報告重要的事實。未婚母親再不是可恥的浪女，而是一個有權要求父親贍養兒女的責任的自覺的個人。兒童滿十四歲，法庭允許其決定自己的名字公民

資格和宗教。如果父母不同意於宗教，兒童非到長成足以自己選擇的時候完全不能有任何宗教。

父母應要供給他們的兒童，注意他們的心身上適當的發展，並為他們準備某些有益的活動。正和俄國以外流行的概念相反，法律規定父母應和他們一項看管他們的兒童。兒童得離開家庭送去訓練或教育，但不能不得兒童自己的同意而被顧備。兒童也應供給領不到政府給養、的可憐的和窮乏的父母。養子已經禁止。

任意選定的遺囑已在俄國變而為立法上的遺產法，即是倚靠死者供給的妻子得和其他親屬接受同等的財產，如其總額不足供給所有合法權利的人，最窮乏的必須首先注意，如遇平均分配顯然不適當時，得依從遺囑。雖然這樣，但是僅能偏重合法的後裔。原來法律給予妻子的財產支配權不得過一萬盧布，然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公佈遺產不受限制，但須徵收極高度的遺產稅，其關於超過五十萬盧布總數的遺產稅高達百分之九十。

此這即是合法的基礎，自從革命最初九年以來，家庭已根據這個基礎發展了。法庭既不會拘守陳例，立即認為他們的判決必須根據環境，有時這環境雖在法律本身上未經規定，但亦已成立。在這法律通過以後的幾年當中，公認這已不合時代，法律家遂起草新法律，在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們已將這個新法律發表。新法律條文已提及那樣重要的保護，草案已送到全國討論。

關於這問題，曾經俄國人民一度不斷的討論，沒有一事未曾說及。但是不管關於一切洗滌姘居的輿論怎樣，仍然不能繪出俄國今日家庭生活的甚麼澄清景象。就詳細選擇所已討論出的事實而觀，我們能證實共產黨員已採用一夫多妻制，他們已殺掉他們的兒童。罪惡的審衍是世界上最為以前任何各地所未有。家庭已經廢除，完全的禁慾主義制度已經開始，女共產黨員以前反對生育，於今全國婦女則又強令生育許多的兒童，或者幾乎你想證實的一切。

托羅斯幾在他的一本小書生活問題 (Problems of Life) 上給予我在家庭上所

正欲證明的一個最好的形容。他說：

「家庭關係——包括無產階級的家庭關係——已經打破。大家明白有些大的十分混沌的計劃正在進行，並斷定了一些非犯病態即惹人厭非可笑即悲慘的十分混沌的形式，這些形式還沒有時間顯露其開始家庭生活一個新而較高的秩序的潛伏的可能。……」

「由動員而從其尋常環境引離的丈夫已變成爲一個擔當社會革命的公民。這是一個緊要的改變，遂使他的前途漸廣，他的精神的希求漸高而有更完全的秩序。他是一個不同的人，因此他回到家裏看見家裏的一切實際上都沒有改變。家庭關係上家裏人的和睦和瞭解已經過去，新的瞭解還未發生。相互的驚異變成了相互的不滿，於是而發生惡感。家庭遂打破了。」

「丈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妻子是一個非黨員。丈夫忙於他的工作，妻子則和從前一樣僅僅看管她的家庭；他們的關係是和平的，實則建鑲在向來的冷淡之上

。但是丈夫的委員會——共產黨支部命令他廢除懸在他家裏的神像，他十分願意服從，覺得這是自然的，不過對於他的妻子這是一種災難。剛好這一點小事遂惹起分裂夫妻間意見的鴻溝。關係破裂，家庭遂打破了。

「一個舊家庭，有十年至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丈夫是一位很好的工人，專為他的家庭出力；妻子也為她的家庭而生活，以她的全部活動給予家庭。但是剛待她乘機加入共產黨的婦女團體以後，她的眼前開展了一個新世界，他的活動找到一個新而較廣的對象。家庭被輕視，丈夫被厭棄。妻子則醉心於她新近覺悟的公民意識上。家庭打破了。」

每個在革命以後到過俄國的人都已見過這種無窮的變化：一個在農場服務的共產黨員的妻子雖然沒有政治的認識，但他已讀過關於婦女解放的許多共產黨宣傳品，她覺得整天坐在家裏太無趣味而想望一種職業。而她的丈夫則說他所以望的這是一個家庭，不是一個寄宿舍。

因爲物質情形的結果，許多家庭已發生困難。一對極其快樂的伴侶已漠然地分離了。丈夫去到一個城市去找職業，妻子則在原来的地方取得一種職業而留著不動。因爲生活無趣，我於是單方或者雙方遂尋找另一個伴侶。他如丈夫在政府信用組合裏取得一種重要職業，與新資本家交好，開始度那高貴的生活，舉行常相往來的會宴，希望他的女工妻子去打扮表演，民常時爲了農婦改進一種城市的職業，而與和他有二十年歷史的妻子離異。

還有一種家庭，丈夫和妻子係由革命上和建設其國家上的相互利益而共同團聚，我已懂得許多這樣的家庭，並且他們通常使我感到一種家庭幸福的印像，正可和我所知道的家庭幸福媲美，這些家庭從未感受革命和離婚自由的混亂影響。

斯密多味茲(Smidovich)同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一個真實的和可信的老共產黨員，以前她是婦女部部長，現在她是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三個女委員之一。一天她在克蘭林(Kramlin)請我出到她的家裏。她儼然是別人的祖母，在門口

蹣跚着。她從她的眼鏡框裏仁愛地看着兒童遊戲。她的灰色的頭髮打一個小結從她的額上朝後拂着，在她的銀框邊眼鏡後面的閃爍的眼睛裏充滿着理解和智慧，她的憔悴的兩頰浮泛着健康的紅暈，這種健康祇有她同時代的少數人所能夠保持。她的丈夫像煞一個新文的舊家長在禮拜日的早餐桌上主席。那裏共有三個兒童，一個十四歲的面貌肥胖的女子，兩個害羞的大的兒子和兩個娃娃。他們的笑聲充滿着那小屋裏以前彼得大帝用來裝扮軍人爲戲的一間寬大而天花板很低的房子。兒童崇拜他們的父母，且要每分鐘倚靠他們。女子總說：「爹媽爹媽！何時你可離開你的無聊的工作來和我散步？」

這似乎不須追問斯密多味茲同志：將來的家庭生活她應該怎樣。

她告訴我說：「自然我們年齡較大的共產黨員最好是去戀愛一個人，並且依靠他。要去改變環境，這對我們比較對別人更困難，因爲我們形成的束縛更爲牢固。……要想打破在爲一個共同目的而一致鬥爭的生涯的基礎上的結合這並不是

一樁輕便的事。我們首先所尋找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同志，他的思想和情感我們要能夠共享。假如相互戀愛的情感已經消失，自然婚姻關係必須中止。至於將來，我們知道新的經濟形式可以創造新的人類關係形式。有些形式我們正在有意識地形成，其他形式須待生命自身證實那種形式是最好的纔能形成。自然我們用不着建築在婦女經濟服從上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舊形式。

我問她對於兒童教育的意見怎樣？

她回答說：「我們還太貧窮，談不上給予兒童應有的好的社會教育，因此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家庭必須保持成爲訓練兒童的核心。自然假如我們對於兒童有設備完美辦理良善的學校，他們應該比現時間在家裏的大多數好些。我雖喜愛我自己的兒童，然而總之，我有多少工夫去看管他們啊！整天我都在工作，甚至晚上也是如此，只有星期日纔是我們唯一的休息日。假如他們在孤兒院，他們能在我的休息時間到我這裏，同時他們可以取得比我給予他們的更好的訓練和更好的看

護，而且他們可以度一種更興奮的生活。」

除去這些之外，更有舊家庭存在，這種家庭保持過去的影響所重視的苦樂與其永久不渝的結婚誓言。且又保存一切舊的傳說，即是婦女不僅仍然是奴隸，而且甘心以奴隸自居，婦女以爲她們的丈夫若不打她們，她們便再不爲丈夫所愛。

因爲動搖市鎮都會十分深切的改革傳入鄉村遠較遲慢，所以這種舊式家庭還很尋常可以在鄉村中發現。經濟要素在鄉村中比在城市中更強厚地表示爲一種堅固的力量，這是因爲農民家庭的改組不是那樣一件容易的事體，而土地從新劃分和財產分配的問題又常引起家庭團結。然而即在鄉村中改革已屬偉大。第一就是戰爭、革命、和饑荒動搖他們脫離了舊的常規，於是就是婦女覺悟的認識，即是再不需要屈服於丈夫可怕的淫威。漸次增多的農婦正在向法院提出反對其丈夫的控告，農民再不敢痛打他的妻子，因爲婦女都在每個鄉村支部都有牠的代表以勸告農婦怎樣她們纔能取得救濟或離婚。

第七章 婚姻法的製定

如前所述，蘇維埃政府的創開者固然公認將來的婚姻可以同國家一齊廢除，但是他們却同意於至少在過渡時代最好保存文明結婚的形式。然而約有兩萬個青年男女已經決定不需註冊的沾益，這些結合的大多數都具有足堪註冊的婚姻的一切證據和關係。當死亡或分離這種案件引起法庭的注意時，大家以為應給予註冊婚姻同樣的合法特權，雖然在婚姻法上沒有這種規定。

在某些其他方面這法律確實無用。法律既經宣佈財產和金錢毫無意義，那就自然應該規定婚姻不能創造共同的財產，因為新法律的主要是在打破舊法律的任何痕跡。有了新經濟政策底下商業的復活和金錢的重新引用，於是遇有離婚事件發生時，家庭中能使丈夫實行其在外的工作的婦女工作就往往全無報償，因為丈夫專想一切金錢或財產是由他們的共同努力所蓄積的。國家既過於貧困不能

供給流蕩於各地無數的孤兒，因之大多數孤兒遂由農民和其他需要多餘的工人的人取去，在事實上且已納為養子，所以禁止立養子的法規就確實不能通行。有些不合用的條文已在法庭的判決上糾正了，有些則已由特別的佈告糾正了。然而這還是非常笨拙和紊亂的方法，現在已由勞工部人員起草一種新法典，並經提出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的中央全體會議(Congress)。

這些主張的最主要的改革便是姘婚(Dé-facto)的認可和在結婚後所蓄積的財產應由夫妻共同管理以及在農民家庭中個人過於貧窮不能擔負妻子——無論是否註冊的——的撫養費的丈夫總之仍應勉強擔負的規定。

但是對於那樣一種事實的公認各代表還沒有充分地準備。他們說這可以給大多數的偶然結合以立法上的認可。受過教育的老黨員則混合無知的農民和他們自己的意見而痛斥這是「一夫多妻和惡風陋俗的默認」。農民特別惶恐，心想家庭一人的罪惡必致加於其餘的全體，而聲明這樣一種法律可以使農民家庭崩壞。一個

農民代表說：「假如我們有三兄弟，一個兄弟應付贍養費，你會令我們將那條牛砍成幾塊麼？」討論愈趨愈形劇烈，本案的反對者要求最後的決定留待下年再議，而司法委員庫斯基(Kurski)和其附議人克列林可(Krylenko)和勃蘭登堡斯基(Branden-burgski)則抗議那十萬婦女不應聽其無人保護主張須不延遲地提出通過。末了，俄國農民主席喀利甯(Kalinin)很圖滑地提議：「任何法律應容忍大眾的討論，尤其在人民生活上有這樣一種深切關係的法律。因此農民的意見既不受人充分地注意，而婦女團體方面的意見又缺乏確定的表示——也許她們正有些着急，於是遂經投票承認新法律的草案原則並提出第二次會議作最後的決定。」

這個法律草案經已傳播鄉村。報紙和什誌滿載這種法律。書店窗架上陳列成千的小冊子，露佈新法律全文，附有雙方的辯論。新法律的贊成人準備為最後的論戰實行証實未註冊的婚姻的體面，國家出版部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售價八可比，用簡單的文字解釋俄國的新婚姻法。書面有一對快活的農民夫婦的像，和三

個圍着快走，與笑容可掬，並又十分快樂足以擔當「於離克蘭林三十五分鐘地之外取得你自己的家庭」這標題的兒童。

這標題說：「於今的婚姻能夠容易地和簡單地結合，不用任何教會的力量，不用他們的儀式和祈禱。在這些自由婚姻上只有同意和友愛工作的印象。愛情、共同工作和可愛的兒童——這些便是俄國今日兩性共同結合的條件。假如沒有愛情或共同生活的慾望，這婚姻也好像結婚時一樣地容易，簡單而解散，祇要這種解散不使兒童感受苦痛，這是蘇維埃法律所樂為的。

「無論男女的婚姻已經在某地註冊，或就簡單地決定同居未經請求牧師或官吏的允許，這是毫無差異的，祇要所屬的男女認定他們的結合不是淫行而是婚姻就夠了。假如一個男子十分自願對於一個婦女如他的妻子般注意和看待，那就儘得結婚。當他們在一塊同居，實行互助的家務，這就人所共曉他們是夫婦了，他們不需要其他證明，這就十分明白。

但是要使婚姻情形人人知道不是時常怎樣容易的事。有時他們沒有機會成立共同的家庭在一塊同居，於是夫婦必得暫時地分開。例如一個紅軍的青年兵士如願人人知道那位被愛的婦女就是他的妻子，那麼最好就去註冊，並不需要去作任何表白，證書可以證明一切。這個對妻子便利，對嬰兒也便利，都得受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我們爲甚麼要註冊的理由。」

除去印刷物的流通以外，單在鄉村中就有政府出席報告的六千個大會和其他無數的講演、辯論、與討論。祇有世界歷史上很少數的法律已受與這法律有關的人民普遍地討論。克列林可在正月十三日婦女部會議上一篇擁護法律草案的講演上說：

「我們不曾希望這樣的爭辯。根本的法律大半是企圖去反對教堂結婚。法律起草之後，僅有一人發言反對註冊。……然而我們並不以爲在經濟平等的情形底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裏還需要註冊，我們現在認定這是達到某事物的一種方法，

不是認這在其本身上有價值的某事物。不過人人都說現在還沒有共產社會，我們的計劃還在五里霧中，在現代情形底下的邪惡世界之上我們的草案的結果將是一夫多妻和惡風陋俗，我們的草案將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基礎等等。我們且看這問題實在是怎樣，現在一個男子可以有一個家庭兩個家庭三個家庭，但是只有註冊的婚姻可以需要費用，第二和第三個妻子却得不到甚麼。按照這個設計他必須完全供給這三個。……就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經常的策略的觀點言，對於健全的家庭和對於永久的美滿的婚姻關係的力爭，正如保護這種結合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弱者方面的觀點一樣，新法律所給予的比原來的法律更為浩大。」

這個討論雖然對於新設計表示十分不滿，但也表示關於需要改革的實際的一致。在這不滿上最守舊的農民和共產黨員却與科郎泰各不相同，最守舊的農民和共產黨員不僅希望必須註冊並應限制離婚的自由，科郎泰主張註冊和物質的責任完全廢除。她主張婚姻的形成應根據契約，這樣雙方才可支配他們的相互的經濟

利益和對彼此與其兒童的義務。爲要免除合法與非法的妻子間的一切差別，那就
不應有婚姻註冊而祇應有兒童註冊。……她指出俄國每年生育五百萬餘嬰兒，
約有一百萬缺乏給養。她深信現在除去新資本家之外僅有很少數的人民能夠給付
充足的贍養費，全體成年人民應當每年征稅兩盧布，這可以儲爲一項基金足夠應
付必需的育兒室和產母院的費用。科郎泰的少數信徒甚至進而主張所有缺乏給養
的兒童應即從其父母取來並安放於孤兒院，而向未婚和未生育的全體徵收一種特
別費。但是她的提議被大數代表視爲一種空想的計劃，不能實行而遭拒絕，因爲
農民絕對不能辦到給付城市兒童的一種例外稅項，於是無論如何這種經費就不夠
兒童一年以上的給養。

提出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央全體會議的草案與一年前的法律少有改變，可
是因爲這是人所共知的結果，遂發生一種比較堅固的幫助。草案宣告如下：「成
立婚姻冊註，其目的在便利人權和財產以及妻子和兒童的利益的保障。……註

冊是婚姻存在的一個不待言的保證。」同時這種保障並推廣及於未經註冊的結合，而未經註冊的婚姻的存在遂對重婚發生一種障礙。至在審查一切法律的人民委員會(Сарнаком)的主張上，則加上一條載明如遇未經登記的結合，法庭對於現成婚姻的實在情形的證明應得如下：姘居的事實；同居的情形；親自通訊或其他文件上在第三者面前，宣佈婚姻情形實在地存在；以及相互倚賴相互供給，和兒童訓練等。載明結婚期間所儲蓄的財產應視為夫妻共有的財產的規條和其修正以答覆農民的反駁，載明為欲實行反農民份子的求婚，婦女能要求的贍養費總數應限制為家庭中被告所分受的部分，祇應付現金或生產，無論如何不應釀成土地家畜或設備等勉強的分配。如係失業者則在婚姻中止以後供給被離的妻子的義務限期六個月，但如妻子無能工作以供給自己則限期一年。這種設計更由允許註冊局得決定一切離婚案件而使離婚越加簡單。僅有一方面不同意，當財產分配和兒童贍養的問題不能適宜解決時，遂有由法庭調解的必要。而不願意的父親可以反對他

的父親義務的時期已從兩個月延長為一年。新法律並又規定對於某些有父親責任的候補人，法庭必須認定其中的一個以替代父親因為公認股份公司的佔有是一個智者所從事的，對於兒童確實過於繁重，兒童的伴侶可以喊叫「愛烏羅夫公司的兒子到那邊去了。」草案保持婚姻年齡為十六歲至十八歲，但省節了原來的法律即在特別情形時允許減縮六個月的條文。婚姻法規定新郎新婦必須提出已經簽名的文件，載明他們彼此已經報告的衛生情形，尤其是關於花柳病心病和結核病以及關於上次的婚姻和兒童的數目通包在這條法律之內。家庭責任由這草案推廣以包括兄弟姊妹以至在必要和可能時祖父母和孫兒女的相互供給。允許養子制度。

我曾在克勒謨林的皇宮裏一間裝着石青柱安着水晶泡電燈和飾金的大禮堂上出席於討論法律的最後決定的中央全體會議。那些坐在鋪着滿佈全禮堂的深紅色長而有秩序的棹上的代表大多數都是婦女。一位堅強的農婦生成一幅豐滿雅緻的面貌，她的頭上結着一條漂亮的披肩，她的腳上穿着一雙毛氈製成的靴子，帶着

威儀和毫無自我意識的態度走來加入主席團。

大多數代表都是真正的俄國蓋漢，但雜入其中的更有構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自治區和自治共和國的代表——韃靼人 巴士克人 (Bashkirs) 塔耳斐斯人 (Tatars) 和種種不能名的半游牧的部落民族——，有些則代表一夫多妻制和婦女的嚴格奴役仍然存在的地方的人民。在一九一八年原來的法典的基礎上除去回教依然盛行的區域裏應須製定的特別條文以外，對於那時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區的婚姻法已有實際的統一，但因蘇聯的形成和允許各地以多分自治權的原故，於是這聯邦的少數部份已採用牠們自己的法典。因此在白俄羅斯僅僅承認註冊的婚姻，而在烏克蘭不僅不得對方的同意而能夠單方實行離婚，且可不得對方的同意而能單方登記婚姻，因此這位祇有一月認為期限可以提出反對的對方常用一句很有趣的舊的俄國寓言說：「他們替我結了婚，而我還莫明其妙。」

有些代表認為不能在他們旅行烏克蘭回來之後不犯着茫然不知而被結婚的危險那便是一件恥辱。輿論以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律的基本條文固有少數地方應該改變，但仍可以通行於蘇聯全境。

在採用新婚姻法更正的草案上，庫耳斯幾聲稱註冊是更好的婚姻形式，因為如遇司法情事，這對於法庭成爲一種無上的證明。他說：「我深信這時期可以到來，我們可以使姦婚和註冊的婚姻平等或者完全廢除註冊的婚姻。註冊就祇取得事實的統計的記載，因此這就常時成爲取得記載所必要的。同時註冊也有對於由婚姻發生的一切權利的資格的最好證明的用處，因爲現在的設計所保護未經註冊的婚姻者僅祇包括財產關係和供養問題。」

於是庫耳斯幾遂就全國送達他的法律討論總結爲各項報告，他以亞爾于日爾省 (Archangel'ski Gubenia) 爲比較落後的農民區域的例子說明這省的每個鄉村都已注意這個問題，已有百分之四十完全贊成新法律，並有百分之六十僅反對這法

律的某些部份，而城市人民則已堅強地擁護新法律。至於農民對新法律的不滿大半根據這個理由：姘婚的承認可以增加不道德，並可以打破過多的農場。有些農民主張離婚應有一定的理由，離婚的數目應限定為三次四次或七次，而其他農民則主張應禁止姘婚兩年或三年。少數農民同意於承認未經登記的婚姻的意見，假如未經登記的妻子未曾給予財產權。城市得來的反對則有一種不同的性質。有些人根據優生學的理由而反對，相信姘婚的承認可以減少註冊的婚姻的數目，並可因此削弱國家在關於年齡和衛生的立法明文上的支配權。別人則害怕註冊的婚姻會成爲教會的婚姻，因爲在教會結婚的夫婦可以滿足法庭所需要關於婚姻的一切證據，並能由此要求合法的保護。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間發生與城市和鄉村間同樣分離的意見，因之農民大會上關於某些原案的決議則從贊成註冊的婚姻的青年人方面反對法律草案。

庫耳斯幾爲欲解答這些反對，曾指出註冊的婚姻的唯一意義是在害怕增加罪

惡，並不會想作爲加於不願註冊的人的一種束縛，並在莫斯科法庭所研審的三百個關於未經註冊的結合的贖養案件中有百分之三十六發生於有多年歷史的夫婦，僅有百分之四發生於偶然的或臨時的結合。他堅信法律決非獎勵一夫多妻制，而在以物質的責任屬諸每個結合，供獻建築一夫一妻制的唯一方法。

至於離婚的數目他覺得不足驚怪，因爲全年平均僅佔人口的萬分之十一，遠較離婚不自由的國家裏的離婚數目爲少。他覺得這沒有失敗於教會的危險，因爲在一九二三年，每一萬人當中僅有八十一大教會婚姻，而在一九二五年，每慶民一萬人當中則有一百次註冊的婚姻，這就證明後一形式已經變爲人民生活上一種一定的制度。

繼續的辯論仍如前年的辯論一般的熱烈。克列林可 (Кр. Ленин) 力主廢除司法部所揭載的獎勵安穩結合的婚姻證據。因爲草案的創製人曾致力經年，試想確定婚姻實在是甚麼，可是未得結論，因此已決定最好將這提交法庭自決。許多代

表與他同意，而輿論却爲在法律上應有些確定，僅祇具有某種永固性的婚姻能夠要求立法的保護，婚姻定義遂以成立。

一位共產黨員里亞贊羅夫 (Riazanov) 攻擊姦婚的認可。他說：「我們聽說這個草案在其達到理想的共產社會的意義上是進一步的，但就一般言婚姻關係不必服從任何強制的支配。……我敢這樣勇敢地說，在這些共產黨的文告裏毫無有一點共產主義。當我們達到一個共產社會，一切情形一切壓迫都絕滅了，那麼我們就可問問我們同志們自己，婚姻是否兩個兩足動物中間的一種私人關係，他們僅圖自己滿足而沒有權利去干與這打破一切外力的機械的社會呢？我們大家更有權利去追問在無產階級獨裁的第十年以後如何能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使那樣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草案聽受我們的支配呢？……我們應該教導我們的青年同志，婚姻不是一種個人的行動而是一種有深的社會意義的行動，須受社會的干涉和支配。若爲社會留意，他們必須知道這是一種應該認可的一定形式。」

……這個法律不過是一種亂雜的混合(Karika)而已！』

雖然這種論調受人稱獎，但在以後的講演上却又受嘲人笑，並有一個農婦老不客氣地說，我們對於里亞發羅夫同志的意見不能過分地注意，因為他的講演已過去了，而他自己既不需要登記的婚姻，自然就需要姘婚。

一位名為薩穆基(Samurki)來自達格斯敦(Daghestan)腰間佩着一柄短劍的黑膚代表起立說道：雖然這樣一種法律對於俄國其他地方是完全對的，但在達格斯敦便不得不十分留神地發生問題，那裏在去年當中有十個女子爲了不得父兄的同意而冒然與人結婚被殺掉了。

『不註冊的婚姻僅不過是一種黑風的形式。我們應該明白地說祇有註冊的婚姻纔是婚姻，其他都是一種罪惡，因此必須處罰。你說你在反對一夫多妻制，其實你正在間接地引用一夫多妻制。……至少回教法律是尊嚴的。……』說到這裏克列林可停住說：『可恥！』達格斯敦的代表接着說：『我是一個黑漢，不容

鼻使我面赤，要使家庭生活安定，妻子必須使用丈夫的名字，……因此我並反對妻子不應跟隨她的丈夫的條文。比如丈夫受了命令要出外一年，那麼怎樣呢？如果這妻子不願意和她的丈夫同去，遂讓她與他離婚嗎？」

另一個代表插嘴說：「那麼假如妻子受了命令要出外三年呢？」

然後一位女代表莫洛發(Moira)說：

「同志們！我必須是一個很爽直的人。當我初次讀這草案的時候，我很憤慨這一個條文應該在革命第十年以後未到兩性的平等已經長期建立纔包在我們的法律中。我想真正需要去敘述爲甚麼說油就是油的麼？……可是我似乎錯了。似乎我們當中還有人以爲丈夫任到何處去妻子應該跟隨他。同志們！這就不勝其說了。」

爲欲虐待他們的妻子，爲欲逃開避免應付的贍養費，爲欲在夏季娶一個妻子以充一個收穫的幫手而在秋季再又與她離婚；在這大部份的辯論上男子都是極端的錯誤，實則關於新法律的全部辯論都是保護無力的弱性。

後來一位粗大多毛來自西伯利亞的貧農馬泰書同志(Tonarian matish)再也忍耐不住，開口直說：「雙方都應非難！但是當着家庭破裂，這常是婦女的錯過。

……她看見她的丈夫年齡略大，就和她的丈夫及三四個兒童分離而跟着一個年齡較輕的丈夫了。有些青年男子單剩下他的歌唱和他的手風琴。總之，現在的婦女正在敢作許多壞的事體。她們時常跑進婦女部並誹謗她們的丈夫。整個的婦女委員會雖已召集，而丈夫尙全不知道，甚至他被凌辱。」

這些指示遂提起了某些其他代表的勇氣，憤慨這種法律是完全站在婦女方面的。他們說，這是不公平的。真的他們要求應有一定的婦女贍養階級，這些婦女足能誘引高薪工人取得贍養費。

有些婦女固然堅持男子是最壞的罪人，但也承認婦女的行爲不應當時該是這樣。曾有一個農婦主張爲欲限制婦女輕薄的關係，即是未經註冊的婚姻的兒童也不應向父親領取給養。另一個婦女發氣回去了，「這簡直是對農婦和女工一種苦

痛的謬妄舉動！我們所有的池非都會充滿無辜嬰兒的尸身了。」

就一般言，婦女贊成未經註冊的婚姻的保護，並由全國婦女團體分送關於這種主張的決議。

內務委員貝羅波洛夫(Рилюбордов)指出這個事實，即是反對現成法和草案的請願都是根於從戰爭和革命所發生的不均衡的多數的兩性關係所形成的變態情形。他說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報告俄國婦女比男子多四百萬。根據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在一九二七年滿二十七歲至三十六歲的人口中的比例男子佔百分之三十三，婦女則佔百分之六十七，而在三十七歲至四十六歲的人口中的男子佔百分之四十三，婦女佔百分之五十七。這個混合人口向城市流動和社會水平線的改革已經發生許多情形並已長成，這些情形可以立即完全改變沒有不均衡存在的幼年。

對於允許女子十六歲時結婚的條亦文極端反對，第一他們，堅信早婚是對於

兩性取得教育的最大障礙，尤其是在十七歲時就作母親的農婦方面深感困難，因為在夏季她們仍然要繼續去在田間工作，在冬季則要紡紗織布，所以在她們還未達到其充分的生理發展以前，她們就成了衰老的婦女。爲了同意這些反對，婦女的結婚年齡已與男子同樣提高爲十八歲。

這討論相持至通宵達旦。當這問題最後付之票決，新草案以約代表百分之七十五通過，並交託三十四人的委員會——其中婦女十一人——根據討論作最後的修正。在這新草案最後的形式上有少數重要的更改。重視註冊的手續以影響社會的利益和婦女與兒童的利益，並保持「婚姻的證據」以指導法庭判決未經註冊的結合。是否有充分的固定性並能給予這種結合一種合法的效力。於是這婚姻法遂製定了。

我之爲這問題而說了如許多的理由即是全國這種景象的新奇和被選舉的立法官想以那樣完全的實體論和公正解決其婚姻糾紛而達到穩定的勢力。這法律最能令人心悅的方面就是他們甚至對於自己所創造的傳說和陳例的完全換變和他們的

決定並不是最後的，與在情形改變時他們多半須得再三將婚姻法修正的承認。

我已似乎不能調解老年和青年間與于熟悉世故的城市工人和無知的農民羣衆中間的紛歧意見。但是鄉村方面似乎與最後通過的法律不大違背，只有少數老的農民在從莫斯科會議回轉馬斯洛夫克特鄉村的火車上對於這些亂婚 (doge wedding) 正爲搖頭傷感。車箱角上有一個青年女子正在痛自飲泣，她的事情就在飲泣中吐出來了。她的父親——一個可憐的農民已被一個年老有錢的富農送他十桶酒將她換取了：她的父親往訪她的愛人宜文 (Иван)，並說只要宜文能捨棄她，他便送酒三桶。宜文不受，而她的父親竟說她須得任便與富農結婚。兩三個青年農民集在一塊圍住她立即開始談論一切。

『你是何等的笨啊！難道你不知道婚姻法嗎？』——『沒有註冊的文件，牧師不會許你結婚，而且你如不願意結婚，他們也不會把你註冊。』——『只要這樣告訴他們，且看他們怎樣對你。』——『而且你年紀太小，無論怎樣他們不會和你結』

婚。……」

「但是我的父親要打我啊！」

「那麼你甚至能夠將你的父親拘捕！不妨到婦女部去，她們可以告訴你怎樣去幹。而且假如你願意跟着你的宜文，誰也不能阻止你。……」

莫斯洛夫克特鄉在大齋之前兩個結婚月份當中有三十五個青年夫婦已開始在蘇維埃註冊，於是而加冠而跳躍而在教堂中經過方場歌頌。並有其他五對配偶已經註冊且已省略教會的儀式。更有兩對配偶沒有去教堂或蘇維埃而已成立他們的家庭。僅有一件離婚，一個青年女子被她的父親以七盧布出賣了並以大飲家釀而許嫁了。這個女子不中意她的父親的選擇，而她的許嫁者說，假如她可以歸還他七盧布，他就可以解除她。但是她沒有法子得到這七盧布，她的父親威嚇她服從。幾天以後她聽到這新的法律，沿泥步行到了隣鄉裏的全州大本營而實行離婚了。

第八章 革命道德

我們既已詳細研究過成文法和外部形態，乃明白戰爭和饑荒時代所釀成的混亂，革命所決定的改革和正由環境所形成的新形態。究竟男女間那一種生存關係是新的輿論和青年人的態度呢？甚麼新的倫理法典正已發展了呢？那一種道德共產黨員正在實行呢？

共產黨員是以現在沒有永久不變的道德真理祇有社會各階級造出本階級行為的標準這個假定為出發點，這就是他們的道德和別人的道德中間的主要異點。當你考察在這主要異點的基礎上所發展的行為法則，你可看出在他們的基本法律和法律條文與乎歷來統治人類的法律中間有一種奇異的類似，至於這些行為法則的應用則是另一個問題。他們並不猶豫在對於本階級以外的態度上揣用一個不同的標準的事實。他們不說「尊重你的父母」，且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違背這種意思，

他們俱說「尊重你的父母，假如他們是好的革命者，否則就教育他們。」

統治人生的法則均標榜於社會觀點。共產黨的哲學和個人的行爲全無關係，這種哲學出發於整個的社會——不是現時存在而待將來實現的社會——的觀點，凡是和社會觀點衝突的都是錯誤，凡是對社會觀點有貢獻的都是真理。列甯解釋共產黨員的道德爲：「團結工人反對剝削的一切形式並用以達到最高水平的人類社會的一切。」

經驗是否可以由證明於個人有害的甚麼不致損壞全體而傳給個人，這是一個尚待將來解決的問題，因爲這種證明是與全體有關係的個人的功用衝突。但是新的社會祇能由發展比較充分的個人而建立，這已是公認的事實。

在革命時代，革命本身便是行爲的法則，沒有時間考慮這種或那種行爲是對將來的社會較好的，各種現象都要求敏捷的解決和積極的行動。一般嚴厲的較老的共產黨員在當時一切性的問題上處一種節戒的態度，無論怎樣，從沒有爲愛的

優點打動過。肉體的要求順便就可以滿足，好比一個人在小點心櫃台上飲一杯咖啡一樣。

現在已到了穩定的時代，他們能開始批評直接的革命便利以外的基礎上的行動。同一的原則應用於社會的動的發展者多，應用於每日或每時的事務者少，現在這原則已承認一定的法典和行爲的特別法則的形成。這個根據系統的實在的基礎而實現這種法典不會忽視將來的革命理想的計劃已遇着許多困難：第一就是上面所述的疏忽態度的堅持，第二就是生理和心理的病態影響大多數青年成爲飢餓、疾病、過勞、和青年時所經驗的過激改革以至釀成種種變態和放蕩的結果，第三就是某些理想的學說極端地發生，在蘇俄過盛興旺，末了就是一種極端厭世主義的態度——多半是反對這一切的一種反動，已經表現在減少人生樂趣——包括禁止的遊戲、音樂和跳舞並主張排棄政府型式上的些小愉樂——的同等變態的企圖上。

假如已經嘗試並習染長年實際工作與革命和重要鬥爭的某些老年人在革命以後改革的努力上有一點狂熱，那麼青年人失去平衡就用不着奇怪。可是當他們開始補習他們的教訓的時候，國內戰爭從之爆發，於是在那殘餘的些小的物質幸福已經平均佔有的軍事共產主義時代，革命和國內戰爭的劇烈時期遽變而成爲全國爲主義犧牲的時期，因此他們在早昔可以忍受的甚麼，今後的人生途乃激昂無比地要去申訴。會議和政治的社會的活動開始佔住他們的日子。政治書籍培養成他們取厭的青年領袖，而且他們到處都爲新奇複雜的觀念所襲擊。及至負有新奇和紛擾的意義的新經濟政策發生，無怪乎青年人該當思想混雜，而他們的前輩都以他們的混雜思想所引起的種種形式爲慮。

布哈林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的講演上敘述了一些這樣的影響。他說在前有一羣人造成事物的機械崇拜，這是在革命以前或革命爆發的本身當中所必需的，某些在革命以前已是革命的東西仍保留在這些人民的法典上成爲一種習慣

，否則就得廢除，例如若在某些地方從前已禁止吸烟，那麼現在有些青年認為在會議時連抽四枝香烟，和藐視禁煙禁酒的宣傳是每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所必要的。若是資產階級有文雅的態度，他們便主張無產階級應較為粗魯，不妨在屋裏帶着帽子並隨地吐痰。真正的革命者應該讓他的內衣襪襖，穿着粗陋的衣服，因為清潔全是資產階級的習慣。因此他能做到違反資產階級習慣的一切事情越加完備，他的革命精神就越加偉大。這個不僅適用於行為的問題，並也適用於戀愛問題。戰爭緊張的時候既沒有時間嬉戲，在那時候以後真正的愛人又不能困於求愛的嬌媚而要立刻達到目的，所以凡是拒絕弄情和握手的女子都被斥為那是不會解脫的資產階級的成見。

科郎泰(Kolontay)在她的短篇小說三代戀愛(Love in Three generations)上曾以略為極端的方式擁護這種態度。第一篇小說是馬利(Marie Stepanovna)荒唐的戀愛故事。她離開她的丈夫——沙皇軍隊裏的一個大佐而冒犯大不韙的羞恥。

因為她所愛的男子僅是空想的，所以情願終身致力於各省巡回圖書館的組織。他的女兒奧加（Olga Sergeyevna）曾以充滿苦痛的戀愛史求科郎泰告慰。她曾和一個同時的革命者結婚，自從放逐回來，隱匿在聖彼得堡的工程師M家裏作保姆。雖然她一向愛她的丈夫，但是他們中間不管政治主張上的鴻溝怎樣，竟發生了一種委曲的熱烈的愛。母親的命令主張奧加為她的愛人而脫離她的丈夫，可是奧加在他們倆中分離，後來仍舊回到她的丈夫那裏去了。雖然那時她已生育過工程師的女兒，她的丈夫却願意取她回來。往後在革命過去若干年，她和她的女兒吉力亞（Gelia）在莫斯科與和奧伽已經發生戀愛的一個青年同志安得來（Anity）住在一間房子裏，因為她的工作過忙，時常離開家庭因此促進了吉力亞和安得來中間的友誼。一晚她回家來，看見他們正在擁抱，這恰到了她失意地要求科郎泰保證的時候。使她的苦惱的不是擁抱的事情，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告訴她，不曾注意她

個同志負責。於是吉力亞該爲自己怎樣解說呢？雄偉的嫺雅的和爽直的古力亞，一雙黑圓圈子的眼睛，已是負責的黨裏工作人員，向着科郎泰請求說：

「你奇怪的是我不待和男子們發生戀愛就和他們同居嗎？……我曾讀過很多的小說，懂得在戀愛上應費好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在過去我們何嘗有空閑啊？往往忙碌，往往被其他事情佔住了我們的思想。假如有男子注意你的時候，而他又被派到前線或派到別一城市去了或者自己十分忙碌以至忘記了，那麼，一有機會我們便利用那個時間來享樂享樂又有什麼妨害呢？」

「我爲甚麼不告訴母親嗎？因爲我不想去使她傷心。假如我們三人都曾互相愛過，那就不同了。但是我並不會奪去她的甚麼。我所不懂的就是爲甚麼不留心他的性情年齡和我更爲相近，他已和我共享一切，而但以他和我接吻爲慮，……當她自己沒有時間和他接吻的時候。母親纏擾於這個觀念：以爲當我這個年齡不去瞭解真正的戀愛，這是變態的和不道德的。但是我想這是我更好更簡便的方

法，沒有猜忌，也沒有苦痛。我不願意愛她所愛的。那末，我該在甚麼時候工作呢？」

當她離開科郎泰的時候，她親自問道：「誰是美好的——有新情緒新知識新見解的新階級呢？」當吉力亞的聲音圍繞着走廊的時候——「同志們快些！我們會延遲開會的时间，我們有許多多的事情去做！」——，我們曉得科郎泰是站在吉力亞方面的。

但是一切的青年不都是吉力亞，這種哲學不免會被許多人所濫用曲解，在他們看起來這種哲學僅是一種邪惡的寬容。而且科郎泰自己也不會指出這種哲學是任何永久的決議，她僅指出這種哲學是極端危機時所必要的，因為在不能直接或為革命原因的精神經驗的偏面上消解鬥爭團體的道德力這是不合理性的，但當那時期過去以後，於是便達到「向愛神求愛」和經驗戀愛的苦痛與光榮並鼓勵一切情緒（至少是有社會價值的情緒）的時期。

斯彼德洛夫(Sverdlov)大學的宰耳欽(Zalkind)教授和科郎泰處於對立的地位，並費了很多時間想來推翻她的說學。蘇聯現代工業化的政治是要求機械製造和生產方法的集中，而不是專供直接消費的貨品的製造。宰可欽更要求性的工業化，他相信性愛應有利於無產階級，僅是一種實行將來的戰爭的健康和強壯的階級的生產方法。根據宰耳欽的意見，「性的結合對於任何叛逆和不真實如階級敵人的對象就可認為一個人和一個鱷魚或猩猩一般的兩性結合。」當他認識了性是某些幸福和娛樂的根源，他覺得工人階級應該研究兩性間一切快樂的根源的總和上的快樂，確定性的有益的和有害的意義，並根據革命最大的便利規定性的用處。他的十二條主張如下：

1. 無產階級不應早婚。
2. 結婚前完全貞潔，且僅在社會的和生理的充分成熟的情形底下結婚。
3. 僅在打算長期共同生活和在各方面均適於合作的創造事業的人中間結婚。

4. 性的行動僅是對被愛的對象深切完全的同情和愛情的終局。

5. 性的行動不應過度。

6. 愛情必須專一，必是永久的而非變異的。吉力亞的理論是一種病態而非階級觀念。

7. 每次性交時必需留意生育兒童的可能；節育和打胎都是有害的。

8. 在愛的關係上必須毫無戲謔、誘惑、妖嬈和其他征取對手的特別方法。

9. 性的選擇必須適合革命的利益，肉體的引誘是一種野蠻的殘餘。階級的相合和共產黨的澄清人類的純粹優生學的問題是在被愛者的選擇上的惟一條件。

10 假如有較壞的人爭奪，那就保證你的優越，假如被較好的人爭奪，那就各自分異。兩性間不應有猜忌。

11 不應有性的誤用。

性必須充分地補益階級，不僅絕無衝突，且能供應一切。

雖然宰耳欽教授承認強行這種完全的「性道德化」的任何企圖都可以立刻發生悲慘的結果，但她確信他的意見是根據現時實際的可能性的方略的折衷辦法。這樣一種武斷的哲學恰好和科郎泰的哲學一樣被人濫用曲解，而且恰好是空想的表現，這並不值得奇怪。

例如在帕門 (Perm)，有些熱烈的青年清教徒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上決定遣派偵探夜間拘捕一切沿河懸椅坐着的青年團男女，用外套蒙蔽他們的頭使他們不能逃走，再將他們帶回青年團部作社會的公判和同志的警告。一晚努力執行這種法令的委員會的書記自己忽然也被外套蒙上。當他們發現他是誰時，俘他的人想讓他逃走，但他勇敢地堅持不得爲了他的職員地位而有甚麼差異。他公開承認他的罪惡，請求原諒他幼年時所犯的錯誤，並且加倍努力去拘捕別人。

這類的行動之被人嘲笑如同對立的放縱之被人譴責一樣嚴重。共產主義青年

團公理報(Comsomolski Prata)副刊主筆屈思明(Kusmin)曾以這方面的問題支配大部份的篇幅，他一個定名為「青春老年」(Young Old Age)的題目上述及他會接到一封題為「新生命之路」的信。那封信的無名作者主張應廢除握手，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發明，顯明地想在被壓迫的工農中間傳播這種惡習。有些工人階級的領袖打了領帶便是最壞的行爲，不能見諒於青年團，美麗的服裝應該斥爲中等階級的好尚，因之全體女子應着皮短衣和皮靴。戀愛必須卸去一切癡情而實現爲所謂「惟一的肉體結合」，那些不喜聒絮而在聽信一個索然無味的報告以後就開始吹噓的青年團員最好去和少數派結合。任何犯着小資產階級跳舞的習慣的人都應像惡草一般拋棄在青年團行列之外。

屈思明認爲這封信是爲作者自己說話的，乃附上一段短簡的譏刺和評語將這信在他的副刊上發表。但他是怎樣的驚異啊！在短時間以後他又接到一封信報告十月革命時代的某個同志教他作一個關於「新生命之路」的報告，攻擊上述的那封

信，發表這個題目並提出他的報告。少數同志不同意於這種論調，但是作者竟發表青年團公理報上的原文將他們鎮靜，聲明他有中央委員會的後援。屈思明同志說：「這個似乎像是一種奇談，但這是現世生活的一片。當我接到擁護原信作者的意見的許多信，我的毛髮豎立。這些信之一的作者說明戀愛無補於共產主義！——我恐怕我的這位青年朋友的一片苦心反為徒勞無功。」

屈思明結論：「青年團員正感受着苦痛，成千的影響正牢蓋在他們身上，他們正想法解脫這一切矛盾的影響。一切新的需要思想和慾望剛在產生；舊的既已廢除，新的還沒有創造。……沒有時間消遣的年幼的青年團員慣喜飲酒。假如一個女子反對將髒髒的靴子擗在她的床上或在晚上換着外衣，他們就說這是小資產階級。……但是還有甚麼值得奇怪呢？假如我們的同志遵守嚴密的工作並注意自己的前途，他們還可以清潔地並儘美麗地裝飾。甚至我們可說假如他們想離開多餘的工作而將這些工作平均分配給團體的各份子，那就讓他們去結領帶也可以的。」

假如在鄉村裏，那麼青年們在他們的空閒時間儘可以跳舞並弄手風琴。

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間比較和平的首領深切地以這已經述說的兩個極端爲慮。我曾和許多參加實際工作、革命和國內戰爭多年和現在黨裏佔有負責地位的老共產黨員談過，我曾向工廠裏大學裏和普通學校裏的青年人以及鐵路上會議上偶然遇見的人談過，發現他們都感到他們的生命有一種令人詫異的直率的事實，正想拼命地力求解決。薄情的出版物已表現他們的一切短處，已寫成無數的論文和書籍。這些問題已變得非常尖銳，遂於一年前共產黨執行委員會開會時提出政黨道德的問題。舊價值已經破壞而還沒有新價值的許多入黨的新份子正想尋找在日常事務上行動的指導。因此執行委員會覺得發表某些一定的指示並決定創造道德問題上一種新興論的時間已到了。

從此以後共產黨領袖經常地努力於創造某些行爲的法則去引導青年。青年團和黨報什誌每期以若干頁專供道德和 *But* 問題上的批評和討論文。But 一字

在字義上有「存在」的意思，但是通常指爲生存於某一已知時代的社會裏的某一已知階級所有的道德和文化諸情形的總和，或更簡單地說是「生活的方法」。青年人有許多信寫給前輩要求前輩給予前人所常確實地給予的勸告。新近這些材料有一個較爲完備的搜集，已由青年團的國家出版部出版，定名「共產主義青年團Bulet」這本書的內容極值得注意，因爲這是除去少數小冊子以外在俄國出版的這種材料的第一部。

列甯和克拉刺 (Clara Zetkin) 的講面始於一九二〇年，通常認爲這是性問題上真實共產黨員的意見最好的解釋。列甯表示驚疑地說，「在第一個無產階級政府正向全世界反革命宣戰的時代，工作婦女的討論團體必須首先注意於性和婚姻問題，堅持青年人中對於性問題的「現代態度」。

「青年人對於性生活問題改變的態度自然應符合主義並根據理論，許多人稱他們的態度是「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他們真正想是這樣，但是這並不會使我

這老頭兒相信。雖然我比任何人都少不樂的厭世觀念，這個所謂青年的「新的性生活」以至老齡較大的人的「新的性生活」往往似乎全是資產階級的。恰好是資產階級妓館的另一形式，凡這一切，在我們共產黨員看來，無論如何都夠不上自由戀愛。自然你很諳悉著名的理論，共產社會裏性衝動的滿足和愛的要求可說是像喝一杯水一般的簡單和無關係，實則我們青年已迷惑於這個理論，這個理論，已經變成了許多男女的不幸的命運，然而這個理論的熱心家堅信這就是馬克斯理論。

○……

「飢渴自然必須滿足，但是一個尋常人在尋常的情形之下，他會臥倒在街路上去飲泥質的污水嗎？或者去飲許多人飲過的杯子嗎？而且更爲重要的是性的社會方面，飲水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但是兩人發生愛，更從愛生出第三個新生命，這裏就發生社會的權利，就注意對於人羣的義務。

「我從沒有一分鐘想去宣傳厭世主義，共產主義必須達到由愛生活的滿足得

來的生命的愉樂和強健，因此我以為不能從現在所常見的性生活上的過渡達到生命的愉樂和強健，反而減弱生命的愉樂和強健，在革命的時代這是壞的，最壞的。

『青年需要健康的運動、游泳、旅行、各種體育、各種心靈的興趣——學習、研究、科學的探討。一有了個健全的身體使成功一個健全的精神。我們不想做和尚，不想唐朱奧斯（Don Juan）更不想做那快樂的通靈者德國非利士人（Philistine）。』

『你們知道我們的青年同志X是一個漂亮聰明的青年，我恐怕他除此以外並沒有甚麼好處。他從一個戀愛的事件跳入另一個戀愛的事件，既沒有參加過政治鬥爭，又不曾參加革命。……你應知道革命要求羣衆和個人一切力量的聚集和訓練。無產階級是一個進步的階級，他不需要酒醉去阻止或興奮他，也不靠縱慾或狂飲，……他僅需要光明。』

「但是克刺刺啊！原諒我能！我已離開我們談話的立場遠了。你爲什麼不叫我去發令呢？我的恐怖強迫我說。我們的後裔深切地苦惱我。他們是革命的一部份。而且假如資產階級社會的罪惡的暴露好像開放野花的惡草根株一般出現於這革命世界之上，那麼最好是立即利用方法去肅清這些罪惡的暴露。」

在以下各頁裏布哈林、雅洛斯拉夫斯基、呂拉察斯基、和其他許多人都同情於列甯的意見，並更特別地促進行爲的法則，他們說行爲法則是新社會的建設所必要的，好比工具對於木匠一樣。這種重視的確是站在清教宗方面。他們在烟，酒和縱慾的禁絕上團結一致，他們堅信可以僅由社會關係的觀點而非青年道德化的理想以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坦白地承認現在的事情多半應歸咎於年齡較長的人們，因爲他們都負責作教育的模範。他們開始認識年齡較長的人雖在他們的時代已有東西可說，現在單是政治就夠賴以生活，但是青年人更需要其他東西充實他們的生活。

家庭在過渡時代成爲將來社會核心的重要和由父母教育子女在國家得有效地從事教育以前的必要都已搗用種種方法強行了。更有少數人主張優生學的原則。

科爾薩夫(Nikolaz Kolsov)說：「我們的青年不應忘記這一樁事實：他們的最好份子不僅應以他們的氣力和材能去做組織新文化的事業，更應將他們的能力傳給後代，不可忽略在那些無用的民族方面傳播種族的事業，因爲那些民族像似野鳥般生活，更以他們自己的疏忽和精力的缺乏傳給他們的兒童。每個健全強壯和能幹的青年男女必須在他們身體成熟的開始記着他們一生至少須有三個最好四個兒童，假如他們期望後裔在天資上是和現時的人一樣豐富。且讓每個行將結婚的青年選擇他所願意的女性，從她生育最好的兒童。因此現時的婚姻法、註冊、贖養費等上面的爭論在對於婚姻有這種態度的，人看來，完全失掉了意義。」這本書的後半部是由青年團各級組織各部份的決議和報告編輯成的，有的是悲劇，有的是喜劇，無非都是發揮「新生命方法」不應是甚麼的解說。

關於他們自己他們寫了說了許多，而我則敘述他們的觀察比我自己的較多，爲何要這樣呢？因爲沒有一個懂語言不完全，多半生活於俄國的美國人集團中的外國人能夠熟悉地懂得俄國人生活的情形。不過我自己的描寫大約可算是較爲明白的。卽令我認定我的描寫能夠繪出他們所經過的一切的蒼白影子，我從不曾對他們的事情——鄙賤的喜劇的或悲劇的各方面有所驚疑。我所認爲的奇怪還是他們已能夠維持的衛生方針和已經創造的秩序與美術。我從不曾迷惑於過激主義，因爲我從俄國歷史懂得俄國人的特性必須在達到平衡以前迴繞一個廣闊的弧弓。

在評論俄國現狀的上面更須記着他們對於性的態度有一個原由存在，這個原由是盎格羅薩克森人的心理難於把握的。男子和婦女女孩和男孩，一同關在火車箱裏旅行，在同一間房裏住宿，在河岸或海濱當衆目見毫不顧忌地卸衣。從前的離婚法律多使俄國人習慣了多夫關係的觀念，對於夫或妻方面的不信任不如西方看得重要。至於俄國比別地方究竟要多幾許混什這似乎難於推測。自然多半是釀

實的。無疑地俄國人有這種性的自由的惡習，但是這種直率比較我們假定的良善所允許的結合事實上必成爲兩性間更健全更適宜的結合。

我曾敘述新道德上兩種對立的傾向，這就是說用來證明現在俄國道德完全的衰壞或致命的嚴酷的有時是這一種傾向有時則是那一種傾向，沒有一種是對的。標準還沒有決定，新的道德法典仍舊是一種動的東西，因爲法律的固定固然可以哄騙少數老年人，而在他方面有些青年人則認爲有太多的補充。最爲明顯的一事即是青年輩不願承認任何標準的法典是最後的，他們極端希望他們的行爲適合將來的需要以使生命比從前更光榮更美滿。

他們對於自己的錯誤的認識和對於自己的笨拙的嘲笑總算有了成效。關於惡濁和摻雜的羨慕已大爲推進，現在且有一點休息時間以享樂其他的東西。我已在共產青年團當中看出這些東西，特別是在外貌的注意和他們一般的態度上的顯明的改變，並也有一種反動開始反對禁止跳舞和愉樂的使用。

莫斯科大學的一個青年醫學生告訴我說：「你莫以爲正因爲性的問題是我們少數青年人當中一個「病」的問題，我們就都被這個問題吸引住了，其實我們的大多數正在忙於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僅準備自己的將來，並根據我們的研究從事現在良好的實際工作。我們正在幫助訓練附屬各大學的工人，我們的大多數正用已經學習過的東西在工廠裏授課，在這上面女學生甚至比男學校更活動。……在男學生和女學生當中並沒有建築起人爲的差別，因此已除去了許多各自的性別觀念。自然們們需要尋找一個伴侶。我們大多數都已結婚，並且我們的宿舍裏已充滿着兒童。」

他領我到了學生宿舍，我在那裏見着許多共同生活的小家庭，每個小家庭佔住一個小房間。夫妻都在研究，小孩則跟着他們在房裏好好地養着。宿舍裏經常有一個房間專供日間看護，但是學生母親往往要盡力把小孩跟着她，日間以她的微薪的一部給予看護婦以幫助她。這些小家庭都希望小孩，他們的母親都以爲最

好是當他們在青年時候就有小孩，這樣，他們後來就能用充分的時間工作。他們的多數至多不過兩個兒童。他們解釋現時在大學裏有這許多兒童的理由，就是現代的多數人過去沒有機會在適當年齡時完成他們的學業而需在現時補習。

現時正在實行十分實用的法律，禁止青年間不衛生的趨勢，關於早期性交的危險和柳病的影響，現時已有許多醫生和專門家的講演，正用電影宣傳關於這些方面的教育，在學校裏特別努力講授有益的性教育。特別重要的是遊戲運動，在最近幾年來這種運動已普及於全國。他們促進遊戲的和體育不是為着遊戲和體育本身的目的，而是達到比較健全的身心 and 發洩剩餘精力的一種方法。至於娼妓，我不敢全信這問題上已能找到的少數統計，但是現在一定祇有比過去較少的娼妓。許多的考察已經證明娼妓供大學生的需用比從前少多了，這個大牢可以用兩性結合的自由有更大的機會這件事實來解釋。然而現在娼妓的範圍仍然值得驚異，因為政府曾經採用嚴厲的方法廢娼。他們認為廢娼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工人的經

濟水平線和社會化的推廣的一般計劃。這些事情完成以後，他們遂相信娼妓可以絕滅。但是他們也看出直接實用的法令的必要，並在衛生部(Наркомдрав)底下組織廢娼中央會議。

在這問題上一切政府的佈告和命令聲明正在廢除的是這種制度而不是私娼，法律僅處罰向婦女身上剝削利潤的人而不處罰私娼。娼妓僅遇傳染花柳病(男女應同受處罰的罪惡)纔被處罰。新近這條法令已修改為剝削他人而致花柳者應受處罰，因此現在可以強行娼妓的檢查和診斷。……地方防軍規定不得使用禁止私娼的強壓法令。

法律規定云：「根據事實，身為娼妓的婦女係因忍受不住肉體的或生活的情形而出此，每個為盡本身職責而監視娼妓的地方防軍須注意有禮的和合理的條規，不容有任何強蠻行為。」

花柳病是廢娼運動的一個特別原因，對於這個，現在俄國全境有一種廣大圍

結。關於花柳病不僅專為診治的人們而且更為一般人民組織有課程、講演和電影。在列甯格勒和莫斯科已經組織有許多簡單形式的合作社，凡經診治並不願仍操舊業的娼妓均給予工作和每月取得一定工資的機會。在莫斯科有一個這樣的縫衣店：店裏雇用二百二十名婦女，並有一百二十名訂立一年期限的長久職業。附設食堂一間，並備有宿舍及俱樂部壁報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縫衣機器均由衣業信託公司供給。婦女忙於縫紉衛生部所用的護胸。此外莫斯科市更備有專供各種難民居住的宿舍，有一間婦女樓房會救濟許多脫離娼妓的婦女。我曾在莫斯科市二十里之外考察過一個的設有妓娼小農場，她們都是一般平常青年健全的和快樂的樣子，未曾留有舊時娼妓生涯的痕跡。

除去實用的法令之外，更有衛生部、共產黨、婦女團體和同業組合的廢娼宣傳，這種宣傳是從創製新的衛生法規的觀點和發展工人與青年中間的羞恥意思——無產階級國家裏娼妓應該存在——的目的以同樣地反對娼妓的供給和需要。關

保劍削娼妓的恥辱比關係娼妓自身的恥辱更多，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佈告凡與妓業有關的黨員均應開除黨籍。

新道德法典已被比較不斷的講演、討論或體育運動更重要的影響形成了。主要的要素便是人生的新要求和新興趣。沒有能創造服裝理髮和行動的標準以供別人模倣的優閑階級的青年男女，沒有處處覺悟了的青年羣衆會被性所吸引而用無敵人爲的方法將他的生命都消磨在提高性要求的事業上。俄國專門學校裏沒有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這種東西，每年送回半受感化的智識份子的巨大收穫以增多閑惰和不安的階級，他們的中小學校和大學都是教育青年從事某些一定的事業，父母在法律上必須養成其兒童適合於一種有益的職業。

他們在性上面的興趣既不是一種私奔，更不是性的本身上的目的，因此祇要你願意，那麼這越生動就越自然。他們正注意使性對於他們的將來成爲一種適當的結合。他們更深切地傾心於他們建築新世界的工作、研究和任務，因爲這樣就

可以替代閨情者或不能避免生存艱苦以達到安樂目的的人的生活上所常有變態情形。許多助成男子認定婦女爲女性而不過如此的不堪思索的事物現已肅清了。舊法令的殘餘仍然在老年中間存在的甚麼即是承認男女具有同等的基礎，仍然在老年人中間所發現的對於婦女一般能力的輕視態度在青年中則難於目擊。自然凡此種種在堅持家庭觀念的鄉村和小城市裏不如在教育機會更大的城市裏之真確，但是沒一處有任何兩性間彼此的人爲的分離。男女在任何方面都有同等的機會。每個女子都應供給自己這是大家公認的。實在形成新道德法典，以及男女間的新結合和將來的家庭的全是這些經濟力和社會力。

第九章 房屋的供給

家庭這個字往往含有家宅或家屬的意義，但在革命以後的開始五年以來，却有成千無家可歸流離於各地的家庭，和當侵襲的軍隊或饑荒臨降他們的時候從這一地至那一地的入口的流徙。我們常得在鐵路線的兩旁見着他們剩下的傢伙就祇有一把製茶的銅壺。全家伴着這個遺物忍耐地坐着幾天，在候乘搭滿載人客的火車的機會。俄國人任到何處都極其容易成家立戶，我記得曾見過一對青年夫婦，他們就在擁擠的車站的地板上攤設他們的床位——枕頭，被褥，絨氈等等，大胆地擁抱安睡。一個被俄國人家佔住的頭等火車站的龍頭盛着開水的茶瓶像似喜悅地出着熱氣，更有鹹青魚和大蒜常聞的氣味。

那些能夠保存少數家產的家庭與這些無家可歸的家庭無相上下；他們也沒有

時間顧及家庭生活，那時人民所顧慮的只是維持生存的事情，而不是他們怎樣生存並在何處生存的事情。他們得以注意供給房屋的問題不過是近兩三年以來的事情。現在他們正將哀鴻遍野的現象改變成爲供給房屋的情形。他們在實行改善的努力上並未忽略他們自己的種種過失和短處，因爲過多的社會困難——家庭的破壞青年的墮胎、賣淫、墮落、疾病和狂飲——已經直接間接形成了家庭的缺陷，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必須十分留心俄國家庭生活的將來。

俄國在大戰以前同着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感受一種供給房屋的危機，在俄國的舊都會和粗惡的市鎮裏有一種不可獲已的衰壞，大多數工人居住在黑暗的地窖裏，有些地窖現在還得強人居住。戰爭使可以完成的一般恢復和建設都歸於停頓。但在革命以後工人自己管理大棟房屋、旅館和私第。公有 (Collective Ownership) 的態度和保留現在屬於人民的東西的必要在當日還不甚明顯，後來利用政府的宣傳和實際經驗才見着發展。我相信沒有故意的破壞。從沒有居住在裝設鉛管的

屋裏的人有少數知道怎樣去看守鉛管，當着汽管破裂或是窗門撞破，就聽其無人修理。飽經國內戰爭的城市遭受更多的損壞。當我初次行抵莫斯科的時候，這種現象隨處都是：牆上開着破痕的建築，塞滿着爛布的窗門和一堆一堆的磚瓦從前盡是齊整的房屋。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這種破壞達到極點。居住該地的人民曾向我再三描寫過那可怖的冬天：沒有柴薪，屋頂和窗戶都裂着口，沒有那一個房子沒有孔洞，在毫無辦法的時候他們竟拆下空架的房屋以供柴薪，利用建築用的木材擊火。

婦女們在過分不快的情形底下不得不操作她們的家務。她們既沒有飲料食物柴薪可以使他們的家庭得到溫暖，便不得不挑着壓壞肩膊的木材和水的担子，有時要挑上很長的扶梯——那時沒有電梯可通——然後一排排立着幾小時在候糧食。這糧食往往祇有鹹青魚和一小塊黑麵包。

及至一九二二年春季，因已實行新經濟政策和賑災，供給房屋的情形上得有

一種普通的改善。自從一九二二年二月我經過莫斯科的時候至同年十一月我重去的時候這幾個月間的比較真有非常猛達的進步，那時零斷的痕跡均已補葺，到處呈現出新鮮現象，氣管和窗戶也正在修理。

關於供給房屋情形的救濟在一切工業中心裏僅只暫時爲然，尤以莫斯科爲然。自從資本列甯格勒移至莫斯科以後，遂轉便利而成爲一種可怕的危急。多年不相見的父子忽然回來，因之他們的家庭所居住的小宿舍越加擁擠。城市中改善情形的消息遂使在沒有種子牲畜和器具的地方萬千疲於荒年的男子去到城市中尋找一種生計。現時這個趨勢依然繼續，因之有些地方如莫斯科、羅斯托夫、頓灣和巴庫諸城市裏的建築物不能剛好應付這種趨勢。每人空地的總量已一經年一年地縮小，往往有常八九人擠在一個房內，新來的人簡直沒有地方安置他們的床位。因爲一般的破壞和給養的缺乏，合適的房屋地面已經失掉了百分之二十。供給房屋的委員雖已從工人所有的大房屋裏選出，但是大半盡冷淡工作，並沒有中

心主權和中心計劃，國家不能將建築和修理家宅的問題都操在自己手裏，全靠贖工人自己去在恢復的程序上參加活動。因此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九日已發佈一條法律給予人民以自由組織，供給房屋的合作社的權利。在一九二五年這些努力盡集中於一個大的組織，即是，中央合作社供給房屋聯合會(Сетротделстрой)。供給房屋的合作社分爲兩種：即出租合作社和建築合作社。第一種是居於固有房屋裏的人民所組成的。現已施行一種由政府定期出租房屋的制度，並已嚴密地實行關於借款的標準，和保管、修理、及發展房屋的任務。中央機關購買堅實的必需的建築材料並供給工業上的幫助以幫助他們，同時實行宣傳並在組織更合理的生活方法上給以實際幫助，更獎勵團體的文化運動。已經佔有房屋的團體已正式地組織爲合作社，並已組織新團體取得其他建築物。

我曾到過許多附屬於工廠和學校的共有的房屋，並發現她們正在社會進化上的各階段。凡屬未經訓練或預備在革命以後突變爲完全共產的生活方法的團體常

常失敗，並降落爲個人主義的制度；凡進行較遲僅僅採用試驗生效的新社會形式的團體正在漸漸地成功爲達到一種進步模樣的社會組織的健全基礎。

有些已經取得的大建築如同大學宿舍或旅館均係朝向長條走廊開門而成行列的單開房屋，這些單開房屋往往由一家居住。有時我們可以看見那樣的建築有一居中的食堂或一個分發食物的中央廚房。然而最好是每樓都有一個中央廚房，婦女們可以在那裏預備她們自己的飲食。有時廚房寬大並且空氣流通，有許多爐灶，開水常貯在龍頭之裏。然而這似乎太小且又擁擠，婦女在火爐旁邊彼此推擠，空氣則有爐烟迷漫又復嘈雜。或則每個婦女攜帶她自己的小煤氣爐在公共廚房裏單獨地炊她自己的飯食，或則她可以在她自己的房裏炊爨。凡是房屋分成許多單開間 (Apartments) 的地方常常甚至更爲擁擠。這裏一家居住每一單開間的一個房子——五六個以上的家庭擠在早先專供一家居住的地方……，又廚房亦歸公用。用膳時間則是一種慢性的事。於今俄國的城市中尚有少數婦女使用她們自己

的廚房火爐，儘可說廚房正和某人的寢室一樣。無論這種不樂的情形怎樣，總而言之，工人的生活正比以前較好，而在這些公共住宅中發展的社會組織已解除婦女方面妨害自由的生活狀況。每個公共家宅都有其俱樂部，圖書館，夜育兒童。且由教育和實驗教授的媒介婦女們漸漸引上更合理性的生活狀況。

城市中國有財產的價值計爲金盧布六十億，而其半數——實際上包括所有最大的建築物則由政府出租於供給房屋的合作社。蘇俄的都市人口總數計爲二千五百七十萬，共有單獨的合作社三萬一千五百所，其中大多數在大工業中心如莫斯科、列甯格勒、羅斯托甫、巴庫及頓諾地。

合作社裏個人所投的股本計自一盧布半至二十盧布，他們的最大困難是在取得供恢復修補之用的充分經費。各社員所付的租金不過是極微小的數目，因此有時他們須以非常的價格出租房屋於新資本家(Nepmen)以解決這個問題。農村銀行和城市銀行在開辦伊始時十分空乏，且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僅舉借三個

月至十二個月的短期高利貸。直到次年有了中央市政府和建築銀行的組織以及專爲補助建築借款的特別政府補助金以後，這情形因之改善。另一原因則是關於「招集，改善生活狀況的基金」和徵收爲這目的而規定的一切營業贏餘的百分之十的法令。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當中這種經費已達到四千五百萬盧布。凡在有特別嚴重的供給房屋危機的地方，必須以這種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五專爲供給房屋之用。

第一個建築合作社已組織於倭羅格達 (Volgda) 附屬於鐵路工場，其他少數成功的計劃亦已在鐵路工人中間不斷地進行。第一次供給房屋的會議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舉行於莫斯科以成立全俄統一的計劃。在一九二四年秋季已經組織供給房屋的合作社十七處，並且舉辦多項企業以幫助利用其私人特權從事建築的工人。在一九二四年十月當我偶然經過北高加索首都頓上羅斯托甫 (Rostov-on-the-Don) 一該地因爲在北高加索佔有經濟的和政治的重要，所以供給房屋的危機特別嚴重，

——竟發現這類首先的工人宿舍。每逢下午五時以後和夜間街路上充滿着本地烟草、毛織物和農具各工廠的工人以及不久以前親作工人的政府僱工。得有一項建築房屋的經費的頓灣礦工代表團忙得各地的農民盡來報告關於土地、稅則、和機器的消息。黑眼睛的哥薩克人（Cossacks）和藍眼睛的斯拉夫人都從俄國的中心。蓄鬚曳長外套、繫精美皮帶、佩着手槍和短劍的高加索人很安閒地昂然大步。沿着馬路盡是工人的俱樂部、花園、運動場和影戲院，處處都是人民擁擠。

後來我走出這街市的邊沿，忽然立在一林表現各時代的建築的新房屋裏面，那裏有許多的鑄鐵聲或鋸木聲，衝破這聲音的更有合節的古歌的深重的人聲。我曾與少數工人交談，他們向我報告大多數工人都感受生活於擁擠情形底下的痛苦，要求工廠管理應實行某些活動，負責以物質作抵提高他們若干年以上的借款，按照工人的薪資規定數目和期限的長短。工人能在這種辦法底下建築他自己的房屋，以利息形式歸還借款，選擇最為貧苦的工人享領此項借款。這些較早的經驗

對於中央集權的社會事業沒有後來的經驗所有的同一計劃，但比工人繼續居住的地窖則又遠較完善。

兩年以後我再又出羅斯托甫，心想找出一林同樣的房屋。從此以後已發生如許多的小工人村落(Райола)，這些以前所見過的村落於今竟一個也不能舉出。我在十月時分一個陰寒的下午隨便選擇了一處並乘馬車前進。我們在形容不出的泥濘中駛行約一英里之遠，經過一處正在進行建築的小工人村落，這村落包括許多長列的堅實的三層房屋，外觀極似美國郊外的粗陋房屋。

我所記着的那個小工人村落沒有像那樣的不中意，這是七十所白泥灰的矮房子合成的，中間留有一些寬廣的街路和空地，中央有少數磚砌的建築。在那天下午的細雨泥濘當中，除去細長的小街和叢林給予我一些行將到來的好境的希望以外，沒有甚麼地方看來是惹目的。

我曾在這裏叩過幾家的門，但未見一人在家，末了一個男孩告訴我說大家俱

在俱樂部裏，並領我到了一所最大的磚砌建築。屋裏呈現一幅共同努力的驚人的景象：屋裏有的在我們進出的那房子的末端的台上完成他們的最後工作，有的則在建築座位，還有一羣婦女正在油漆幕布並用火燄傳送信號。台上一羣莫可名狀的人像似要去預演戲劇一般。導演人用力地大聲叫着詩歌，使其能衝破喧嘩爲人所聞，演員則隨聲和叫。一位頭戴粗大羊皮帽，身穿皮短衣和足着皮靴像似指導建築和演戲的黑髮大漢上前親自介紹他是合作社的主席，並懇懇地要求他能爲我們幫忙的甚麼。我遂表示在參觀少數工人宿舍所得的快感，並另推舉一人代替他的職務，讓他和我們一塊。他說他們可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就完成用他們自己的勞動所建築的俱樂部，並因此節省了經費一半，下星期將可開幕。

我們會參觀幾棟房屋，這些房屋原來的用處是一些營房，於今却得適當地利用。每屋有六個單開間，四間大的邊房，兩間專供單身工人或無子嗣的夫妻住宿的小房在其中每個單。開間均有自來水和理髮沐浴處。單獨的浴室現時俄國尚屬

稀罕，一切重要的浴身均在公共浴室舉行，凡是俄國人都得每一星期在那裏沖洗一次。此外更有供儲藏之用的地窖和外屋。各房屋不一致，有的在牆角上，陳設他們的神像和列甯斯透林的像，有的是設備簡單器具的嶄新的房屋，有的則狼藉嘈雜。

那位合作社的主席坐在他自己的屋裏隔着一把製茶的銅壺向我告訴：他怎樣設法集合了二千萬盧布的資本，這資本是改變那已經開始但未竣工的營房裏無遮蔽的牆壁而為安全的房屋所必要的。

「我原是農業機器廠裏一個有技能的機器師並參加過組合運動。我在每次會議上都提出供給房屋的問題，直到我們自己的同業組合和其他同業組合的大多數滿意於組織一個合作社為止。後來他們叫我拋棄我的職務而充任合作社的主席和經理，我遂不得不十倍艱苦地工作，然而這是值得的。」

他告訴我們那個村落裏現在住人民二千六百五十人，其中六百一十人是合作社的股東。與工人有關係的各種企業已用去了六十萬盧布，同業組合已在幫助，

蘇維埃更提高長期公債所必需的資本的百分之四十。他認為壞的方面就是這企業的高度費用，合計每屋爲原來的營房和加添的建築所支出的數目將達三萬二千盧布，即每一單開間用出五千盧布，約當現時俄國工人宿舍的平均費用兩倍。合作社力求爲工人自身減低房租，即是凡收入高薪自八十五盧布至一百盧布者每二十九英尺僅付二十可比，收入自七十盧布至八十五盧布者每二十九英尺僅付十六可比，由此類推至失業者每二十九英尺僅付五可比。煤、薪、電、水總計僅數盧布，而每月每家的總開支約自五盧布至二十盧布。包有三房一廚房的大單開間多半爲兩家居住，這樣可以減少多餘的費用。但是即算那樣地經濟，而居住於這裏的工人平均每人的地皮等於居住於城市的工人兩倍。電車線已引長至一英里，工廠發給工人的車費，所以絕沒有距離的阻隔。實則天氣晴朗時他們却還時常爲了節省費用而步行，這是一種利益。

合作社主席的妻子是一位狀似害羞的小鼠的婦女，她背向而坐，讓她的丈夫

和我談話，但是當我設法引他加入討論的時候，我纔知道她是一位婦女部的職員，並會組織四百名婦女爲少數定期集會的代表團。她告訴我說：她的企圖是在組織一個公共食堂，可是大多數婦女還沒有達到願意接受這個理想的程度。然而有一個婦女委員會正在努力於注意一般衛生的設備，她們正在討論公共洗衣室。

雖然這村落僅有一年之久，可是他們除去俱樂部之外更有一個合作商店、一個圖書館、一個育兒室、一個幼稚園、一個藥店、和一個施診所。凡屬學齡兒童均進與隣近建築合作社會辦的學校，並有八十五個自二十歲至五十歲的成年人亦正在學習如何讀書寫字。

我在伊凡諾甫考察的那小工人村落甚至更值得贊賞，那裏有成千的毛織物工人居住在城市裏，成千的其他工人每早都由近郊各地相率入城。凡是居住太遠不便逐日來往的人得在別人宿舍的地板上租一寄宿的空地。其中成千的工人在以前空房異常稀少勢不得不時常輪班寄宿的時候曾是這樣地寄宿，於今還有大部份是

這樣寄宿。伊凡諾甫的小工人村落運動極有成效：一天我在該地考察，曾和委託驅入一個村落，該處房屋較大，均係三層樓房，有六個至八個的單開間，上鋪下泥，建築精美。代表有各種樣式的房屋，中間留有很多的空地令人惹目，不僅開或在堅固的莊嚴的屋列中為然。裏面有許多裝置電燈、新式火爐和沐浴理髮處的廣闊的宿舍。這裏每個工人的消費實際上和羅斯托甫小工人村落裏每個工人的消費一樣，但開辦費十分微小，全部費用因能儘快地清付。所以工人除去每月為公共事業而應付的小數外，任何開支均可免除。毛織物工業已着手幫助牠的工人建築房屋的活動，而且現在這已達到戰前的生產的百分之百，正在徵收充足的利潤以保證這種工業。這個小工人村落已經建築，牠的主要的建築公共浴室正在開始工作。她們有一所特別學校，分兩組教授校裏的四百個兒童，那個大的向陽的建築已改為育兒室。工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廚房，但有一部份則同意於合租公共食堂。關於這個他們曾有許多的談論和努力。

因爲工具和借款的缺乏，直到一九二五年大規模的新建築尙未着手，但在一九二五年俄國建築合作社總建築百分之二十五的新房屋。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計成立聯合會一〇六五所，有會員二十萬，本金四百六十萬盧布及公債金三千萬盧布。他們已建築三千棟房屋，包有單開間九千三百五十所，居住人民四萬。這裏面產業工人佔百分之七十。工業區域裏已發生大多數的建築合作社，不過尤以工廠中心比大城市爲多。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們都已選定建築爲個人家庭或僅少數家庭居住的小房屋，正在用各種方法幫助並鼓勵各種形式的社會化，但沒有從上的壓迫。去年已由建築合作社着手普及教育運動以指示組織的方法和形式，並鼓勵各團體儘可能地籌集他們自己的經費。中央合作社供給房屋的聯合會已派組織員下鄉視察，並在莫斯科開辦六個月的特別課程，每次由各合作社送派五十人學習。這個課程包括關於供給房屋的問題的演講，供給房屋合作運動的立法基礎和組織基礎，俄國的經濟地理，決定各區最好的建築材料的各地方的

研究，建築學，市政，衛生，園藝，自來水，瓦斯和電的問題，文化運動以及政治經濟。此外學生更作旅行以直接考察供給房屋的設計。學生每人的費用計為四百盧布，三百盧布取給於派送學生的合作社，其他則取給於中央合作社供給房屋的聯合會。在莫斯科之外某小工人村落裏甚至有一個非常實用的實驗室，那裏他們有特別建築的四種樣式的房屋，均合於節省、耐久、溫暖、衛生和適於居住的觀點。

因有供給房屋的合作社的幫助和舉辦借款的新來源，每棟單開間的平均費用約已減少三百盧布。現在他們還想更加減少，因為除去如在伊凡諾甫工業已幫助最貧苦的工人得首先居住以外，這個數目仍然有些過高，不能使平均報酬低的工人得到供給房屋的合作社的益處。在平常的情形底下每個單開間可以征收約四十盧布的月租，這個月租對於每月六盧布的薪資誠然是一個太大的比例。莫斯科的三房一洗澡場一廚房的普通工人宿舍的建築費約自七千盧布至八千盧布，即每房兩千盧布，這個幾與美國包有一樣多的房間（略為大些）及新式廚房和設備齊全的

浴室的單開間所消費的一數目相同。

現在借款的辦法較從前便利，凡是從前只有高利的短期借款通行的地方，於今都能取得減至二三分利的自二十五年至六十年的長期借款，已達到他們所需要之百分之九十，因此合作社社員僅須準備資本的百分之十。這能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引伸房租和零遷的辦法合於低薪工人的標準。現在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合作社利用牠們自己的社員的勞動以供給建築，這種辦法至少可以減少費用百分之十，而且更有少數合作社能生產牠們自己的土磚。至若對於比普通工人有更多工具的工人，有時更能以原價在供給房屋的合作社裏立即購買一所單開間。

供給房屋的合作社雖在供給房屋的現狀上極佔重要，但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宿舍是其他組織建築的。按照勞工委員斯密特(Smidt)所作的報告，蘇俄建築工人宿舍的經費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一萬二千六百八十萬盧布，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為二萬四千六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預定開

支三萬四千二百五十萬盧布。這個數目可以由中央公共銀行 (Central Communal Bank) 從借款裏取得百分之四十五，可以由政府提充從預算裏取得百分之二十二，可以從「改善生活狀況的基金」裏取得百分之二十，可以從合作社的基金裏取得百分之二十三。因為建築材料的價格增高，沒有如許多的人民能負擔這樣大的經費而得居住在內，因之一九二五年規定的每人一一·四方 arshines (每一 arshine 等於二十九英尺) 的建築工程的標準可以略為減低一點，實則不到一九三一年這個標準就能普及於全人口並成立每人的居地一種滿意的標準。自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人口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七而房屋空地僅增加百分之六以來，蘇聯工業中心裏房屋空地的缺乏估計為六百六十萬方 arshines，超出一九二三年的四百七十萬方 arshines。

在注意供給房屋的問題上我已特別論及合作社運動，因為這在社會組織的問題上極佔重要。供給房屋的合作社並已負擔教育未經在工廠或其他企業裏受過教

育的婦女的任務。這些合作社有一個專門教育部，女同志阿斯忒羅夫斯卡雅（А. А. Астахова）爲其部長，她是一個經歷過多年流放和地下工作的革命者，她最傾心於實現各種樣式的房屋，這些房屋在其本身的意義上即是對於婦女的最小限度的家庭勞役。她告訴我說，合作社正在獎勵供少數家庭應用的建築簡單的房屋，首先設置他們自己的單獨廚房，因爲這是他們所最希望的，但在公共食堂已經組織之後，那些廚房就能轉變爲某些其他用處。她告訴我說，還有許多同志主張一種更公共的形式的生活，但是聰明的同志們則認爲這祇可以一步一步達到，他們應容許個人嗜好的某項機會和自由。

『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工人宿舍像你們在美國的工人宿舍，一切房屋都像豆筴裏的豆粒或都像牢獄，你在那裏將電鈴一按，牆壁裏忽然推出一個個的床鋪，再將電鈴一按就推出了一間設備齊全的廚房。我們只願意你們的便利和你們節省勞動的設計，但是我們更願意在人民居住的地方要有某些愉樂和美術，不僅單是

一種機械的結構而無其他；我們願意建築真正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

阿斯忒羅夫斯卡雅更關心於家具的設備。中央合作社供給房屋的合作會曾派代表一人往赴英德奧考察工人宿舍，並帶回載俄國所不知道的簡便設備的照片返國。他們已督促各家具工廠加工製造專供工人宿舍應用的合宜和精美的家具，這些家具曾經在去年夏季的展覽會裏陳列過。他們的小冊子儘在宣傳那些常見的勞動節省和衛生的設計如煤氣爐、伙食櫃、有蓋垃圾箱和出乎俄國家婦眼界外的種種簡單物件以及紐約住民所知道的比較複雜的各種設計。阿斯忒羅夫斯卡雅同志深以那許多正在遷居新宿舍的工人還丟不開他們的古器——充滿着陳舊的木製的毛織物長椅和笨重的衣櫃爲慮。她對於多半已生效力的簡單家具實行一種經常的宣傳。

合作社正從最簡單的設計着手以使婦女達到她們的專長並提高她們在合作社裏的興趣。首先他們贊成婦女參加合作社的特別優先權，例如允許她們根據按期

攤付的計劃而付費。然後在組織婦女的會議上，他們很聰明的不從政治問題着手而從打擊家庭的事情着手。他們首先就從兒童問題和她們接近，因為他們相信社會化的進程上兒童的看護是社會的主要責任。他們幫助她們組織關於母親和嬰兒，育兒室和幼稚園的會議。此後便是購買和清潔的合作，縫紉和修理的方針，家務和飲食的考察。所有這些問題均歸每個供給房屋的合作社所選舉的文化委員會處理。其他委員會包括委員三人至五人則為政治的經濟的和衛生的。每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合作社的理事的領導底下組織合作社的教育委員會（Cooperative Educational Commission）。在文化和衛生委員會裏常有一種計劃至少要有女委員一半。衛生委員會在衛生部的指導底下實施教育工作，考察浴室廚房等等，實施預防疾病的清潔運動，組織講演，體育夏季休息室等等。不僅按照這些程序引起了婦女的興趣和活動，並更引導她們在文化工作和社會活動上的興趣。在這些團體裏集團合作運動的興趣正漸漸補充且常代替家庭的興趣。家庭仍然是社會的核

心，不過個人的忠順和信仰現在已轉變於一個較大的團體了。

供給房屋的危機，建築費，花園城市都是十分熟知的名詞，現在我們遭到應得着這些名詞。究竟這些各詞在俄國有甚麼分別呢？對於這個問題共有三個答案，這三個答案都在家庭方面和複雜的個人關係與社會關係方面都有一個重要的意義。第一便是可以目見的居住過擠的事實減少了家庭單位裏任何愉樂或舒服的可能，由此發生的苦悶和神經的疲乏喪失了能夠脫離家庭的任何份子所必要的滿足的某些外源，和單由供給如許多方碼的房地的事實所得關於這種困難的偏面的和表面的慰藉。第二便是蘇維埃政府自覺的政策在以集團的利益代替個人的利益，並在由公共努力和享樂的種種形式的發展和轉變原來由個人完成的某些功用於社會以鼓勵團體的熱忱。第三便是努力找出一個適合於不完全的過渡時期的工具，這個時期的本身可以是將來更理想的形式的一種準備，這些形式一待達到，人們就可以最小的破壞使這工具極易適用於新形式。

第十章 母親和嬰兒

雖然蘇維埃俄羅斯既不會使婦女或兒童化為國有，更不會成立柏拉圖共和國的集親關係，可是蘇維埃國家對於兒童却負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更大的責任。兒童的物質給養已由社會保險法規定了某項標準，並由育兒室和學校實施兒童的教育。教育兒童的全部制度的目的不僅在給予兒童本身以更豐富更健全的生命，更在解除母親的看護兒童的勞役並使她能參加公共社會家庭的各種活動。列寧在一九一九年指示女工會談說：

「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本會仍得列入討論；爲欲達到婦女的完全解放並保障她們與男子的真正平等，必須將家內的功用社會化，更應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她。

「我們在此正要討論的問題自然不單是在使婦女關於勞動生產，勞動的時間，總量 and 待遇的地位平等，並在保障婦女不應爲其男子所沒有的家務地位所奴役

。你們都知道現在即算有了充分的平等權利，但婦女仍受壓迫，因為家室的全部負擔還落在她們的肩上。就大多數的情形而論，家內事物都是婦女能作的，最不合理和最艱苦的工作。這是絕對無關係的，沒有包括一點能夠幫助婦女發展的成分。

「爲欲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願意爭取社會主義的充分實現，因此就有一大場工作該爲婦女利用。現在我們正在準備去開拓爲社會主義結構的方域，而且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建設只可以開始在婦女的充分平等已經達到和解脫了瑣屑的建涼的和無益的苦役的婦女與我們共同擔負新工作的時候。這個將來還得令我們忙碌許許多年的年載，否則決沒有偶然的結果或顯著的成效。……」

兒童的看護，食物，洗澡和其他家室的任務這些都是解放婦女的家裏苦役這進程上正在考慮的問題，而兒童的看護更時常首先提及。

俄國關於產母和嬰兒的工作均集中於衛生部的婦孺部，歸勒柏得登博士 (L. A. Bolteva) 處理。凡是到過莫斯科參觀婦孺部的少數考察家莫不頌揚該部的管理。

最顯著的便是庫馬河岸上的大養育研究院 (Palace of Motherhood)：這裏有關於母親和兒童的衛生安甯各問題上的科學的研究和臨症工作，有妨禦疾病和死亡的計劃，有培養醫生、產婆、兒科醫生和看護婦的課程，有模範學校，末了更有美麗的展覽會。這裏的圖表若與其他國家相比，正指出俄國最高的嬰兒死亡率。無數的傳單說明兒童死亡的理由和防禦的方法。無數的標本說明嬰兒發育的每個時期、生育的程序、常態兒童的生長以及疾病和變體的因果。從工廠和農村陸續到來的婦女們都受這養育研究院指導。

俄國最好的藝術家已為這種展覽會繪有美麗的油畫。這裏更陳列着散發全國的傳單的原稿。一張關於鄉村的油畫繪上一長排的母親帶着她們的嬰兒在「婦孺醫院」(Mother and Infants Consultation) 的應接室裏等候。對面貼有許多小條的警語並有一個聖徒故事「醫院人多則墳墓人少。」另一張油畫描寫一個面貌光彩的農婦，一手抱着一個健全的嬰兒，一手拿着一本畫——標題就是：「母親愈

「讓字兒愈健全」。在另一張油畫上有一位裝束美麗行將分娩的農婦，一面挑着一肩過重的木材担子，一面配着男女合組的鄉村跳舞，下面便是她的丈夫溫柔地待遇他的等於牛馬般的孕婦。其他油畫都是為母親寫照的，說明甚麼食物她應該食，甚麼食物她不應食，甚麼食物應該養嬰兒甚麼食物不應養嬰兒，指示蚤、虱、蒼蠅、塵埃以及種種不衛生的環境的危險，說明為甚麼不應使嬰兒受傷像木乃伊般用許多爛布一層一層包裹，嬰兒的手膀不應沿襲農民的風俗緊貼手膀的兩旁。到處都有關於母親哺養她們自己胸前的嬰兒的宣傳。其中最通俗的宣傳描寫一條小牛負氣地望着一個嬰兒在飲一杯牛乳，並問「為何你該飲我母親的乳？」另一張油畫描寫嬰兒的羣衆示威運動：一個作手式的嬰孩在演說，台上高聲講演他們的權利並提出首要的要求：「肅清蒼蠅！」「晒乾洗滌嬰兒的尿布！」「要求我們自己的母乳！」「要求新鮮的空氣和光線！」「擁護產婆，反對不能接生的農婦！」「要求健全的父母！」。

參觀人由此再進育兒室參觀他們的一塵不染的潔淨、他們的新式設備和他們的科學的飼養。並參觀了醫院、牛乳廚房、養兒院、模範產兒院，而模範產兒院就是供應爲住在那裏的母親的一個學校。他們深信蘇俄關於母親嬰兒的保護計劃超出全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的計劃之上。不過他們最後的結論都幾乎一定就是：這些計劃僅是紙上空談，莫斯科之所以匆促建築這類的機關，無非故意鋪揚予外國考察家一點印像，或者更好地說，這是他們可以在很遠的將來更向他處完成甚麼的一種模糊的希望。

他們想要完成這些設施的計劃自然超過他們的能力過遠。工具的缺乏阻礙大部份設施的實現。小城市裏的兒童學校多半是莫斯科模範學校一種淒涼的滑稽的模倣。其實現在尚有許多鄉村甚至還沒有聽到赫魯都這個名詞。

但是我曾到過莫斯科東方的伊凡諾甫，參觀過一個育兒院甚至比我在莫斯科考察的更較優美。更在南方的羅斯托夫和極南方的皮阿提哥斯克 (Piatigorsk) 兒是

厄爾布魯士峯 (Mt. Elbruz) 的雪嶺高聳其中的「五山市」(City of Five Hills) 參觀過同樣優美的育兒室。此外我又參觀了四年以前由圭戈教徒幫助創辦的鄉村育兒室的起源，並聞烏克蘭的工作超過大俄羅斯的工作之上。更知道這些中心計劃怎樣推廣至遠在一千俄里 (Verst) (譯者按每一 Verst 等於六六九英里) 以外的馬斯洛夫克特。

今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聽勒柏得發向婦女部會議上報告應採用激烈的方法以推廣農村裏的育兒室工作。她說在工廠和工業中心裏育兒室工作雖然仍去供求相應的程度尙遠，她們却都正在前進，祇有農婦則仍舊攜帶他們的兒童在日間工作，或則囑咐一個年小的姊妹在家裏看護。

今年十二月我又在馬斯洛夫克特看見中央送達全國的通告，這即是勒柏得發的提議的結果已經發生了效力。阿堪遮 (Archangelskoye) 來的婦女部組織員索寶替拉 (Subbotina) 提議開辦一間夏令育兒室的計劃。去年她曾在馬斯洛夫克特

開辦了第一個育兒室，今年她又計劃再組織兩個育兒室。並已經招集了阿基波夫卡（Archipovka）小村裏一個育兒室的經費。馬斯洛夫卡特地方的農民既然較為窮苦且又十分落後，當然不能希望他們親自從事這許多的建設。但是多半從貧農鄉村裏募來的國家農場工人已在與國家農場管理部訂立的團體合同上規定一個辦法，即按年為育兒室的設立積蓄一定的數目，因之從這來源可有好幾百盧布的收入。鄉村合作社和互助委員會（Mutual Aid Committee）各担保一百盧布。美國兒童委員會（America Childrens' Committee）的代表已承允索賈替發供給一切設備。現在還得徵收微少的附加費以保證育兒室得在夏季繼續開設。

在專為討論這問題所召集的鄉村婦女會議上曾發生劇烈的爭執。三個面貌豐滿裹着寬大頭巾坐在牆角上的老農婦，遇着無論甚麼事情都是搖頭表示反對。

「從前我們並用不着育兒室照顧我們的兒童，為甚麼現在做母親的不應和以前一樣呢？」一個農婦說。

「這無非是令我們納稅的一種計劃，等到稅付好後，他們就可以帶去嬰兒由她們看護。」另一個農婦告知她說。

「他們多半可以取去嬰兒頸上的頸圈，你可看見會讓他們成爲不信上帝的嬰兒！」第三個農婦說。

總之，幾乎凡是年齡較老的婦女都反對育兒室的觀念，年齡較幼的婦女則都贊成這種觀念。一個軍人的寡婦馬羅夕亞 (Marusia)，她的小兒子已在夏天前和她的小從兄弟留在家裏的時候淹死了，要求婦女們爲之援助。

「我不相信育兒室不可以給我們的兒童以好的看護，我曾在別一個鄉村裏親自參觀過一個，那裏的兒童都得很好地飼養而且清潔。——」

牆角上的三個農婦的一個插口說：「是的，剛好就是這樣。我聞聽他們每天要給嬰兒浴身一次；嬰兒們像受這樣地待遇，你怎能希望他們長得強壯呢？」

馬羅夕亞再說：「這種無關緊要，這個總比我的發夕亞 (V. Bog.) 從他的祖母

身旁爬走開了被豬咬掉了一半的事情好些。即令我們自己沒有嬰兒，也應該幫助別人。婦女們要看管嬰兒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她們有了嬰兒都感受馬上就會天喪的痛苦，這又有甚麼好處呢？」

於是牆上的農婦再又怨言訴說：

「是的，如果你的發夕亞已經葬身豬腹，那正是上帝的意志，你決沒有法子反對。馬羅夕亞！你莫要使自己難過，也許這樣更要好些，現在他已經上登天堂，你還有甚麼好悲痛呢？」

年齡較幼的婦女將育兒室的議案通過了，他們同意於親自運動農村人民，籌集必需的附加費，並在三月八日公佈育兒室即在五月十五日開幕。

國家農場的木匠打掃清潔了個時空着的一間農民的小舍，漆白了木器，並作好了小的藍色的搖床、桌、椅。壁上釘着精美的傳單，懸着光彩的幕布，窗上陳設着花。一大羣農民張口望着這些佈置。

有人可以聽着這樣地喊叫：「喂呀！花了這許多錢，費了這許多工程，完全是爲着兒童，這是何等地可惜啊！」

更有人可以聽着這樣地喊叫：「自然，他們何嘗打算讓兒童們相處在像那樣一個清潔的所在？」

起初育兒室的應用收效遲緩。一個被人問她爲甚麼不將她的嬰兒安放在育兒室裏的婦女答說：「我既有一個小的看護婦(аняговица)在家裏，爲甚麼我還要將嬰兒安放在育兒室裏呢？」她所謂的小看護婦就是一個隨處攜帶這嬰兒的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但到後來育兒室竟有供不應求的用處。

於是有一個從城市來的看護學校的專門家呂底亞(Люд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開始負責辦理這種育兒室，並得有三個鄉村的農婦爲她的助手。年老的薩斯察(Сасоха)簡直在她的領導底下沒有看中清潔的必要。當呂底亞說，兒童必須安置在沙箱裏，隔離他們容易在農場裏混入的惡濁所在，或則主張更換污穢衣服的時候，她便

反對說：「可是他們在家裏原和豬畜同遊甚至同睡，爲何現在要做出這樣的大驚小怪呢？」

雖然庫馬(Кума)河的泥水相距較近，可是從水井引來的清水槽却已開辦。

當呂底亞告知薩斯察排去管裏的泥水而引入清水以供每個嬰兒洗身的時候，她便搖着她的頭說：「啊！爲着嬰兒去用那樣的清水這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嗎？假如你能許我在同一盆水裏洗上三四個兒童，這倒不是怎樣不合算的消費。」自然，你若注意農民家裏用的每一滴水都是婦女肩上挑來的，那就不難明白這個觀點了。

呂底亞曾給薩斯察很多塊潔淨的白布去拭嬰兒惡濁的涕液，但是每當呂底亞回轉頭來的時候，就祇見她用她的污穢的內衣在拭嬰兒不潔的面孔。若是呂底亞加以警告，她便辯駁說：「但是呂底亞啊！他們的鼻子惡濁，手巾異常潔淨，怎麼好呢？」

下面正是全國中心的偉大計劃畢竟深入鄉村的一個說明：幾年以前在鄉村裏

簡直一個育兒室也沒有，於今竟除市鎮都會中的長年育兒室之外，更在鄉村中開辦了四千個夏季育兒室，而且這些夏季育兒室在進化的各階段。我從未懷疑這些育兒室還有少數是不衛生的，牠們確實在一般農民的家裏起了幾許改善。衛生部的指示極為詳盡，並使牠們達到一個極高的標準。雖然牠們還只達到農民兒童的一小部份，但却表現一個重要的開始。

在這個工作上所完成的進步非常顯著。我曾記得在饑荒時代祇見無數淒涼的嬰兒院裏充滿着欠安甯的空手的小的黃瘦的嬰兒，更記得在許多搭棚內都充滿着小的屍身，因為他們死得太快，埋坟的人來不及安葬，所以竟有這種現象。但這不過在饑荒時代為然，即令如此，然而那般自己半受飢餓而猶與可怖的衆寡不對的敵人對戰設法救濟萬千兒童的生命的醫生保姆所從事的種種的確是一番英雄事業。因此現時我在參觀許多育兒室——特別是城市中的育兒室以後所得的印象，無非是一些寬大向陽的房屋——屋裏設有幾列有精美蚊帳的搖床，設有溜冰場、水

槽、和柔軟體操課程的遊戲室，以及大的繪色的模型和壁上的圖畫。嬰兒的母親早上帶着他們前去工作，脫下他們在家裏穿着的衣服而放入一個袋裏，然後洗浴再穿上清潔的衣服。臥食遊戲均有定時。母親每日來喂乳兒三次，其他嬰兒則由一個衛生廚房喂養。那裏有一位精通食物的醫生規定每一年齡的適宜食物。下午母親再來將洗淨喂飽因而滿足的嬰兒取回家裏。在自然環境以外更添上許多花樣和顏色當作一種科學，而且經驗告訴他們，即是最衛生的完全環境和科學的看護也不能在兒童的啓蒙智識上而給予關於家庭狀況的各種刺激。牠們的組織和設備與都會市鎮中大多數的育兒室一樣優美，但是僅僅收容需要牠們幫助的母親的四分之一。現時這個數目正在增加。

為欲充分瞭解在母親和嬰兒的保護上已經完成了些甚麼，便須一述簡單的歷史。舊時傳下來的兒童學校的遺產十分稀罕。即令關於婦女保護毫無所謂的沙皇法律已在克倫斯維時代廢除了，然而臨時政府既不會採取實際計劃以解放女工的

地位，更不會成立一個簡單的制度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第一星期裏，第一屆女工大會即召集於彼得格勒以討論養育補助金的問題，到會婦女在五萬人以上。科郎泰之政府對於母權和嬰兒的普遍保護保護的提議成爲這討論的基礎，更有女工親自提出許多附議，因此他們的意志直接反應出最近通過的社會保險法。蘇維埃政府深悉關於保持適當的生產率保證健全的新生命和担保婦女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的健全和強壯的必要，並認定母權爲一種社會的功能和責任。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人壽病保險法 (Be-
green Insurance in Case of Sickness) 便是後來建立關於婦女保護之比較綜合的和詳盡的立法所根據的基礎。這條法律規定一種不從工人工資裏抽取的保險金，並不分性別種族國籍或工作的性質與時間長短而包括全體雇傭工人在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域之裏，末後且推廣至所有使用自己勞動而不剝削別人的工人，並且恰好適用於全體工人妻子和雇傭在工業上的全體婦女。

一切關於母權保護和保險的辦法一面歸科郎泰領導下的社會公安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實施，一面又歸勞工部實施。前者組織必要的機關，並給子女工的物質幫助以減輕母方的責任，後者則實施關於前一章裏已提及的工作標準和勞動保護的法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母權和嬰兒的保護部已經公然組織，一切關於母權保護的機關均歸這部支配。同時新保護部業也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担负以下的任務：

1. 為兒童而救濟母親——關於兒童最好的乳料即是母乳房裏的乳料。
 2. 在一種博聞廣見的气氛中訓練兒童，使適合為社會主義家庭的成員。
 3. 為兒童創造種種環境使成為健全的身心發展和對人生的愉樂態度的基礎。
- 勒柏得發為新保護部的首領，這個新保護部最先隸屬於社會公安委員會，隨後隸屬於勞工部，末了則成為衛生部的一部份。因為自從該部注意至滿三歲的嬰兒以來，其重要點不得不是醫藥的而非社會的，雖然對於勞工部仍有一種密切的

關係存在。

直到一九二二年，該部底下的機關數目仍日經常增加。在一九二二年，因為饑荒的原故，數字尖銳地上升，而在次年，則因俄國危急的情狀必須免除中央政府對於這工作的供給而轉移於地方企業與地方政府，這種機關的數目又頓形低落。

關於母親工作時代為看護兒童的機關和給予指示與醫藥幫助的機關的供給原來的理想國家應負完全責任，因之當着國家再也無能為力時，凡是負責決定那辦法的人們都不敢疏忽，遂乃想出任何可能的供給來源以維持這工作的進行。婦孺部的廣大宣傳已收成效，工廠、商店、衛生部、合作社、互助社、供給房屋合作社、地方政府委員會和婦女部以至全人口中的任何部份均已出資捐助。在一九二六年，鄉村育兒室的經費用出一百三十萬盧布，一半是由鄉村團體和農民自己捐助的，一半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供給的。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各項永

久機關的總數，除去夏令育兒室在外，實際上已達一九二二年所有的數目，並且這個數目現時正在不斷地增加。假如我們包括夏令育室在內，那麼這數目就超過以前的數目遠甚。

我們從下表可以看出增加的數目完全僅在開放的機關方面爲然，長期寄居的機關的數目則大爲低減。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關於無恙兒童的診察所比任何其他樣類的機關爲多，而鄉村診察所與法定診察所和貧母院在最近兩年裏亦已增加。

多數共產黨員認爲兒童的看護應和在革命初期時全人口的貧瘠情形一樣完全地社會化那的哲學雖然成功了大多數長期寄居的機關的組織，但是我們却值得明瞭即在一九二〇年關於母親和嬰兒的安甯的會議上，勒柏得發——一個有長承歷史的共產黨員却曾堅強地擁護可以維持母子間最密切的關係的那種制度。她曾論及育兒院說：

「婦孺都雖已承認保護孤兒和棄兒的必要，却未認定這種機關是有絲毫價值

： 五〇 四七 五〇

： 二九 二七 二八

： 二八 二八 二四

： 三三 二六 三二

： 一八 九二 二二 三二 三三

當孤兒院裏的嬰兒死亡不絕時，婦孺部即決計將他們寄養於私人家庭裏。一九二四年婦孺部曾勸獎奧斯科蘇維埃送派兩百個孤兒和棄兒於慎重選定的私人家庭裏，這些家庭已爲兒童的看護而受政府供給，兒童能在那裏由他們親自看管。首先反對這種計劃爲一個退步辦法的黨部等到在棄兒的死亡率削減一半的事實迫於目前以後，他們遂屈服於新制度之下。從此以後這計劃已應用於許多地方。勒柏得發和我討論這問題的時候說：

「假如在我們的機關裏我們有更好的設備更好的受過訓練的人員，那可就不

同了，但在現在的情形底下家庭對於嬰兒的發展比孤兒院能供獻較能啓發的環境。由此我們不僅減少了嬰兒的死亡率，並已保證大多數嬰兒的適當發展，因為就一般情形而論，受孤兒院訓練的嬰兒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落後的。」

勒柏得發更告知我說，自從國內戰爭以來，棄兒的數目已大為低減。從前單在莫斯科，每年約得兩千個棄兒，但是現在蘇聯全境僅祇有這個數目。

我有幾分被共產黨員婦女部組織員和行將建築而看謹完全脫離父母的嬰兒的美麗的嬰兒院陸續爲我描寫的景象和婦孺部的實際政策中間的差別所難倒了。我問勒柏得發博士說，她將怎樣確定這問題上的公開態度。

她解釋說：「蘇維埃政府正傾全力於注意母親和大小兒童的衛生與青年人的社會教育，這些任務由衛生教育兩部分担，不過保全他們的健康的問題得首先提及，如其必要，甯爲此而犧牲社會教育的原則。現在集團教育的原則僅能部份地應用，第一因爲經費缺乏，第二因爲社會教育的方法未曾適當地規定，第三因爲

人民的性質和心理還不適於集團的訓練。因此我們應使用而且將繼續使用在實際應用上確於兒童是最好的方法。」

勒柏得發認定診察所的發展是她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從蘇俄傳下來的少數診察所僅供嬰兒的看護，未曾包括胎期在裏。沒有規定家庭裏的幫助，並且未曾實施教育工作，然而現在牠們正已按照德美最適合的機關而發展了。最好的機關均有牠們自己的牛乳場，並給予需要食糧的人們以補足的食糧。牠們照顧母親和兒童從受胎時期起直到三歲為止。牠們有講演會、圖書館、展覽會。其中少數已規定關於特別團體的精密工作，從事等於美國社會機關的治病工作的檢查以爲實施防禦工作的初步。女代表與牠們一同工作，居於受過訓練的社會工人的地位而活動。診病看護婦的觀念大體已經承認，但距達到美國的那種工作的水平線尚遠。我們值得注意俄國已漸認識「社會工人」是實施其計劃的一個重要要素。衛生部長舍馬士可 (Semashko) 在一篇新近的講演上敘述

他所確定爲「社會要素有害於衛生的影響的研究和消滅這些要素的方法」的社會衛生已在一九二二年開始實施於醫科大學了。他說明俄國饑荒是對於一切有害的社會要素的消滅的唯一障礙，並說明醫生已確實地變成爲社會工人了。

在馬斯諾夫喀特鄉村裏，他們的目的是在使診療所成爲社會中心，在給予婦女以養育嬰兒以外其他問題上的指示並教育衛生原則等。在其他鄉村中也是一樣，女代表考察家庭，並造成母親和診療所間的連繫以替代考察看護婦的服務。未經組織個別診療所的地方常得在鄉村醫院或施藥局裏規定若干日期專供母親攜帶嬰兒前來診視。鄉村醫生——多數是婦女對於這個工作成就了一種卓越的供獻，當自由給予過多的時間以幫助這工作的發展。但須醫生或看護婦去鄉村診治，這實非常的困難，而且在醫藥職業上雖然有人失業，但仍有許多鄉村沒有醫藥的幫助。

關於社會保險，法律雖已提及，但是這種保險仍然僅包括產業的職員的和高等職業的工人以及農業勞動者在內，仍舊沒有關於農婦的保險。雖然蘇維埃政府

從來認定現存的社會保險法是最後的，但不能在現在相應前進。婦孺部正計劃鄉村中互助保險團 (Mutual Insurance Organization) 的組織以幫助填補這個缺陷，由此農婦得以極少數的支持——按着年齡和生育兒童的可能而不同——而能保證其生活。但我尚未發現這運動有若何的進步。社會救濟會議 (Council of Social Help) 已在婦孺部底下很普遍地組織了。牠們的職務是在籌集經費以幫助不會享受合法形式的保險的窮困母親。

重要的統計是已經完成的一切最好的索引，俄國的統計雖和其他統計一樣的虛偽，然而自從革命以來，至少在比較大的城市裏嬰兒死亡率幾乎削減了一半的說法却可憑合理的條件相信。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婦孺部第三次大會上米采羅夫斯基 (Michailovsky) 說，婚姻和生產的數目減少，死亡的數目增加。大戰之後三四年婚姻數目和死亡率均有一些增加，隨後生產率降落。歐洲在大戰以來都曾經過這個輪迴，然而俄國却

和其他國家相反，生產率並未降落。在一九二〇年俄國的婚姻數目一倍於戰前的數目。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婚姻數目降達戰前的水平戰，僅佔全人口千分之八，而生產的數目略較戰前的水平線為低。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每千人中有十三件婚姻，這數目直到現在尚保持其平均數。雖然剛在離婚法頒佈之後若干年當中，俄國有非常多的離婚數目，可是現在離婚數目僅佔婚姻數目百分之五六。（另一統計則認為最大限度為百分之十。）

戰前歐洲俄羅斯的生產率為千分之四三八，這個比例在一九二三年降低為千分之四二五，在一九二五年又高達千分之四三〇。從此以後，嬰兒的死亡雖已大為減少，生產率則按照超過戰前結婚夫婦的實在數目而增加。在一九二五年莫斯科有一千個女工提出這個問題，即是，在一九一七年嬰孩的死亡原為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五年已減低為百分之十七了。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關於全俄的正確統計可據，全國各地的調查也只指出同樣的敘述。歐洲俄羅斯在大戰以前（一九

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人口的自然生長爲住民的千分之一六五，而在一九二五年已達千分之二〇一。根據米采羅夫斯基博士的意見，這個生產率的增加和死亡的低減全是因爲未再參加大戰的原故。

在婦孺部的監督底下雖未直接提出生育節制和墮胎的問題，可是該部深以這些問題的解決爲念，且因他們在母權問題上有一種重要的關係，須得在此作一簡單的敘述。

俄國立法上允許墮胎的事實常被誤會爲已受政府的獎勵，其實墮胎的增加正是在醫藥職業和政府機關上最大惶恐的原因。我曾在莫斯科各書店裏取得七本由婦孺部衛生部和國家印刷所出版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雖然充分解釋關於墮胎和可以在實行墮胎手術的情形的法律，但都指出即在最適合的情形底下尚有傷害的可能，提出關於墮胎以後的死亡和疾病的統計，並勸告婦女不應依賴墮胎，除非遇有極端必要的情形——在生活因有嬰兒而必然感受危險的時候，在她或她的丈

夫犯病可以危害嬰兒的健康的時候，或則在她的經濟情形太壞不能贍養嬰兒的時候。這已詳盡地說明：允許墮胎的唯一理由是在滅亡由非法地和無知地實行的墮胎所釀成的死亡和疾病並保證最少可能的危險。

反對墮胎的宣傳不止限於文字，更有普遍開演的電影指示墮胎的罪惡，不啻給予關於生育的整個程序的教習，而婦女都則並發表組織關於產婆和其他不法墮胎的形式訴訟。任何產婆或醫生遇有違法情事，必須處以儘多的罰金。現在尙有一個產婆關在隣鄉的牢獄裏，因為她在前年施行過一次墮胎。新近莫斯科各報載有一格哥特里布（Gottlieb）醫生的案件，他是一個著名且大受尊敬的醫生，彼因一個病人身死，發現他在家裏爲着自己的利益並在不合衛生的情形底下施行了墮胎的手術。原告辯護人要求法庭判處被告徒刑五年並剝奪行醫權五年。

婦孺部的賈斯（Gans）博士多半在這問題上比任何人都有更深的研究，並已在各種團體中實施精密的考察，力求找出其原因。他告訴我說，雖然無疑地俄國現

在有比革命以前更多的墮胎，墮胎的數目仍在增高，但是這個增高却不如那般依舊主張禁制的法令的人所口稱的浩大。因為從沒有登記，必然只有一部份合於較確的統計的事實。所謂合法的墮胎上的增加不必就是墮胎的總數上的增加，因為大多數婦女認能夠實施適當的墮胎僅有很少數使用舊的方法，因之祕密墮胎的數目便逐年減少。雖然在墮胎的絕對的數目上每年均有些小增加，但墮胎與生產的比例却有一點低減。例如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每二萬一千次生產中共有墮胎七千次，而在一九二六年則每四萬次生產中僅有墮胎一萬一千次。根據莫斯博士的意見，嬰兒死亡和棄兒數目的減低，也必大半歸因於墮胎的認可。大多數墮胎發生於城市中；因為農婦的無知識和便利的欠缺，鄉村中的墮胎百分之五十或六十仍然是非法的，而且只有很少數無調的婦女實施過墮胎。城市中大多數墮胎的婦女都在二十和三十歲之間，僅有一個兒童，鄉村中大多數墮胎的婦女則在三十歲和四十歲之間，有三個以上的兒童。總之，解釋大多數墮胎的理由第一便是由於物

質的需要或大家庭，其次是醫藥的原因，其次是饑生學和未婚婦女的羞恥那許多原因，羞恥的原因在鄉村中較在城市中影響更甚。更有少數人則以為現在婚姻關係的不穩定也是一個原因。莫斯博士相信大多數墮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給房屋的危機，因為許多犯着墮胎的都是三四人以上住在一房裏的婦女。

婦孺部承認他們的經常計劃和教育工作的發展是防止將來那樣大規模墮落的繼續的最好保障。勒柏得發和奧斯都邁着抵抗這種罪惡而找出某項直接的實施法令的問題，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母權和嬰兒大會的報告上主張節育方法的推廣是惟一防止墮胎的方法，經過這種方法墮胎就能抑制。

幾年以前，當我初次到達俄國的時候，我大為這問題上明顯的公開態度所困那，時的確沒有抑制。城市中橡皮組合社的醫店陳列種種避孕的設計並發佈許多印刷的指令。這個自然對於鄉村人民甚至對那昧於自己的生存和過於貧苦不能購買必需品的大部份城市人民都沒有絲毫用處。我枉想在那時候找出這問題上一定

的公開態度，衛生部和政府的職員也似乎不顧視自去幹這種工作。消極的態度一半可以由這個事實解釋，即是，因為西方各國大多數節育的宣傳所用的論調，大多數共產黨員認為節育是資產階級醫治社會主義裏不能存在的社會罪惡的高應藥。他們是從種族的有意識的限制的觀點而不是從允許婦女為自己選擇她們所願意生產無窮盡的兒輩觀點曲解這個問題。

自然共產黨員從未認定那種貧困是起於充分的食物供給的物質來源的缺乏，而是由於他們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和在現代社會制度底下這些東西大部份僅為少數人利用的事實。俄國從來以人口過多的問題為念，反而有發生人口的大量增加的可能。他們既知道俄國是唯一的共產主義國家，四面被仇視的國家包圍，自然毫不奇怪他們在實行可以達到人口的減少的任何法令上應該慎重。末了，在避免孕法的知識和運用上俄國遠較西方諸國落後，且在好久以前各國已廢除了的方法俄國仍在採用。這個在人口方面的大愚昧無異就是多數婦女對於她們所能找

出的方法——很少有滿意的結果，反而常有危害的結果——表示絕望。這個愚昧已發生這多數人相信的意見，即是，沒有方法是正確的，全部都是損害的。

然而所有這些反對之論現正漸漸消滅，並且現在對於這問題的態度與四年前的態度非常不同。政府的第一步計劃已着手於一九二三年婦孺部第二次會議時雖未贊成節育是那樣一回事，但已認可組織一個委員會以研究一切現成的方法，製定新方法，並受人稱揚。那年秋季利維 (Levy) 博士——克虜伯斯開雅 (Krupkova) 產科醫院主任醫生和委員會委員，——出版一本用句慎重的小冊子，敘述委員會正在研究的各種方法，全不受人稱頌。次年夏季，該部在列甯格勒的大會認可受醫生准許的某項方法的使用，雖然在國家和社會的利益上非難節育的理論。在一九二五年大會上該部竟採取公開的行動，經過許多討論同意節育學校的傳播是廢除墮胎的一種方法。

委員會仍在力求實現堪稱爲百分可靠的方法，有些醫生正在用接種方法實驗

除性動物以防止懷孕，並稱能由此產生從六個月至一年半的殺菌法，絕不防害以後生育子嗣的可能。約在去年，衛生部已出版幾種公開的小冊子詳細敘述一切現成的方法，而這類的宣傳品隨處都能買到。

第十一章 民食

假如照列甫所說「每個廚丁都得學習去參政」，那就多少明白不得不完成她的其他職務。因為婦女既常常於工廠或辦公室有一種職業之外，更又置身於烹飪和洗濯繡縫和兒童的看護，很少剩有氣力和精神去參加政治。等到家庭尚可相處，兒童有了看護之後，第二個問題便是轉變給養家庭的功能為給養社會的功能的問題。

羣衆給食是革命以後當着金錢已經廢除人民須發每日口糧的時候直接到來的首要問題之一。關於食物的分配的唯一工具便是合作社，更有一個特別食物委員會已經組織以處理這種現狀。合作社組織了無數的食堂，一時在該處用膳的多至三百萬人。但是這些食堂管理惡劣，且當食物危機在國內戰爭時代增長至那樣可怕的程度時，多數食堂不得不倒閉。在那時候，公共會食極形混亂，僅有黑麵包

和代湯的油水，僅給我們一種可怕的記憶，這種記憶遠得有若干年的宣傳和示威運動才可以消去。

在一九二一年春季召集全俄食物大會開始討論按照普通計劃組織公共會食的問題，這次大會決定爲適合新的社會形式計，烹飪和會食的任务必須根據新的基礎而組織。消費合作社已在組織全俄公共食堂的普遍組織，這些公共食堂遂令各家庭離棄了私人的食堂。後來饑荒到來，而該當從事於建設組織的努力便乃用於應付建立食物站以維持人民生存的非常需要。不到一九二三年這問題再又發生。鐵路首先發難，提出鐵路工人食堂的要求。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人民食堂(Рапи)經已組織，其目的並在牠的規章上載明爲：「組織模範企業並以借款生產和設備幫助一切合作社和社會機關，宣傳公共會食的觀念並給予關於那種企業的組織的指示，開辦麵包罐頭和玻璃的工廠，設置關於生產的交通，並開辦全俄的分部。」

人民食堂已招足百盧布的股票一千股，均由各種工業組織合作社和同業組合

所取有，並在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從一百萬盧布的基金開始活動。至一九二六年終，已組織食堂五〇八處，每日可容食客四十七萬八千人。總計全蘇聯共有公共食堂一千二百三十處，均係由政府和合作機關根據這個基礎所組織以反對私人經營的菜館。工人用午膳的平均開支常分二十可比三十可比和四十可比三種。有些食堂僅能負擔給予大家的高價膳食，並單對於工人和會員打特別的折扣。直到去年，他們也注意到學校中附膳的問題，因為已經醫藥視察部證明城市中大部份兒童都調養不足。現在已開辦附屬於學校的許多食堂，兒童得在那裏取得熱的午膳。由人民食堂的提倡，更在莫斯科開設學生食堂，每日供給熱的午膳五萬九千人，每人三十五可比。

公共食堂既已十分引起了單身工人的注意，而各家庭也漸漸開始加入。但一九二六年春季在莫斯科視察這種現狀的農工視察委員會指出那些情形仍然極不滿足，因為僅有工人的百分之十一和全人口的五又二分之一是經常的主顧。農工視

滿委員會認為所以僅有小部分工人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共食堂不能確實容納如許多的工人；他們還不能夠削去家庭膳食的開消，牠們的價格有時高至五十可比；多數食堂設備不齊，且不衛生，環境又不快意。多數食堂簡直替代了舊的菜館和茶室的地位，並由不充足的設備繼續了從前無效的和惡濁的方法。在莫斯科僅止六個食堂已有食物準備的機器製造方法，大多數的工人食堂仍然不敷應用。

關於這運動的遲慢進步的另一理由即是多數俄國婦女十分不願拋棄她們自己的灶爐雖然那是奴役的表號。這個不願遂成了一塊礁石，在這礁石上許多的公共經驗都已撞破。現在我們已經明瞭要在俄國的美國人農場裏採用關於家庭組織比較有效的方法的確非常困難。美國人民已領取一棟巨大的房屋，已組織一個視為當然的公共廚房食堂和家庭用務，已改造房屋使合於這個目的，並已補充一個夠用的集中的廚房。後來因要轉讓這個房屋於俄國人民，以為他們可以滿意於這個機會過更經濟的生活，美國人民遂有遷移的必要。然而起初沒有俄國人移入，後

來纔有幾個家庭強而移入，且在一星期裏已有兩個家庭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裏建築了龐大的俄國爐灶，而其他家庭的婦女則正擁擠在廚房裏將個別的膳食帶回她們自己家裏。

我在莫斯科人民食堂的總辦公室裏發現那位能夠讀說少許英文的主席微楞欽（Vilenskin）正在努力地翻譯根據大戰時飼養成千的船廠工人的豐富經驗的臨時船舶合作社的報告。

他對我說：「請你留意！你不能給我一些關於美國工人的飼養和你們成團的食堂的宣傳品嗎？那裏沒有關於兒童菜館所印刷的東西麼？你們在那裏一定有許多多的方法可以給我們在這裏很好地應用。」他領我到了一間設備精美的實驗室裏，幾個繫着潔白帷裙的工人正在忙作卡片、實驗管和表尺。

他說：「我們在這裏實驗供給各食堂的日糧。他們逐日先將他們的菜單樣品送給我們，然後化驗其食品的配合，溫素的功效和清潔與否。我們根據化驗的結

果再又對於食單的大部變更發出種種通告，並派我們的視察員經常視察各食堂以保證各食堂盡得依照我們的通告，又復強行我們的衛生原則。」

他走入食廚裏取去一抱小冊子，上面滿載關於標準熱量、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圖表。

他說：「俄國在過去很少注意食物的性質。我們曾有一句說話「肚子是沒有眼鏡的，盛在肚裏的東西不能被牠看見」。麵包和湯是我們的主要食物，維他命的重要已略為懂得，特別重要的即是我們在這些節省的年間以後應樹立我們人民的健康，這個只能由組織完善的廚房和食堂用科學方法才可以完成。因為食物缺乏過甚，以致大多數工人須在家庭裏過活，我們便不得不給予他們一些足能令其脫離舊習慣的東西，不過這樣的事情我們還沒有完成。另一個重要的要素便是工人所食的甚麼在生產上有必然的影響。我們的考察證明俄國工人的生產所以遠較其他國家的生產為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食物。」

人民食堂已組織一個科學的食物會議 (Scientific Food Council)，這個會議已從營養和滋味，購買儲藏和製作的方法，與各種樣式的工作有關的食單和標準，製作的衛生方法，食堂的樣式和裝置廚房與其他房間的方法的細目，以及輸流的使用和羣衆會食問題上之科學的與專門的材料編輯出版等點觀而達到食物生產最合理性的用處。

因爲訓練適當的人員的缺乏，人民食堂已與莫斯科大學商定開辦一門關於食物科目當着生物系的一部。這個實驗已經十分滿圓，凡是正在學習這個科目的學生都在夏月從事於實際工作。此外人民食堂更開辦牠自己的科目，包括衛生學、食物生理學、勞動保護、應急療治、微菌學、簿記、社會飼養的經濟和技術、公共食堂、廚房的組織和管理、貯蓄和烹飪。

人民食堂的工作不止限於這問題的科學的和技術的方面，並已認識用食的環境可以影響食物的消化，和環境越舒服間靜，離開家庭來取食的男女也越踴躍的

事實。人民食堂有一個特別的文化部歸一個共產黨員梅諾發領導。她的任務是在撰作小冊子和通告，組織並經常提醒公共會食的社會利益。爲達這個目的，人民食堂更獎勵並幫助附設於公共食堂且設有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室或俱樂部。公認牆壁應懸掛宣傳性質和美術性質的傳單標語，應舉行特別的展覽。更有講演、電影、音樂會和課程附設於圖書館。壁報風行由食者與工作人員共同投稿，並已組織食堂通訊團體。主張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以煽動其他工人變成食堂的，主顧並有一個黑版傳達號外新聞。莫斯科的模範人民食堂正實行這些活動的大半，其他食堂則相差尙遠，或竟全無活動。

至若是否已設有廚房的單獨食堂就是最滿意的形式，抑還是分送現成食物於各分立食堂的中央工廠廚房纔爲最滿意的形式，現時正在進行討論。這兩種方式都在設法實施。人民宿舍的獎品展覽會便是伊凡諾浦的工廠廚房。在有萬千工人集中於一地的大織物中心裏，公認要使每個工廠都建築單獨的食堂殊屬太不經濟

。因之計有十七個地方的工業團體和社會團體已聯合一致並已籌集了關於修補並設備一大建築以達到其目的所必要的四十萬盧布。

大的廚房閃爍着洗滌蔬菜及碾碎食肉的希罕機器。僅僅雇用兩個工人以供三百六十鎊以上的蔬菜的製作，一個掌廚能夠照顧五個大的汽鍋，同時並做其他的工作。惡濁的碗具則由朝着食堂的窗口拋入一間接近的小房裏，那裏裝有洗碗機器。一個女人担任一項職務，成百的婦女都可以單獨地工作。廚房空氣流通，光線充足，而且非常清爽，毫沒有油膩氣味和嘈雜。廚房的旁邊有一些設有專為廚丁和助手用的熱冷水管的特別房間。

每日為四萬八千至五萬的食客的準備，只需廚丁九人和廚房工人二十人花費八小時的工夫，即每一廚丁合食客九百三十人，與普通的人民食堂每一廚丁合食客兩百人相差遠甚。附屬於工廠廚房的總廚房每日供給膳食兩千次以上。其他食堂則用蒸熱器分送食物於各工廠廚房。現在正為這個目的使用從德國進口的特別

鍋爐。因為在移換時僅僅降低五度，所以放在鍋爐裏的食物的熱度應在九十五度，並由實驗證明在這些鍋裏盛二三小時的食物僅降低熱度八度至十度。不過這種盛熱器仍然不能完全滿足，因之他們現時正在實驗由一個俄國工程師所發明的一種盛熱器。假如這種盛熱器是合格的，那麼在俄國現在就正可以大批製造，今年他們又為俄國生產改用了外國的番芋洗濯器。不過因為蘇維埃工業還沒有充分發展以出產所需用的一切設備，人民食堂不得已在國外訂購五百個以上的盛熱器，並已專用二十萬盧布購置關於工廠廚房的設備。

伊凡諾甫的工廠廚房供給二十可比，三十可比和四十可比的膳食。我曾在一間分立的食堂裏食過一頓寶貴的飯食。起先是爽口的 *Beefsteak*，然後是蓋着許多肉汁和搗碎的番芋在盛熱器外走着熱汽的一份豐滿的肉，同時並有茶和黑麵包。環境十分簡單，僅有少數關於裝演的設置和為四五個人用的小棹，桌上鋪着油布，每個食者食過以後都注意地拭淨。食者領取自己的刀叉湯匙，囑咐櫃台老板，然

後親自帶着食單坐在棹上。末了給你一張賬單，你就將賬目和同原數的刀叉湯匙交還。

這個工廠廚房開設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在是年四月裏計容食客六四、七二八人。至是年十月，計容食客十五萬人。次年食客兩倍。雖然關於這個經營已耗費約五十萬盧布，但在兩年裏他們已能積蓄六萬盧布的零還資本，並以紅利一萬盧布專供發展之用。在下諾弗哥羅(Nijni-Novgorod)地方亦已開辦一個同樣的工廠廚房，其他工廠廚房已在頓灣和得尼普爾倍特老斯克(Dnieperpetrovsk)地方開始進行。經驗已從取得食物、減低高價、改善衛生情形和工人情形以及使歷程機器化的觀點充分證明工廠廚房最合於個人食堂裏全部食物的準備。

一九二七年二月召集人民食堂大會於莫斯科，嚴密地指出他們的工作的缺點，並且決定特別努力以降低等級並減廉價格，因為現在俄國工人工資的半數完全用於食物。

第十二章 未來社會的建設

凡是俄國新生活方法正在形成的地方，家庭單位就無疑地逐漸縮小並減少了在社會上的重要，而家庭單位所不得不用以完成豐富的社會生活和教育生活的團體正取得其地位，無限地擴大過去束縛婦女世界的界限。現在家庭的重要僅是因其結合的安定是為將來人民的生產和訓練所必要。若問家庭可以維持其現存功用至若何年月，那就完全靠着俄國能否保證自己足以轉變其功用以為斷。

家庭既已由此併合成為團體，於是第二個問題便是個人可否由這個轉變而進步，和正在俄國發展的團體可否比舊有的家族有更多供獻。這正是注意俄國生活的各方面，因為團體原與各方面都相關連。不過單從某人在現時所觀察的情景來判斷，這還不夠，凡是在過去和新近的歷史上造成那種情景的因素都須注意，因之凡這一切，俄國現時都正在計劃。

蘇維埃政府正在採取這個綱領，由這綱領就可實行採用社會歷程和生產歷程上有計劃的組織以保證社會每個份子的安甯和平均發展。土地私有權的廢除，天然資源和工業的國有，單一的經濟組織，工業和農業的密切關係與乎他們的鄉村仍然是原始的和未開化的現狀遂給予俄國以其他國家所未有過的一個機會以確定其經濟的和社會的結構之將來發展的路徑。

國家建設委員會 (Gosplan) 即是實現這種機會的一個工具，因此牠的主要任務就是各種工業的互相關聯和以圖防止別一方面的犧牲供這一方面的發展。但是國家建設委員會也正在未來社會的發展上逐漸佔有重要的地位。國家建設委員會既已注意這個問題，並明知社會的相互關係和社會在工業農業交通上的倚賴，遂乃不得不採取分區建設的計劃。這不僅是利用偉大的水力生電計劃，接近原料的工廠和商品的合理化，並且漸次廢除雇傭數百萬人民沒有適宜的和衛生的生活情形，充足的食物和自來水，和通常的家庭生活或任何其他生活所應有的空間和時間

的可能的大工業危險，且又是混合工作和教育與乎城市和鄉村中的最好要素之一種社會新形態的發展。

現時他們備在這一計劃的開始，各市鎮都會和新社會裏大多數建築的進行毫無有一點應付直接需要的計劃。他們所以受着阻碍，不僅由於工具的缺乏，且也由於其本身組織裏的官僚文章和繁冗制度、無用和複雜、與乎應用完全不同情於新制度的舊工程師和專門家的必要。他們爲了應付這個危機正在開始打破或則急速從事，或則且用一種較爲持久的方法這二者間的選擇的困難。這個特別是在建築的情形上爲然，凡是在建築上面關於廉價的暫時建築和可以適合於將來的社會組織之比較經久耐火的建築這二者間的選擇，莫不常常取決於前者。他們正在拚命去節省浪費。但是關於俄國改善的必要的實現却往往是「以待將來」的說法。

幾年以前在分區建設的指導上實施的第一步即是全國的重新劃分，這個劃分乃係根據經濟的特徵，而非根據從前確定政府的行政單位所任意決定的地理的劃

分。後來他們明白正在進行建築所採用的胡亂方法，於是遂在國家建設委員會底下組織了一個建築標準局 (Bureau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Building)，並指出建築綱領上所感受的困難不是由於太沒有計劃而是由於太多計劃。因此在三年之裏單在莫斯科就裁減了五千個工人宿舍的單獨計劃，並十分同樣地節省了費在這上面的時間和勞力，因為在建設簡單的工人宿舍上面對於他們任意使用的工具沒有多大選擇的困難。但是有些不同的組織已經忙於這類的爭競。於是國家建設委員會遂召集一個大會，邀請到會的不僅是注意房屋供給的團體，並有國家經濟最高會議（工業委員會）農業部及鐵路水路的代表。

大會大半討論關於建築和市鎮都會的建設的純工藝問題，顯明的事實就是發言人相繼主張，他們再不能限制其計劃於單個的宿舍，那些計劃不僅必須適合於全個地段，並須適合於全個區域，調和所有助成一區域的進化的一切要素。

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裏面雖有少數人認為能夠完成全國的標準計劃，而別人則

根據俄國各地氣候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條件的差異認為標準計劃完全不能完成。只有關於某些空間、光線、空氣、和衛生等等的普遍標準共同認為可以根據已有的經驗實施於莫斯科，結果國家建設委員會不顧那許多根據地方情形所實施並改變的材料和方法為何，曾發佈了許多關於新社會的計劃和建築的臨時通告，這些通告遂引起了關於新社會建築圖案的一種預先審查，由工程師、醫生、農業家和建築家各一人參加。所有土壤和氣候的特徵衛生情形和與環境的關係必須在製作任何計劃確定良好飲水的用處和肅清病源以前加以考慮。更須例舉的即是，每個這樣的社會至少應有一個大的公共運動場和一個會場，並有許多街區公共花園和公園等豐富的設備，至少應有十分之一的地面用作草地，並須專為每五十個兒童供給一所遊戲場。房屋所佔地面不得超過全市面四分之一，並須恰好按照通行隨意的制度（Open System）而建築。假如任何房屋是牆壁相連而建築的，那麼凡有十六個單開間的房屋不得多過四棟。房屋不得高過三層樓，且不得高過街道的寬

度十分之九。房屋的建築應該是這樣的：即是保證同居人充分的溫度光線和空氣，並不得被其他房屋而隔斷這些要素。有關於房式大小和防火的章程與關於傾倒垃圾的詳細指示。更有許多通告主張保存天然景緻或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現已結識三種類式的房屋，即是有個別家具的單獨宿舍，有公共家具的房屋或供單身居住的公共房屋專供行政文化和衛生之用的公立建築均認為不可或缺。

莫斯科省正在按照建設的計劃而進行未已，莫斯科蘇維埃認為該省的一切建築必須符合一定的計劃和法則，並發佈關於莫斯科全省新城市和鄉村的建築的詳盡指示，與乎關於按照這個計劃而改善現存的城市和鄉村的設計。已有一個特別委員會製定關於莫斯科的種種設計，——舊建築物拆倒之後街道逐漸推廣，但得保存一切有歷史意義和固有意義或美術的建築和所在。關於增加公共利用的計劃固可以增加機器製造，但也從事於公共區域的擴大和公園林蔭公路的開展的準備。全市劃分，以中心供商業和行政的機關及旅館之用，以其餘一部份供分區機關

及醫藥的科學的和教育的建築之用。因為莫斯科的近郊堪稱是一個模範的俄國鄉村並沒有許多偉大建築，那麼這個區域却可最易實現所指示的設計。現已預定改換這個區域為莫斯科市最合適的區域，並更促進一切工業的經營。

國家建設委員會並也製定關於全俄城市建設的主要設計，關於這個設計的設計書云：「每個城市必有一個計劃以達到在經濟衛生和教育諸條件上之最完全的建設為其目的。」這個設計包括關於以達到改進的觀點詳盡考察現存城市的指示和關於建築新城市的指示。凡與環境有密切的經濟關係教育關係或其他關係的地方，必須定有一個分區的計劃。

只能在那種新社會的基礎上和新社會的計劃可以發展的時候，未來家庭的確實形式纔可以決定。生活應這樣地組織，人民可以為自己規定他們願意怎樣地去生活，而不是他們的生活方法須受經濟條件的強迫。現在的混亂生活已打破了少數家庭，這是由於這種生活加於家庭上面的勉強的和緊張的情形所致。至若其他

尚在勉強相安的家庭僅是因爲牠們不能在別處找到所在所致。當着現在供給房屋的危機已經解決和社會的新形式已經發展，那麼凡是願意團結的家庭就可的強在合宜的情形底下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實行團結，而其他家庭也決不致受經濟的或社會的強迫繼續那種謬誤的和不堪的現狀。少數家庭多半可以在未來的若干年保持家庭組織的舊形式，雖就現在的趨勢而論，逐漸加多的家庭不願意形成那種種結約的羈絆，而願意以從前專花在家務上的時間而花之於社會活動。

國家建設委員會以外的其他團體和個人盡都十分注意於建設問題。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主筆曾在評論過度擁擠的危險上指出關於房屋的建築和自來水的新來源的開設等計劃簡直都是可緩的事情，目前祇須管理人口本身的流動。那位主筆說：『所謂有計劃的處理不是一種應急的特別火速的方法，而是須得經過一個長期纔能實行的一種思慮周密的制度。這個制度必然消除大城市的迅速發生的原因。』

於是著者指出某些已經着手的運動可以從吸引現在流動於城市裏約當戰前兩倍的剩餘勞動力來幫助解決這個現象。在這些運動當中計有鄉村裏新式農具和精密的耕作方法的採用，器具和機械的分配（由此可使農民在有土地可以利用的區域裏耕種較多的土地），農業收穫物的製造，鄉村裏某些家庭工業的發展，新的地面的開墾（據說蘇聯約有四分之一以上適於耕種的土地已在開墾），和人口稀少區域的拓殖。

但據著者的意思，更為重要的要素就是工業的分權制。工業雖已大半集中於大城市和某些區域，但在將來牠們必然發展到較小的市鎮都會甚至鄉區裏去。他的結論說：「這個遂使我們按照俄國整個的經濟結構的利益而注意於蘇聯全境工業分配的問題」。關於地方工業的發展的需要俄國曾有很多的討論，并為國家農場上農業生產的製造定有着手經營的步驟。

另一個重要的要素即是按照一個一定的計劃進行拓殖的事業。在俄國當着土

地歉收收穫不利驅使農民離開其家庭的時候，常有從這一地至別一地的農民流徙。少數流徙歸政府處理，但未按照計劃，僅在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多數流徙則由農民自動，個人地或成團地離開他們的本鄉，乘着馬車飄流在外，直到他們找到安身的所在為止。饑荒以後，一羣羣襁褓的人民和骨瘦如柴的動物都在東方數百里以外遊返薩麻拉 (Samara) 的故鄉，這是他們在十五年前當着土地歉收時離開的所在，而是聽到饑荒以來人口過於稀少大帶土地都在荒着的消息他們纔回來那裏的。現在的政府正想停止這種無目的的流徙，並連絡饑荒區域同時和對於力求這種流徙達到一般的發展的人民有同樣情形的地帶的剩餘人口。估計在俄國人口稠密的地域裏必須用這種方法處理的剩餘人口共有二千萬，並已準備在最近十年裏至少處理五百萬人口的計劃。所有進行拓殖的區域已經完成嚴密的考察，並有詳細的報告可供將來拓殖的利用。在某些地方已經組織有小的博物院，在博物院裏展覽土壤和茶蔬的標本與乎農民要知道關於他所移入的地方的一切。在開

始幾年當中由政府發行公債並免除僑民的捐稅，其目的是在專為這些新社會設備必需的行政、經濟、醫藥和教育等社會機關。大多數的拓殖成績已在去年按照這個計劃進行，因之去年僅有百分之九八的殖民過回。而且這種流徙甚至正在用以促進社會化的程序。鄉村裏決定家庭狀況的經濟條件比在城市裏更佔優勢。當着土地的荒歉驅迫少數份子離開家庭的時候，這種家庭就已破碎，而其他家庭則仍舊團結並為更多的工作助手的需要而添加了。土地的較合理性的分配可以給男女農民以選擇關於其家庭生活的更大自由。至若對於自然打破的家庭，新的社會羈絆可以更容易地形成，因為在拓殖新土地的上而祇有同樣習慣和經驗的團體纔可以團結，才可以在新社會上更容易地採用社會組織。

在俄國鄉村裏很少有向外的改變，關於建築的計劃在工人當中遠較集中，而社會化的程序在農民中發展遠較遲慢。合作社互助社和教育團體都是對於將來最重要的預備，且在現時的鄉村裏也極佔重要，但是這些團體却沒有在農民的實際

家庭生活發生少許改變。農業集團和公社的人口僅僅約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二。然而即在鄙陋的鄉村裏每年都有許許多多的那種團體發生，並在想法將這些團體作爲更小更有益的工作單位。

剛在革命以後政府獎勵農民羣衆組織公社管理舊時的財產。但這是舊時個人主義的方法一種太偶然太極端的轉變，因之大多失敗。同時就他方面言，別種形式的集產農業也已有一種確實的發展。這種運動從農民於忙月裏在隔離鄉村很遠的田地搭棚開始，其次便是在夏季建造粗陋的村舍，末了便是政府對於願意合作生產的農民團體供給在一個區域裏的土地。因爲農民過於貧苦，不能單自建築一所新的房屋，而須永久遷出該處，並且一般農民都過不慣離羣索居的生活，所以他們得和其他農民團結而組織一個合作社。你在這裏可以明白他們正在進化的各時代。有些農民仍然住在鄉村裏，僅僅共同耕作一大塊土地。其次的階段便是在農場上建築少數粗陋的房屋，並輪流在那裏居住。末了便是建築新的房屋並樹立

一個新的社會。

這種整個的集產運動便是革命以來俄國農業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已由彼得斯 (Kari Barlow) 在他的關於鄉村問題的書上敘述過。我之所以記憶這個，就是因為這在新生活方法的發展上是對於農民家庭的最顯著的要素之一。自從應用於這個運動的設計流為這設計的比較純粹的農業方面——土地的分配和借款與機器的供給，末了建築和社會遂成爲沒有計劃的。但是這個運動也開始注意於設計的組織。關於在某一已知土地最有益的人數，最適宜於這發展的房屋的樣式由機器的使用所形成的失業的問題，和工業經營的採用的各種研究均已成就。就社會言，這些團體仍舊是孤獨的，隔絕了鄉村裏可以利用的社會利益。不過那是因爲他們仍然狹小，仍然貧窮，仍然在牠們的草創時期，而且仍然沒有完成經濟結構的最好形式。在關於他們將來的發展的任何確實計劃未行決定以前，他們需要親自在確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上集聚更多的經驗。等到關於整個的合作團體的發展計劃

確定以後，他們就可對於社會組織比舊的鄉村供獻更多的機會。

另一個在形成將來的鄉村社會上所重視的要素即是國家農場。這些農場都建築在某些舊的財產之上，而為享用大規模機器農業的利益的農民的模範。工業組織的進步觀念正由利用那些農場而開始普及於鄉村了。國家農場的地位是為農民的服務中心，能引取農民經常與進步形式的農場組織接近，可以無疑地使這些農場成為鄉村的社會酵母。這些農場更指示出新式生活的方法，那裏的農民，仍舊住居在鄉村裏，不過須和工人進工廠一樣要去大農場工作，積累如同耕作自己的土地一樣多的剩餘，並在比能夠供給本身更好的情形底下工作。

政府對於在這一切的進化上合作抹用集產組織的態度曾有一位在供給房屋大會上發言人的說話解釋得最好。——「我們必須盡力達到集產形式的轉變，但是我們更須顧慮人民的習慣和他們對於個人農場的傾向，因此我們在集產化的採用上必得慎重將事。我們不敢說在十年二十年之內可以有甚麼形式實現。」

有了建設和機器化的這種發展，於是就有科學的組織與集體生產和標準化的種種問題。機器愈出愈奇，成爲形成整個生活的趨向的浩大力量，開始驅除了造成鄉村爲消閑美景的放蕩的老村夫，驅除了令過客喜悅的粗糙木碗和木湯匙，驅除了歷代以來原爲藝術詩歌的動力的成千的古雅和佳絕的景緻。因此有人責難機器時代，有人更責難共產黨催毀了如許多對於人生的美術和景物。然而即令那些舊的東西是美麗的，可是有一方面必不可忘記。即是村夫仍在家裏表示關於婦女和兒童的勞動一切舊時無理的剝削，因爲一切工作都落在婦女和兒童的身上。她們在污水的臭氣裏將成把的大麻浸濕捶打並斫斷作到背痛，有時她們將亞麻搓成細條並在一間黑暗的茅屋裏紡織，但是所有這些人類勞動的結果僅僅成爲幾碼可以堆在一個工廠裏的手織物。假如某人完全看見這塊手織物和其製造上的粗惡，最後的效果甚至是無人過問。

但是舊俄所有的美術並不是已被故意破壞了的有意識的生產。舊俄景緻十分

粗俗的美便是一種狂風雨的夕暮荒涼渺茫的美。被一個兒童濺污了的激烈色彩——海賊 (Vikings) 第十八世紀至十世紀時侵掠歐洲西海岸的海賊) 的威風合着東方的榮耀和拜占庭 (Byzantine) 的作品，我們都曉得這是俄國藝術的特色。俄國城市的美不在於單獨的建築，不在於其街道的散亂的無計劃的和錯綜的樣式，但在於年來發生的平民景象和風味。教會建築十分粗惡，安有圓形屋頂和樹立不穩的小十字架，而城市裏則大都有雜色圓屋頂和金製的十字架，是宏大美麗的。

俄國着手進行的問題即是如何能使工業化有補於文化和美術，如何能管理機器而不爲機器的奴隸。如果在進行上某些舊的東西必須廢除，那麼就得有別的東西賠償他們。然而現在仍發現有和過去同樣無意識的成團的美術。例如就莫斯科全市飄揚着鮮明的旗幟的某些大建築而言，舊的美術依然存在。因爲國家窮困，所以保持工人體溫的只是無數黑皮帶的生產，應付衣服需要的只是無數染印簡單

的薄綿紗布的製造。然而這是一種臨時的需要。顏色的喜愛過分地深入俄國人的腦袋不能由革命或機器所除去。

機器的到來正使俄國感到廉價貨物的集團生產以外的其他方法。正有機器本身構造精美的影響。牠的堅決的確定的綱領正脫去了舊俄藝術所抱有的技藝，正以質樸的要素應用於印刷、文學、和戲劇之上。經驗的改變十分厲害，沒有一種模型可以希望供將來的使用。他們正在進行任何新的東西，但是他們也保持舊的東西的最好部份。雖然邁爾和爾得以他的堅決的明顯的新作品以他的合節的通俗技藝和其公共的首領開始表演並甚愜意，但是小的戲院却用舊時髦的方法繼續編排古典的戲劇，而藝術劇和其劇片則仍由主要的個人表演以感動多大數聽衆。

機器的精確遂將使俄國方法發生守秩序和有計劃的必要。機器時期的到來立即打破了俄國方法的最原始的背景，他們由此必然可以免除許多混入達到現時水平線的機器發展的謬誤。這個和其綱領的性質可以制止一切如大街般的無意義或

如紐約般的殘酷的東西將來在俄國出現。

末了與機器併進的便是從未曾有過的藝術之引入人生。這個已由三個主要的影響完成了：第一便是個人的舊藝術作品的搜集並使這些作品成爲人民的財產，和博物院的发展與舊建築物的修復。第二便是利用學校俱樂部 and 戲場向任何人作藝術展覽的機會的開放。末了便是革命的藝術家或創作家給予藝術以一種新意義的努力使其能直接供給人生的興趣。他們相信沒有純藝術 (Pure Art) 那樣的东西，一個目的物的美全在於體的功用的應用如何。他們相信在現代世界上沒有那個地方可容專門繪畫的藝術家，藝術家必須變爲一個專門家和工程師，必須加入生產，並且必須使他自己與關於服飾、器具、房屋、俱樂部和城市的計劃發生關係。

亞拉托甫 (Aratov) 在他的藝術和階級 (Art and Class) 一書上曾用這樣一段指出藝術的哲學說：「藝術是去創造一個美的人生，不僅是去表現人生，是去使藝

術和生產混合，是將人羣的豐富從人民謀着生活的材料變而為在社會上有益的目的——這的確是一個重要觀念，值得無產階級的注意。」

雖然這個運動一方面已達到了粗模大樣的結構的樹立，成為實用哲學和無產階級精神的表現，一方面却又達到了關於有寬大仔街和地下通路代替曾經建築的街道制度的繁華城市，任你要去何處，均須先按電鈴，雖然這種設備不免有些粗惡甚至令人厭厭，然而對於那些以其天材應用於社會利益的藝術家却未曾供獻一點新的和動的媒介物。許多從前專門繪畫的藝術家正在毛織物工廠裏製作關於建築的圖樣，其他美術家則正在製作書檯或器具，更有其他美術家則正在計劃人民宿舍俱樂部 and 養生院。他們正在使戲場成為關於生理上比較健全和均衡的人民的發展與關於新社會形式的樹立之一種有力的工具。以言宣傳，自然僅是關於積極煽動的宣傳，而不是消極退讓的宣傳。在無產階級文化 (Proletcult) 的戲場裏，他們正在製造工作男女的藝術家，他們正在將戲場移於工廠裏，在機器鍋爐的當

中佈景，以工業編演戲劇。在這新舞台上表演的不是個人的角色，而是社會本身，並且描寫的範圍正在漸趨漸廣。革命紀念日成爲華麗的展覽會，整個的工人都參加在裏。據我在莫斯科所見的一次那樣的紀念裏到處都有戲劇表演。詩歌和音樂對於他們都是隨生活轉移的節奏。必須是革命形式的和和諧的，聯絡人民的情感，並引起他們的一致行動。就電影言，也是如此，他們找出無數的機會以解釋並建立新的生活方法。

我會會見過森密阿洛發 (Elena Semionova)，她是創作家團體裏的一個主要的女藝術家，她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笑容可掬的婦人。她曾負責佈置十週年革命紀念大勝典的會場。她對於新藝術的可能的熱切正和關心政治的婦女部職員對於部務一樣激烈。她曾指示我以她關於工人俱樂部、圖書館和食堂所完成的有趣的計劃。

另一個婦女斯特拍洛發 (Stepanova) 剛在革命以前是一個未來派藝術家，革

命以後她遂注意於毛織物和關於戲場與工人俱樂部的服裝的打樣，並且是關於邁爾和爾得的出品所用的佈景的某些新觀念的創作者。現在她是一個電影的導演。

我問她說是否她以為現在的女藝術家比革命以前有一種更好的機會，她遂毫不遲疑地答說：

「自然！以前常有一種偏見，以為成問題的人就是婦女，於今僅是一個材能的問題——現在我的丈夫和我都有同等的機會——，而且現在比從前有較多的婦女能於發展她們的材能，以前僅有工具的婦女纔有機會。」

雖然婦女已經發現在從未參加的藝術界，但在藝術界裏仍舊沒有許多苦稱的婦女的名號。這是因為除去有非常材力的婦女以外，女藝術家只能當她們的自由已經確實地成立之後才可以發展，而現在則仍沒有時間實現這種效力。婦女從不允許天材充分發展其創造力所常時必要的犧牲。一個男子可以為其藝術或其職業犧牲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大多數婦女則太利己太多情，不

能拋棄他的職業去作家庭以外的創造工作。只有當將來的社會組織解放她的許多
責任以後，婦女才能親自成爲藝術家。

我並不想稱道俄國已有一種順利進行的計劃，這計劃正在確實地建築這個將
來的社會，供獻人民一切文化的和物質的需要，因爲目前僅只有這計劃的可能
存在。我的意見單是說這在俄國有一種機會而已。關於俄國所重要的不僅是俄國
人民所做過的大胆的夢想，並且也是造成全世界的弱小盲進的人民的夢想。他們
已決心將這個夢想造成爲一個實體，絕對沒有用他們可以親自實現所正在進行的
事物的可能欺騙他們自己。

托羅斯幾曾說：「社會組織範圍裏的有意識的創造僅在人類歷史上佔有一種
無關重要的地位。……我們不能屈指計算取得新的生活方法，在我們建築新的生
活方法以前，我們必須懂得現在有些甚麼。……告訴我們何種生活已由革命的
爐灶實現了。工人階級必須注意他的生活方法提高文化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線。……

……而重新建立我們的生活方法的模型必須就是解放婦女的家政的苦役，訓練我們的兒童以社會意義，並解除婚姻的經濟壓迫。；」

共產黨員雖然承認他們既沒有物質的基礎又沒有人類的基礎以在現代改造他們所統治底下的全世界六分之一以達到他們的願望，但是他們至少正在設想形成他們能夠探出可以適合將來的模範的一種雛型。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蘇俄的婦女問題

版權
所有

著者 斯 密 斯

譯者 漫 琴

發行兼
印刷者 啓 智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啓 智 書 局

11 7
4 8234